

俄國革命五十年計

托洛茨基著 劉鏡園譯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分類號 ~~544~~ ⁷⁴⁸⁷ ~~675~~ ⁹³⁶

登錄號 10132

MK
F151.295
35

托洛基著 劉鏡園譯

中國國民政府

俄國革命五年計劃

圖書館

新生命書局發行



3 1764 6536 1

0 1 1 '34

譯者序言

本書所譯的是托洛茨基氏在最近兩年來關於蘇聯的國內和國際狀況所作的演說和論文。托洛茨基之爲研究蘇聯的權威之一，用不着我在此地特別介紹，他是俄國勝利的革命的一領袖，他關於俄國革命及蘇聯經濟建設所發表的意見常爲事實證實，我們如果要研究蘇聯發展的前途，自應注意他的言論和加以研究。

蘇聯自實行五年計畫以來，許多人對於牠過分的樂觀，以爲牠可以無阻礙地達到或者甚至已達到了社會主義。他們不知蘇聯的現階段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

譯者序言

義的過渡時期，經濟建設中包含種種的矛盾——國內的及國際的——因此發生很多困難。倘如我們只看見了五年計畫在技術與生產方面有很偉大的成績，不顧及由於產業各部門生產之不相稱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則我們完全不能了解報紙上的一些實在消息，如路透社三月二十九日柏林電：『前勞意喬治政治秘書京尼士在蘇俄步行考察後，取道回英，現已抵柏林。據稱蘇俄目前饑荒遍野，……農人反抗政府的農業集團制，及缺乏幹練工人與經濟轉運之崩潰。』又國民社五月三日莫斯科電：『蘇俄報紙已時時發見各工廠工人薪資拖欠之記載，……恐不久即將發生事變。蓋工人生計已至岌岌可危之境，物價既日漲，食物亦缺少，加以工資之不能按時發給，情形至可憫也。』

在本書所輯的托洛茨基論文中，對於蘇聯的成績與困難都有了明瞭的回答。牠考查了蘇聯生活中重要的幾方面，如第一篇是解釋俄國革命之歷史的原因，何

以落後國反能首先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第二篇論蘇聯的第一次五年計畫，即討論蘇聯經濟建設的成績與弱點。第三四兩篇論蘇聯的政治行程。蘇聯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所以政治鬥爭首先是在一黨內的各派別之間進行。同時這種鬥爭的前途是不定的，由活的鬥爭力量決定，或者走到史大林的削弱與蘇維埃政權之鞏固，或者走到反革命的政變——特米多。第五篇論現時蘇聯政府之外交政策——即親愛的政策。其餘幾篇係論蘇聯之國際形勢。在一九三一年十月托洛茨基已著文警告德國形勢之嚴重（第六篇），不幸史大林所領導的德國共產黨竟實踐了托氏所預料的最壞的可能，即對法西斯蒂屈服，對他們的取得政權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德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因此被摧殘，工人階級中無數勇敢的戰士被監禁和屠殺。依托洛茨基最近發表的意見，德國共產黨已經驗了牠的八月四日。德國無產階級如果要起來克服法西斯主義，必須要創造新黨來領導他們，德國的正式共產黨已經完

了，此後只有瓦解、崩壞與消滅的命運。

德國共產黨失敗的經驗，指出共產國際完全不能靠在別國發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手段，去保衛蘇聯。恰恰相反，蘇聯共產黨的領袖現在只有在帝國主義進攻之前步步退讓的手段以保衛蘇聯。蘇聯外交軟弱到了如此程度，竟在日本的傀儡組織——滿洲國——的挑釁之下，提議出售中東路。當然帝國主義看破蘇聯的弱點，對於蘇聯的進攻此後將益無忌憚，而被壓迫民族對牠的信仰亦將減退。蘇聯之存在，此後沒有什麼積極的因素——如煽燃世界革命——只有靠消極的因素——帝國主義內部的分裂與對抗——來保障了。但我們能想像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能長久的和平共居，共存共榮嗎？

這裏所搜集的托洛茨基的論文，足爲了解蘇聯將來發展之鑰，這便是譯者將他們譯出來的意思。這些論文大都是從柏林俄報與紐約英文戰士週刊中選擇出來

的。只有第三篇是譯自倫敦出版的一九三二年七至九月的政治季刊。第二篇係轉載自天津大公報，（但其中頗多刪節，遺漏與錯誤，均由譯者一一補正，）末篇係轉載自讀書雜誌第二卷第十期，特此聲明，並誌謝意。

六月二十九日 一九三三，譯者。

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目次

十月革命之歷史的意義..... 一

蘇聯經濟中的危機..... 五一

具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一〇七

特米多的危險..... 一三一

『用一雙手』..... 一四七

國際形勢之鑰在德國..... 一六一

我看俄德將有戰爭..... 一九一

蘇俄革命與國際形勢..... 二〇七



世界
文壇



十月革命之歷史的意義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對哥本哈根社會民主黨學生之講演

我親愛的聽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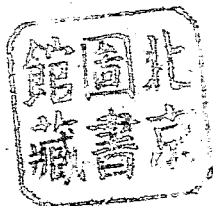
讓我於開始時表示我不能用丹麥語在哥本哈根的聽衆前演說之誠實的歉意。

我們不要問聽者之是否受損失。至於就說話的人說，他的不懂丹麥文使他沒有

中可能讀了解斯坎丁那維亞的生活和用原文讀斯坎丁那維亞的文學，這是一大損



中國革命之歷史的意義



(南)

我所恃的以傳達意見的德文是豐富而有力的。然而我的德文程度頗屬有限。而且要討論複雜的問題，只有用本人自己的文字才有必須的自由。所以我必須預先請聽衆原諒。

我第一次到哥本哈根是參與國際社會黨大會，我所帶走的是貴城市的最可愛的回憶。但那是在二十五年以前。在那以後，在Oresund和在海峽（Hjörta）的水已有了不少的改變，而且不僅是海水有改變。戰爭打斷了舊的歐洲大陸的脊梁。歐洲的河海已洗去了不少的血。人類，尤其是歐洲的人類，已受過嚴重的試驗，已變得更幽暗與更殘酷。每一衝突都變得更激烈與無情了。世界已走進大變化的時期。其最極端的表現便是戰爭和革命。

在我開始講我的本題，俄國革命以前，我認爲我應對於這一會的組織者，即哥本哈根社會民主黨的學生團體，表示謝意，這是一政治的反對者之感謝。自

然，我的講演是爲了歷史科學的而非政治的目的。我要從一開始着重這點。但是我們不能在說一產生蘇維埃共和國的革命時，沒有政治的立場。我現在講演時與我過去參加革命事變時，是在同一的旗幟之下。

大戰以前布爾雪維克的黨是屬於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投票贊成預算，將這種聯繫一下子便永久的斷絕了，以後即開始了布爾雪維克主義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不斷的與不可調和的鬥爭的時期。但這可不是說這一集會的組織者請我講演是做錯了。在這一點，聽衆只能在我講演之後下判斷。爲了說明我之接受此可感的邀請來做關於俄國革命的報告之正當，讓我指出以下的事實，即是在我三十五年的政治生活中，俄國革命問題是我的興趣和我的行動之實行的和理論的中心。我住在土耳其的四年主要是致力於俄國革命問題之歷史研究。或者這一事實給我以某種權利，希望我至少能部份地幫助不僅朋友和同情

者，而且幫助反對者更了解許多他們從前所未注意的特點。無論如何，我的講演的目的是：幫助了解。我不想爲革命進行宣傳和勸你們加入革命。我想解釋革命。

我不知道在斯坎丁那維亞的神廟中有否一司叛亂的女神！不見得有罷！無論如何我們今天將不要她的眷顧。我們將置我們的講演在 *Opportunitas*，即古代司知識的女神之標識下。雖然革命之爲熱情的戲劇乃是一活的事變，我們將努力如解剖學家一樣的冷靜地研究牠。假使講演者因爲這樣而乾燥些，讓我們希望聽衆注意及這一點。

讓我們從一些淺近的社會學的原則開始，無疑地你們都知道，但我們在研究這一如革命的複雜現象時，必須在記憶中將這些原則溫習一下。

人類社會是一有歷史起源的合作，這是在爲生存和爲維持後代的爭鬥中所露

要的。一社會的性質爲牠的經濟的性質所決定。牠的經濟的性質是爲牠生產的勞動之手段決定。

在生產力發展中之每一大時代，即有一與之相符合的確定的社會制度。每一社會制度，直到現在爲止，都是將極大的利益，給統治階級。

從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明瞭每一社會制度不是永久的。他有歷史的起源，以後成爲對於進步的束縛。「凡是興起的都應當毀滅」。

但是沒有統治階級自願地或和平地讓位。在關於生死的問題中，基於理智的辯論，永不能代替實力的辯論。這或者是可惋惜，但事實是如此。這一世界不是我們所造的，我們只能就牠現在的這樣來認識牠。

一 革命的意義

革命即是改變社會制度的意義。牠將政權由一耗竭了自己的階級之手移轉於正在興起的別一階級之手。暴動是兩階級爲政權爭鬥的最尖銳與最緊張的時機。暴動只是在基於進步的階級之上（這一階級能團結壓倒的大多數人民於其周圍）時，才能引到革命的真正勝利和建立一新秩序。

革命與自然行程不同的地方，是在他爲人和經過人這動物所幹的。但是在革命進程中，人也是受社會狀況的影響而行動，這些狀況不是爲他們所自由選擇的，而是從過去傳下來的和命令地指出人所必須走的路。因這理由，革命必是遵守某些法則。

但是人類的意識不僅被動地反映牠的客觀狀況。牠慣於對客觀狀況作積極的反應。有些時候這一反應帶一種緊張的、熱情的和羣衆的性質。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障礙被摧折了。羣衆之積極干涉歷史事變事實上革命的最必需的條件。

但即使是最風暴的活動，也能停在示威或亂叛的階段，不昇到革命的高度。羣衆的暴動必須達到推翻一階級的統治和建立別一階級的統治。只有那時候才是一個整個的革命。一個羣衆的暴動不是人們可以在任何時高舉即能喚起的孤立事業。牠是在革命發展中，爲一客觀所決定的原素，正和革命也是社會發展中客觀所決定的行程一樣。但如暴動的必要條件存在，人們不能簡單地消極地張着嘴等待，如像莎士比亞所說的，「在人事中有一種浪潮，假使在其高漲時跟隨牠即可引人發財。」

爲掃除已過時的社會制度，進步的階級必須了解牠的時機到了，即以奪取政權爲自己的任務。這事開啓着自覺的革命行動的領域，先見與計算要和意志與勇敢結合在一起。換言之，此地開啓着黨的行動的領域。

革命的政黨團結進步的階級之精華。假如沒有一政黨能在環境中間隨機應變

的應付，估計事變之進展與韻律，早些獲得羣衆的信仰，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暴動與革命中客觀的與主觀的因素之相互關係。

二 十月革命之原因

在有思想的人的心中，十月革命提出了那些問題呢？

(1) 這一革命何以和如何發生的？更具體些說，何以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的一個最落後的國家勝利了呢？

(2) 十月革命的結果是什麼？

(3) 十月革命經得起試驗嗎？

第一問題，關於原因的部份，現在可以多少詳盡地回答牠了。我已企圖在我的「革命史」中詳細地回答牠，此地我只能說出最重要的結論。

無產階級在一如舊日沙皇的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第一次獲得政權的事實，最初看來似乎是神秘的；實際牠與歷史的法則完全符合。人們是能預言牠的，而且也有人預言過牠。更有甚者，基於這一事實的預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決定的事變之前好久，建立起了他們的戰略。

最初與最一般的說明是：俄國是一落後的國家，但只是世界經濟的一部份，只是資本主義世界系統中之一因素。在這一意義上說，列寧已用這一金玉的公式打破了俄國革命之謎，『鎖鏈在其最弱之一環被打破』。

一個粗淺的說明：大戰爲世界帝國主義矛盾之結果，將許多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捲入旋渦，但對於一切參加均作同樣的要求。很明瞭的，戰爭的負擔，對於最落後的國家更其不可忍受。俄國是第一個被迫脫離戰場的。但是要退出戰爭，俄國人民須推翻其統治階級。這樣，戰爭的鎖鏈在其最弱的一環破裂。

再者，戰爭並不是像地震一樣的、從外面來的災難，而是如老克勞則維次（Clarendon）所說，政治用別的手段之繼續。在最後一次戰爭中帝國主義系統在和平時代的主要傾向只是表現得更粗野。一般的生產力愈高，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愈緊張，對抗愈尖銳，軍備競爭愈瘋狂，如此則對於較弱的參加者愈困難。正因這理由，落後國家在崩潰之連續中占第一位。世界資本主義的鎖鏈永久是傾向於在其最弱的一環破裂的。

假使，由於例外的或異常不順利的環境的結果——讓我們說，外來的軍事干涉成功，或蘇維埃政府做了不可挽救的錯誤——資本主義又在這無限廣闊的蘇維埃領土之上興起了，與他在一起必然也興起牠的歷史的不合宜，這樣的資本主義，其自身將很快成爲那些引起一九一七年爆裂的同樣矛盾的犧牲品。假使俄國沒有在身上懷着革命的孕，沒有策略的藥方能喚起十月革命性之存在的。革命黨

就其最後的分析說，只能盡一產婆的作用，他不得不訴之於該撒的手術。

有人或者對這回答說：『你的一般的意見固可以適當地解釋，舊俄國何以必須有觸礁之厄，因為牠是一落後的資本主義和貧窮的農民爲寄生的貴族與腐敗的帝制所統治的國家。但是就鎖鏈和其最弱的一環的譬喻中，還失去『對於真正的謎的鑰匙：社會主義革命如何能在『落後國家勝利的呢？歷史知道許多國家與文化之凋謝，跟着即是舊的階級崩潰，找不出進步的繼承者來代替牠們的例。舊俄國的崩壞，在第一眼看來，多半應當將國家變爲資本主義的殖民地，而不是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

這一反對是極有興趣的。他直接引我們到整個問題的中心。然而這一反對是錯誤的；我可以說，牠缺乏內部的平衡。一方面，牠從誇大俄國之落後的概念出發；另一方面由於在理論上了解錯誤了一般歷史落後的現象。

生物，連人在內，自然依他們的年齡通過相似的發展階段。一個常態的五歲的兒童的重量，身體各部的大小和內部的器官是有一種相稱的。但當我們研究及人的意識時，情形就不同。心理學與生理學、解剖學相反，無論其為個人的或團體的心理，其特色是異常的吸收力、伸縮力與富於彈性；這即是人之超過於其動物的最近親屬如猿類的貴族利益。吸收的和彈性的心態為歷史進步的必要條件，對於所謂社會的『有機體』(Organism) (與真正的生物的有機體不同) 的內部結構賦予以異常的不安定性。民族與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發展中沒有什麼相似與整齊性。不同階段的文化 甚至是相反的兩極的文化，在同一國家的生活內彼此相接近與相互錯綜。

讓我們不要忘記，歷史的落後是一相對的概念。既有落後的與進步的國家，即有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即有進步國家對於落後國家之壓力，落後國家即有趕

上進步國家之需要，借用他們的技術、科學和其他。這樣即產生了綜合的發展之形態：落後的諸點，與世界的技術與世界的思想之最後的發明相結合。最後，歷史上落後的國家，爲了脫離他們的落後，常常被迫要跑到各國的前面。

社會意識之伸縮性使牠在某些條件下能在社會領域內完成在個人心理學中所稱爲的「克服劣等之意識」的結果。在這意義上，我們可說十月革命是俄國人民用以克服他們自己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劣等之英勇手段。

但是讓我們不要談這些歷史哲學的，或者有點太抽象的原則，而以具體的形式提出同樣的問題，即是，在活的經濟事實之交織中提出這問題。俄國的落後在二十世紀之初表示得最明顯：工業比較起農業來，城市比較起鄉村來，無產階級比較起農民來，在國內都占很小的地位。整個說來，這即是全國勞動生產率之低減。我們只須說，在大戰之前夕，當沙皇的俄國達到了其幸運之頂點時，全國的

收入比美國低八倍以至十倍。這是牠的落後之廣度之數字的表示，假使我們對於落後也可以用廣度二字。

同時，綜合發展的法則，在經濟領域中，每一步，無論是在簡單和複雜的現象中都表現其自己。俄國在幾乎沒有官道時就被迫修鐵路。沒有經過手工業與製造業的階段，俄國直接過渡到機械化的生產。跳過中間階段是落後國家的命運。

當農民的農業停在十七世紀的水平時，俄國的工業，假如不是就範圍，至少就形態說，立在進步國家的水平上，和在幾方面跑過他們的前面。我們只需說，美國一千以上的僱員的大企業所用工人共佔產業工人全數不到百分之十八，而在俄國則佔百分之四十一以上。這一事實與對於俄國經濟落後的世俗的概念是很難調和的。另一方面說，牠不是駁斥這落後而是辯證地補足他。

俄國階級的結構表示出同樣的矛盾性質。歐洲的財政資本將俄國經濟加速度

的工業化。由此工業資產階級帶大規模資本主義的和反民衆的性質。而且外國的股票所有人住在俄國以外，而另一方面，工人則天然是俄國人。所以在數量很弱的，沒有民族的根的，俄國資產階級之前立着一較強的無產階級，在人民深處植其強固的根。

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更爲以下的事實所促進，即是俄國爲一落後的國家，在其被迫追跡其反對者時，無論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都沒有來得及變成保守的。歐洲的，實際也是全世界的最保守的國家，大家認爲而且是正確的——是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最沒有保守主義的歐洲國家，多半即是俄國。

但是幼稚的、新鮮的、堅決的俄國無產階級還只構成國民的極少數。牠的革命力之後備軍在無產階級自身之外，即在生活在半農奴狀況的農民與被壓迫的民

三 農民問題

革命的底層是土地問題。舊的封建帝制制度，在新的資本主義剝削的情形下，變得加倍的不能忍受。俄國農民的耕地約有一萬四千萬俄畝 (Desiatines)。但是三萬大地主，平均所有約在二千俄畝以上的，共有七千萬俄畝，即是說，和一千萬農戶，或五千萬農民人口所有的一樣多。這些土地所有的統計，構成農民暴動的現成的政綱。

貴族波科爾金 (Bokorin) 於一九一七年寫信給最後一次的市議會議長羅贊科 (Kodjanko) 爵士說：「我是一地主，我想不出何以我必須失去我的土地以供社會主義學說的試驗。」但是革命的任務正是在完成統治階級所想不出的。

一九一七年的秋季幾乎全國成了農民暴動的舞台。舊俄的六百四十二州中，

有四百八十二州即百分之七十七受這運動的影響。鄉村的焚燒之火照耀着城市暴動的戰場。

但是農民的反對地主的戰爭——你們將回答我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而非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模範因素。

絕對的正確，我回答，這是過去的事。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在一歷史的落後國家之不能生存，正爲這事實表示，即農民暴動不能推動俄國的資產階級前進，而是相反地推動他們進反動的陣營。假使農民不願意完全破產，則他除了與工業無產階級攜手以外沒有別的道路。這兩個被壓迫階級之革命的攜手，是爲列寧的天才所預見和爲他在很久以前所準備的。

假使資產階級勇敢地解決土地問題，顯然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不能拿到政權。但是貪婪和怯懦的俄國資產階級，出現在舞台上太遲，出現以後，很早

地就衰老了，不敢舉起手反對封建財產。因此牠將權力交給了無產階級，並連帶將處分資產階級社會的命運的權利交給了牠。

所以，爲了蘇維埃國家之能誕生，必須兩個歷史性質不同的因素合作：農民戰爭，即是成爲資產階級發展黎明期的特徵的運動，和無產階級暴動，即是宣告資產階級發展的衰落的運動。這便是俄國革命的綜合性質。

一旦農民之能以他的一隻後足站起來時，他的憤怒是極其可怕的。但是他不能給他的憤怒以自覺的表現。他需要一領袖。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暴動的農民在無產階級身上找着了——忠實的領袖。

四百萬產業和運輸工人領導了一萬萬的農民。這是革命中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相互關係。

四 民族問題

無產階級第二革命後備軍爲被壓迫民族所構成，他們的大部份也是農民。與俄國的歷史的落後緊相連繫着的是國家發展的廣大性，牠從莫斯科的中心擴張到外圍像脂肪的斑點一樣。在東方牠奴役比牠更落後的民族，以牠們爲基礎，以便窒息西方的更發達的民族。在七千萬主要的大俄羅斯人口之外，逐漸加上了「別的民族」共九千萬人。

帝國卽是這樣興起的，在其成份中，統治的民族只佔百分之四十三，其餘的百分之五十七是文化與法律被剝奪的程度互不相同的民族。民族的壓迫在俄國比在鄰近國家——不僅西方邊境以外的國家，而且也是東方邊境以外的國家——要無比的粗野些。這給民族問題以可怕的爆炸力。

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以及在土地問題上的主張，都不外在壓迫的與暴力的制度中做些改良。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的『民主』政府反映大俄資產階級與官僚的利益，他們在他們存在的八個月中，急於在不滿的民族中給他們以印象：『你們要得到什麼，只有用暴力奪去。』

列寧早已注意及離心力的民族運動發展之必然。布爾雪維克的黨若干年來都爲民族自決權——直到完全脫離的權利——頑強的爭鬥。只有由這一在民族問題上勇敢的立場，俄國無產階級才能漸漸獲得被壓迫民族的信仰。民族獨立運動以及農民運動必然變得反對官式的民主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和流入十月政變之主流。

五 不斷革命論

這樣，歷史上落後國家無產階級革命之謎失去了其神秘之罩。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早在事變前好久預言革命的前路和幼稚的俄國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請允許我在此引我自己在一九〇五年的著作之一段：

「在一經濟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能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得到政權。……」

「俄國革命創造出一些使政權能夠（假使革命成功必定）移轉於無產階級的條件，甚至於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沒有得到完滿的機會，展開其行政的天才以前。

「農民的最原始的利益的命運……與整個革命的命運，即是說，與無產階級的命運運繫在一起。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將在農民之前表現其為解放農民的階級。

「無產階級以國民的革命代表，以人民在與專制主義和農奴的野蠻主義爭鬥

中公認的領袖的資格加入政府。

『無產階級政制，將從一開始即主張解決與俄國大多數人民羣衆的命運有關的土地問題。』

我自由地引了這些話以證明我今日所呈獻的十月革命理論不是偶然的倉卒編製，不是事後在事變的壓力下造出來的。不是的，就其政治預測的形式說，牠在十月革命之前有好久。你們一定同意，理論之有價值，只因其幫助入預見行程的發展和有目的地去影響牠。一般的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爲明瞭了解社會與歷史的最可貴的武器的地方。我很可惜因講演的狹隘限制，不許我用材料去發揮以上的引語。所以我簡略結束從一九〇五年開始的全部著作，即可以滿意了。

依照其直接任務說，俄國革命是一資產級階的革命。但是俄國資產級階是反對革命的，所以革命的勝利只有成爲無產階級的勝利才有可能。但是勝利的無產

階級將不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綱，牠將走到社會主義的政綱。俄國革命將成爲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之第一階段。

這即是在一九〇五年爲我所提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此後即在「托洛茨基主義」名義下被人們最嚴厲地批評。

更精確些說，這只是這一理論之一部份，其另一部份特別合於現在時機的，是說：

現在的生產力早已生長超過了國家的界限。社會主義的社會在國家的界限是不能成立的。無論一孤立的工人國家的經濟成績如何大，「一國社會主義」的網，僅是一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只有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歐洲聯邦，以後是世界的聯邦，才是諧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園地。

今日，在事變的證驗以後，我更看不出放棄這一理論的理由。

六 布爾雪維克黨

由以上所說的話，我們還值得提及一法西斯蒂的作家馬拉巴特 (Malaparte) 嗎？他將離開戰略而獨立的策略歸之於我，合起來是一堆暴動的技術規矩，應用於一切經度和緯度。幸而，這一不幸的政變論家的名字使我們很容易將他與政變的勝利的實行家分別出來；所以沒有人會冒將馬拉巴特與邦拿巴特 (Bonaparte) 混合的危險（按此處係名詞的遊戲，邦拿巴特即拿破倫，法文之意爲 *Bonaparte* 好運道而馬拉——巴特則爲壞運道之意——譯者）。

沒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武裝暴動，蘇維埃國家將不能存在。但是暴動自身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十月革命必須有一批歷史前提。

一、舊統治階級——貴族、帝制、官僚之被剷除。

二、在人民羣衆中沒有生過根的資產階級之政治軟弱。

三、農民問題之革命性。

四、被壓迫民族問題之革命性。

五、無產階級之重要的社會重量。

在這些有機的先決條件之外，我們必須加上某些最重要的行情上的條件：

六、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偉大的學校，或者照列寧的話說，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預演。蘇維埃之爲革命中無產階級聯合戰線的不能代替的組織形式，是第一次在一九〇五年創造出來的。

七、帝國主義戰爭將一切矛盾尖銳化，將落後羣衆從他們的不行動的狀況中拯救出，這樣準備了大規模的鉅變。

但一切這些條件造成革命的爆發是十分充足的，並不足以保障在革命中無產

階級的勝利。爲這一勝利更需要一條件：

八、布爾雪維克的政黨。

當我列舉這一條件爲這一串中最後的一條件時，我只是因爲牠跟隨邏輯秩序的 necessary，我不是在重要的次序上認其爲最後的。

我完全不是這樣想。固然，自由資產階級能不參加鬥爭而取得政權，且不止一次的這樣取得了政權，牠有攫取的機關，異常適合於這目的。但是工人階級的地位不同；他們長久是習於「與」而不習於「取」。他們勞動，盡可能地長久忍耐、等到希望，失去了他們的忍耐，起來、爭鬥，死亡的結果是將勝利交給了別人，他們爲人所叛賣，於是垂頭喪氣，又埋首勞動。這是人民羣衆在一切政制下的歷史。爲了堅決和確定地拿政權在自己的手中，無產階級需要一政黨，其思想之明瞭和革命的堅決要比別的政黨超越多多。

布爾雪維克的政黨曾不止一次地和完全適當地被人描寫爲人類史上最革命的政黨，是俄國近代史的活的結晶，俄國史中一切活的東西都在裏面。沙皇的被推翻已早成爲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爲解決這一任務力量不夠。資產階級害怕革命。智識分子想使農民站起來。農民不能將他的貧苦與他的目的歸納於一原則，對知識份子向他的呼訴不理睬。智識份子以炸彈武裝自己。在這一鬥爭中燒掉了一整代的人。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亞力山大·烏利雅諾夫進行了最後的一大恐怖陰謀。暗殺亞力山大第三之企圖失敗了。烏利雅諾夫和別的參加者被處了死刑。以化學製成物來代替革命階級的企圖觸了礁。甚至最英勇的知識份子，沒有羣衆，也是不算什麼。在這些事實與結論的印象之下，烏利雅諾夫的兄弟，以後的列寧，長大起來，這是俄國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卽在他的幼年時，他卽以馬克思主義爲基

礎和轉向無產階級。他一刻也不忽視鄉村，他找接近農民的道路是經過工人。他從他的革命前輩承繼了他們的堅決，承繼了他們的能自我犧牲，和他們的願意爭鬥到底，列寧早年即成爲新時代的智識分子與先進工人的老師。在罷工與街市戰鬥中，在監獄與在充軍地，工人們受到必需的鍛鍊。他們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探照燈，以在專制主義的黑暗下照耀他們的歷史道路。

一八八三年在亡命者中發生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一八九八年的一秘密會議宣告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我們在那些日子都稱自己爲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三年發生了布爾雪維克與門雪維克的分裂。一九一二年布爾雪維克的小組織最後成爲一獨立的政黨。

牠學習了在爭鬥中，在十二年的偉大事變中（一九〇五——一九一七）認識社會的階級結構。牠教育了幹部能出主意，又能服從。牠的革命行動之紀律是基於

牠的學說之統一，基於共同鬥爭的傳統，和基於對牠的已證驗過的領導之信仰。

這是一九一七年時黨的情形，牠爲官式的『公共意見』所輕視，知識分子報紙如打雷一般的攻擊牠，牠適應自己於羣衆的運動。牠堅固地將工廠與團營中的力量保存在自己的手中，逐漸而農民羣衆愈益傾向牠。假使我們了解的國民不是有特權的頭目，而是大多數的人民，即是說，工人與農民，則布爾雪維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的進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國國民的黨。

一九一七年九月，被迫藏匿起來的列寧，發出信號：「危機是成熟了，暴動的時間走近了。」他是正確的。統治階級在戰爭、土地與民族解放的諸問題前都走進了死巷。資產階級最後喪失了牠的頭腦。民主的政黨——門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將羣衆對於他們所殘餘下來的一點信仰都浪費於擁護帝國主義戰爭，浪費於和資產階級與封建財產所有者無效的妥協和讓步。已覺醒的軍隊再不要爲帝

國主義的國外目的而戰爭。不顧民主主義的忠告，農民們用煙把地主從莊園裏趕出去了。在邊圍的被壓迫民族起來反抗彼得格勒的官僚。在最重要的工兵蘇維埃中，布爾雪維克都佔勢力。工人和兵士們要求行動。瘍是成熟了，牠需要開刀的一割。

只有在這些社會與政治的條件下，暴動才是可能。而且這樣他也變成不可避免。但是我們不要玩弄暴動。正如用刀的醫生一不留心即應倒霉。暴動是一藝術。牠有牠的法則與規則。

黨以冷靜的計算和熱烈的堅決實行了十月暴動。由此牠幾乎沒有犧牲而獲得勝利。布爾雪維克經過蘇維埃的勝利得以領袖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國家。

我假定現在聽講諸君的多數在一九一七年時還完全沒有從事過政治。這是更好。在青年人的前面有許多有興趣的雖非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座的有老一代的人

一定記憶得布爾雪維克的奪取政權被人如何看待：當好奇一樣，當誤會一樣，很多人視他爲一夢魔，在黎明的頭幾道光線發出時，一定會不見的。布爾雪維克將維持二十四小時、一禮拜、一個月、一年。時間須常常展長。……全世界的統治者武裝着自己以反對第一工人的國家：國內戰爭被挑動起來，干涉以後繼以干涉、封鎖。這樣過了一年又一年。然而在此期間歷史已登記了蘇維埃政權十五年的存在。

七 十五年的蘇維埃政制

反對者會說「是的，十月的冒險已表示自己比我們許多人所想的結實得多。或者那也不是什麼冒險。然而以下的問題仍是保存其力量：用這麼的高價完成了什麼？布爾雪維克在革命之前夕所宣告的那些耀人眼目的任務已完成了沒有？」

在我們回答假定的反對者以前，讓我們說問題不是新的。恰恰相反，牠跟隨着十月革命的脚步，從牠的誕生日起即發生。

法國新聞記者 Claude Arét 在革命時正在彼得格勒，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寫道：

『多數派（法國人那時稱布爾雪維克的名稱）已取得了政權，偉大的日子到了最後，我向我自己說，我會看見對於我們應允了這多年的社會主義樂園將實現。……可驚的冒險！有特殊利益的地位！』如此類推，在這種譏諷的恭維之背後有如何誠實的憤恨！在冬宮被攻下的那天早晨，反動的新聞記者趕快去訂一張票準備進社會主義樂園。革命以後又過了十五年。我們的敵人更不客氣地表現惡意的喜悅，因為蘇維埃的國家，即在現在也不大像一般人都有幸福的領域。爲什麼革命和爲什麼犧牲呢？

親愛的聽衆們！我覺得蘇維埃制度的矛盾、困難、錯誤與需要，我明白得並不比別人壞。我個人無論在文字與演說中從未隱藏過。我過去相信，現在仍是這樣的相信，革命的政治和保守的政治不同，不能建立在隱瞞上，『是怎樣即說出怎樣』，必須成爲工人國家的最高原則。

是在批評中以及在創造的活動中，前途是需要的。主觀主義是一壞顧問，特別是大問題。時期必須與任務而不是與個人的幻想相稱。十五年！在個人的生命中這是如何多的時間！在那一時期，我們的一世代有不少的人都進了墳墓，活着的也加了無數的斑白髮。但是這同一的十五年——在一民族的生命中是如何一不重要的時期！只是歷史的時計上一分鐘而已。

資本主義在其與的古時代鬥爭中需要數世紀以維持自己，以提高科學與技術的水平，建造鐵路，擴張電線。以後呢，人類爲資本主義投入戰爭與危機的地獄

中。但是社會主義的敵人，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只許社會主義以十五年去在世界上建立天堂和一切現代的設備。我們從未肩負這種重任。我們從未定出這樣的時期。大變化的行程必須用與牠相合的尺度來量牠。我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否像聖經上的天堂。我是懷疑的。但是蘇聯現在還沒有社會主義。在那裏盛行的情形是過渡的情形，充滿了矛盾，肩荷着過去的遺傳的重負，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的壓迫之下。十月革命已宣告了新社會的原則。蘇維埃共和國只表示出其實現的第一階段。愛迪生的第一個電燈是極壞的。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在第一次社會主義建設的錯誤與過失中辨別其將來。

但是那些落在活人身上的不快樂呢？革命的結果能解釋其所引起的犧牲之正當嗎？這是一無結果的問題，只是透澈修辭的！好像歷史的行程可以允許我們作會計的損益結算書。因為人類生存的困難與痛苦，我們也可以同樣問：「人生出

來是合算的嗎？」海勒(Haine)對於這問題回答說：「只有素材等着回答。」……這些可憂鬱的思慮并不阻碍人類之被生與生產。甚至在無比的世界危機的這些日子，幸而自殺構成不重要的百分數。但是民族從沒有訴之於自殺的。當他們的負擔不能忍受時，他們從革命中找出路。此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犧牲者表示憤怒的又是誰呢？往往是那些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開路，謳歌大戰，或至少，容易與戰爭在一起相處的人們。現在也輪到我們問：「戰爭是值得的嗎？牠給了我們甚麼？牠教訓了我們什麼？」

反動的歷史家滕納(Hippolyte Taine)，在他的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十一卷小冊子中，不無惡意的喜悅地描寫法國人民在雅各賓專政及以後的諸年的痛苦。最壞的是城市的下層階級，平民們，他們是山克洛特(Sansculottes)，犧牲了他們的最好份子為革命。現在他們和他們的妻子整個冬夜在麵包坊門口排班，回到自己

的爐火已熄的家庭去時仍是空手。在革命的第十年，巴黎比革命開始以前還要窮些。小心選擇的，人工地揀出的事實給騰納爲他反對革命的無情的料詞之用。看呵！平民們要做迪克推多，而他們已降落在貧苦的深淵。

我們很難想像一更世俗的道德說法。首先，假使革命將國家陷於貧苦深淵，我們應當主要責備那逼人民革命的統治階級。第二，法國大革命並沒有在麵包坊前的飢餓隊伍中耗竭了自己。整個的近代的法國，在許多方面，整個的近代文明是由法國革命的浴血中生長出的。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國內戰爭過程中，犧牲了五萬人。這些犧牲是值得的嗎？

自美國奴隸所有者，和與他們在一道的英國統治階級的觀點看來，是不值得的。從黑人或從英國的工人的觀點看來，是絕對值得的！從全人類發展的觀點看

來，這是毫無可疑的。現在的美國以及其無限的實際創造力，牠的合理化的技術，牠的經濟的奮發有爲，都是從六十年代的國內戰爭產生出來的。在美國的這些成績之上，人類將建設新的社會。

十月革命比其任一前輩要更侵入到社會的神聖事物之最神聖的中間去——即侵入社會財產關係中。因此牠所需要的時間要更長些，以便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中顯示革命之創造的後果。但是政變的一般趨勢已明瞭：蘇維埃共和國沒有任何理由在牠的資本主義的控告者之前低頭和說道歉的話。

從人類發展的觀點上估量新制度之價值，我們必須先回答：「社會進步如何表現其自己和我們如何測量牠？」

八 「十月」之結算

最深的、最客觀的和最不可爭的標準說，進步能用社會勞動生產率之生長來測量。從這一觀點，經驗已對十月革命作了估價。社會主義的組織之原則在歷史中已第一次表現其能力，能在短時間內在生產中紀錄空前的結果。

俄國工業發展的曲線表現在粗製的指數中如下：以大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爲一百。一九二〇年，國內戰爭最高點的一年，也是產業中最低點之一年，只是二十五，即占戰前生產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增至七十五，即戰前生產的四分之三；在一九二九年約二百，一九三二年約三百，換言之，即三倍於大戰之前夕。與國際指數相比較，畫圖更爲顯著。由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二年德國的工業生產已降落了一倍半，美國降低了兩倍，蘇聯則增加了四倍。這些數字足以說明自己。

我沒有意思否認或隱蔽蘇聯經濟之弱的一面。工業指數的結果異常受農業不

順利發展的影響，換言之，即是那根本上還未成熟到社會主義方法的領域，但未經充足的準備即官僚地而非技術地和經濟地被引到集團化路上的領域。這是一大問題，但已超出了我的講演的範圍之外。

以上所引的指數需要另一重要的保留。蘇維埃工業化的不可爭的和就自己說是最好的結果，需要從經濟的不同成份之互相配合，他們的動的平衡，由此而生的生產能力的觀點，更來一下經濟的覆核。在此，大困難與甚至於挫折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從五年計劃中一產生出來，即已有了完成的形式，如像從 *Jupiter* 神的頭上出來 *Minerva* 女神或從海的泡沫中出來的 *Venus* 神一樣。在社會主義以前需要有幾十年的堅毅工作，錯誤，糾正和整理。此外我們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建設依其本來性質言，只能在國際的戰場上達到完成。但縱使到現在為止的結果之經濟的損益結算，是最不順利的，也只能啓示初步計算之不正確，計劃的

錯誤與領導的錯誤，但完全不能駁斥在經驗上已經確立的事實，即是由社會主義方法之助，可以提高集體勞動的生產率到空前的高度。這一世界歷史重要的成就，是任何人或任何物都不能從我們拿起走的。

在以上所說的以後，恐怕不值得消費時間於回答那種說十月革命將俄國的文化傾覆的訴苦罷。那是受害的統治王朝和時髦社會的聲音。無產階級暴動所推翻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文明』，只是鍍金的野蠻主義。俄國的人民固然親近不到牠，牠也沒有給人類寶庫以什麼新東西。

但即就這一爲白黨亡命客們所痛惜的文化說，我們必須精確地提出問題——在那種意義上說牠是覆滅了呢？只有在一意義上：極少數人對於文化寶藏之獨占被摧毀了。但是舊俄文明中凡屬有文化價值的東西都沒有被侵犯。布爾雪維克的鑿子既未摧毀心靈的勝利品，又未毀壞創造的藝術。恰恰相反，他們小心地收集

人類創造的石碑，以模範的秩序去排列牠們。帝制、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文化現在已成了博物院的文化。

人民熱心地參觀這些博物院。但他們並不生活在裏面。他們學習。他們建設。十月革命教俄國人民、教沙皇的俄國之下的十幾種民族讀書寫字，只這一事實，比整個舊俄溫室的文化要高無數倍。

十月革命已建立了新文明的基礎，這文明不是爲出類拔萃的少數，而是爲全體人。全世界的羣衆感覺這點。因此他們對蘇聯之同情正如他們從前對沙皇俄國之憤恨一樣的熱烈。

親愛的聽衆，你們知道人類的語言是不可缺的工具，不僅給事變以名稱，而且給牠們以估價。在濾去了一切偶然的、枝節的、人工的東西以後，牠吸收一切主要的、特色的和十分重量的。試注意文明國家的語言如何細緻地分別出俄國

發展之兩個時代。貴族的文化在世界通用的是如此野蠻的字，如沙皇、哥薩克、Pogrom（燒殺）、Hesajka（鞭笞）。你們知道這些字是什麼意思嗎？十月革命在世界語言中所加入的字爲布爾雪維克、蘇維埃、Kolkhoz（集團農場）、Gosplan（國家計劃）、Pjatileta（五年計劃）。這裏，實用的語言做了歷史的最高裁判官。

偉大革命最深的意義而且最難直接測量的事實，即是牠形成和陶鑄民族的品性。普遍的認識，總以爲俄國人民是遲慢、消極、憂傷與神秘，這不是偶然。牠在過去有其根源。但在西方國家直到現在，還未充足注意到革命在民族品性中所起的改變。又怎能不如此呢？

每一經驗過生活的人，能回憶及他所知的某一青年的畫圖、易學的、富感受性、抒情的，以後突然在有力的道德的推動之影響下，變得凝固與不可辨認了。

在一整個民族的發展中這種道德轉變乃爲革命所造成。

二月的反專制的暴動，反貴族的、反帝國主義戰爭的爭鬥，要和平，要土地、要民族平等，十月暴動，推翻資產階級，和推翻那些求與資產階級妥協的諸黨，三年來在五千里長的前線上的國內戰爭、封鎖、飢餓、貧窮和瘟疫的諸年，緊張的經濟重造、新困難與刻苦的諸年——這些構成了一個艱辛的但是很好的學校。一個重鐵錘打破玻璃，但是能鍊鋼。革命的錘則鍛鍊民族品性的鋼。

在暴動後不久，一個沙皇的軍官，查列夫斯基(Zalavsky)憤怒地寫道：『誰會相信一個看門的人或一個更夫突然變成一法官，醫院的侍者做院長，理髮匠做官，伍長做總司令，日工做市長，銅匠做工廠經理呢？』

『誰會相信呢？』他們不得不相信。當伍長擊敗了將軍；當市長——舊日的日工——破壞了舊官僚的抵抗，車上擦油的人將運輸系統恢復，做經理的銅匠將

工廠恢復得能工作時，他們除了相信外，別無他法。『誰會相信呢？』讓他們且試一試不相信看。

爲了解釋蘇聯人民羣衆在革命的年代中始終是表示異常的堅忍，許多外國觀察家，依照舊日的習慣，依賴於俄國人品性的『消極』。革命羣衆耐性地忍受他們的痛苦，但不是消極地。他們正用他們的手創造一較好的將來，他們不惜任何代價要創造牠。讓階級的敵人只試一試將他們的意志，從外面強加於這些忍耐的羣衆之上！他最好是不要做這種嘗試罷！

九 革命在歷史中之地位

讓我們現在在完結時，試確定十月革命不僅在俄國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在一九一七年八個月的期間，兩個歷史的曲線相交。二月的革命——即

過去幾世紀在荷蘭、英國、法國，幾乎全歐洲大陸的領土上所進行的偉大門爭之延遲的回聲——的地位是在一串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十月革命宣布和開始無產階級的支配。正是世界資本主義在俄國領土上第一次遭大的失敗。鎖鏈在其最弱的一環破壞。但這正是鎖鏈破壞了，原不僅一環而已。

資本主義之爲一世界系統已過了時。她已不能實踐其主要的使命：增加人的能力與人的財富。人類不能停止在其已達到的水平。只有一強有力的增加生產力和健全的、計劃的即社會主義的組織生產和分配，才能保障人類——全人類——一體面的生活標準，和同時給他對於自己的經濟以寶貴的自由感覺。兩種意義的自由：第一，人將不再被迫將其一生之大部份時間致力於體力勞動。第二，他將不再依賴於市場的法則，即是那些在他的背後生長起來的盲目的與黑暗的勢力。牠將自由建立起他的經濟，即是，依照着計劃，手上有南針。這次是將社會的形

體充分的去照愛克斯光線發現其一切的秘密，使其一切功用受集體的人類的理智和意志的支配。在這一意義上，社會主義在人類歷史的進展上必成爲一新步驟。在我們最初用的石斧武裝着自己的祖先之前，整個的自然是最秘密的與敵視的力量之陰謀。自那時以後，自然科學與實用的技術攜手，已將自然的最秘密的深處都光照到了。物理學家用電的能力能判斷原子的細胞。科學容易解決鍊金家的任務——將肥料變成黃金和將黃金變成肥料——的時候已不在遠。從前自然界爲妖魔所主宰的地方，現在爲人的工業意志所愈益勇敢地支配起來了。

但當人與自然角力勝利時，他幾乎像蜂蟻一樣盲目地建立他與別人的關係。他很遲慢地和最不堅決地去接觸人類社會的問題。他以宗教開始，過渡到政治。宗教改革爲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理主義在久爲死的傳統所統治的領域中的第一次勝利。批評的思想由教會過渡到國家。從與專制主義及中世紀的等級爭鬥而

誕生的主權在民和民權的學說愈益變為強有力。議會制度即由此而生。批評的思想又侵入政府行政的領域。民主主義之政治的唯理主義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最高的成績。

但是在自然與國家之間有經濟生活。技藝將人從地、水、火、風、雷、原子的專制中解放出來，只是將他隸屬於自己（技術）的專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隸了，却做了機器的奴隸，更壞些的是做了供給與需要的奴隸。現在的世界危機特別悲劇地證明能下沉海洋之底，能上升到平流層（Stratosphere）的高空，能在電波上與兩極的人作談話的人，這一驕傲的與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仍是他自己的經濟的盲目力之奴隸。我們時代的歷史任務正在於用合理的計劃代替未被監督的市場作用；在於訓練生產的力，強迫牠們諧合地在一齊工作和順從地服役於人類之需要。只有在這一新的社會基礎之上，人纔能舒伸他疲倦的肢體和每一人及每一婦

人，不僅是出類拔萃的少數，在思想的領域中變成「完全的公民。

但這還不是路程的完結。不是，那只是其開始。人稱他自己為創造之王。他有權利這樣稱自己。但是誰說過，今日的人是人的種類中之最後的和最高的代表呢？不是的，在身體上與精神上他離開完成還很遠，他在生物學上為不成熟的早生，心中有病和沒有新的有機的平衡。

固然人類不止一次地產生出思想與行動的巨人，高舉在其同時代的人之上，如像綿延的山脈中之山尖一樣，人類有權利因為有亞里斯多德、莎士比亞、達爾文，貝多芬 (Beethoven)、歌德、馬克思、愛迪生、和列寧而自豪。但是何以他們是如此稀少呢？首先是他們幾乎沒有例外地從上等與中等階級中出來的。除了極稀有的例子以外，人民的被壓迫的深處的天才的火星，在他們能爆發為火燄之前即被窒息了。但也是因為創造、發展、和教育一個人的諸行程，過去和現在仍

是一偶然的事情，未爲理論與實際所照耀，不受意識與意志的役使。

人種學、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已積累了山高的材料在人類前面以全部範圍地提出完成和發展身體與精神的任務。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以弗羅伊德 (Sigmund Freud) 的高明的手已揭開了詩歌上稱爲「靈魂」的泉源的蓋子。啓示了甚麼呢？我們的自覺的思想只是黑暗的心理力的工作的一小部份。有學問的潛水家降到海底，攝取神秘的魚的照片。人的思想降到他自己的心理源泉之底，必能開發靈魂的最神秘的動力和使這些動力受理智與意志之支配。

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會之無政府的力量，人將開始在自己上工作，在化學家的杵與蒸溜管中。人類第一次將認自己爲原料，或最多只是一生理的與心理的半製成品。社會主義在另一意義上說，亦將是由必然的領域到自由的領域的一躍，即是今日的矛盾與不諧和的人將爲一新的與更快樂的人開闢道路。

蘇聯經濟中的危機

五年計劃的前夕之形勢

五年計劃頭二年的成績，對全世界資產階級證明無產階級革命比在開始時所看出的更是一件認真的事情。人們對蘇維埃的『試驗』之興趣與日俱增。有些國家著名的資產階級出版物開始發表比較客觀的經濟消息。同時國際共產主義的報紙利用蘇維埃報紙的最可觀的估計，粗俗的誇大牠們，意在於宣傳的利益，將這

些估計變成一種經濟的神話。

對於如十月革命如此複雜的一事實，不忙着忙地構成一意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高興地歡迎在五年計劃的統計中，發現了對於他們的遲遲的同情之佐證。他們最後慷慨地『承認』蘇維埃共和國，以爲其文化的與經濟的成就之酬報。這一精神上的英勇又給他們中許多人以減價游歷蘇聯的機會。

實在，擁護第一工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比贊助紐約倫敦銀行家的野心應當得多。但是人們從這些紳士們對蘇維埃政府之熱烈的同情和從亞姆斯特丹反對戰爭大會對於軍國主義之厭惡，同樣得到不了什麼。

像韋伯夫婦 (Webbs) 那一模型的人們 (韋伯夫婦並不是這羣人中之最壞的) 自然不會爲了蘇聯經濟的矛盾而絞腦汁的。他們一點也不担任什麼，主旨在力求利用蘇聯的勝利，以羞辱或推動其本國的統治階級。一個外國的革命成爲他們的

改良主義的附帶的武器。爲了這原故和爲了他們個人內心的安寧，『蘇聯的朋友』協會和國際共產黨官僚在一齊需要描劃蘇聯內的成績盡可能的平坦、純粹和舒服。誰攪擾了這一畫圖的就是敵人和反革命者。

過去兩年將過渡制度粗俗的和有害的理想化，是在各國共產黨的報紙中特別根深蒂固，這即是蘇聯經濟的矛盾與不平衡，已在官式的蘇聯報紙中表現出的時期。

沒有比建立在神話與小說上面的同情還更動搖不定的。爲了得到他們的同情需要僞造的人是靠不住的。蘇聯經濟的將至的危機——或將在較近的將來——必然將使許多人失望，打擊朋友們，使其變得冷淡，縱假定不是敵視。

更壞些和更嚴重些的是蘇聯經濟將突如其來的襲擊歐洲的工人，主要是共產黨員，使他們更得接受社會民主黨的批評，這種批評是絕對敵視蘇維埃與社會主

義的。

在這一問題和在一切別的問題上，無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是實話，只要實話。在這一小冊子的範圍之內，我認爲必須將蘇聯經濟的矛盾，不完全和牠的許多不穩的成績，領導者粗野的錯誤，和在社會主義的路上所擺着的危險，都依照他們的尖銳性敘述出。讓我們的小資產階級的朋友們任意用他們的顏色去渲染。我們認爲，將那些足以引起敵人乘隙打進來和不足辯護的弱點，都用大黑線標出來，這是更正確些。說我們敵視蘇聯的喧嘩聲，是如此荒謬，於是在他自己以內即有其解毒劑。最近的將來，將重新證實我們的正確。左派反對派教工人們預見危險，和在危險逼近時不要張皇失措。

那些只因無產階級革命有一切舒服和終身的保障而接受牠的人是不能同我們一道走的。我們是接受工人的國家如他的現狀那樣，我們宣告說，『這是我們的

國家」。無論其承繼的爲落後，無論飢餓與不潔，無論官僚的錯誤與甚至可厭，全世界的工人們，必須竭全力地保衛他們的在這一國家之內的，將來的社會主義祖國。

首先，我們服務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地方，即是告訴工人們關於這一工人共和國的實話，因此教他們爲較好的將來安置道路。

蒲林磯波，十月二十二日，一九三二。

計劃的藝術

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國家的基本法律，首先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的前提。在許多年的過程中已創造了集中管理經濟的國家機關，而且也工作起來。偉大的創造工作開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國內戰爭中所破壞的一切已重建起來了。新的偉大

企業、新工業、和一些整個的工業部門都創造出來了。事實上已經證明了組織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能力，能用新方法指揮經濟，並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創造物質價值。這一切是在世界資本主義衰敗的背景上完成的。社會主義之爲一種制度第一次不是在『資本論』的書上，而是在水電站和溶鐵爐一類的實踐中證明其應當獲得歷史的勝利。不消說得，馬克思也是喜歡這一證明的方法的。

然而輕率的說蘇聯已走進了社會主義的說法是有罪的。成績固是很大，但是達到事實上戰勝經濟的無政府、克服不平衡、保證經濟生活的諧和這樣的境界，前面還有很長和很艱辛的路程。

即使第一次五年計劃，顧及了各方面，就事物的本性說，她不能不是一種最初的和粗略的假設，須要在工作過程中作根本的改造。經濟完全諧和的制度是不能預先創造出來的。計劃的假設不能不包含舊的不平衡和必然發展的新的不平衡

在內。集中管理不僅含有大優點，而且含有錯誤集中的危險，就是將錯誤發展到過高的程度。只有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的調節這計劃，局部的和整個的改造牠，才能保證牠的經濟效能。

社會主義計劃的藝術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獲得政權時起即會完全生長起來的。這一藝術只有在鬥爭中逐步地達到，不是靠單個人而是靠千百萬人的鬥爭，牠為新經濟與文化之一部份。在十月革命第十五週紀念時經濟管理的藝術仍在水平極低的狀態，這沒有可以驚異和悲觀的。『工業化』報認為『我們所工作的計劃極不完善』。（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然而中心的問題正在於工作的計劃。

我們已不止一次着重地說：『在不正確的計劃之下，或者更重要的，在執行期中不正確的調節這計劃，則五年計劃行將完結時，將有危機的發展，而在利用

和發展其無疑的成績上，可以造成不可超越的困難。」（反對派公報，七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一年，第二十三期）正因此理由我們認為倉卒的和純粹偶然的「將五年計劃變為四年是輕率的冒險行動」。（同上）我們的耽心和警告不幸完全被證實。

五年計劃之初步估計

現時五年計劃四年真正完成（或更精確些說，四年三個月），連談也談不到。最後兩月最狂熱的拼命加工對於整個的總結將沒有什麼影響。現在還不能在經濟上決定第一次計劃實現的真正百分比。報紙上公布的材料更帶形式上統計的性質而非精確的經濟性質。如果一新工廠建設完成了百分之九十，而因為原料的缺乏，工作停頓。那麼從形式的統計觀點我們可以說他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但從經

濟的觀點上說，這種消耗的費用應直接了當認為是屬於損失項下。已建設的或正在建設過程中的工廠之真實效用的結算，從國家經濟的平衡上說來，是完全屬於將來。

但是得到的結果，無論就其自身說是如何莊嚴——即使單就赤裸的量的觀點上說——然而距計劃上所規定的則尚遠。

煤的生產現在還是維持在去年的水準之上，因此距離五年計劃第三年的數目字還很遠。真理報埋怨說：『頓巴斯(Donbas)蘇聯大產煤區——譯者——落在蘇聯工業的最落後的部門之末尾』。『燃料問題的緊張是在增加』，工業化報(十月八日)響應着說。

一九三一年鐵的產量是四·九百萬噸而非如計劃中規定的七·九百萬噸；鋼五·三百萬噸而非八·八百萬噸；鋼片四百萬噸而非六·七百萬噸。與一九三〇

年的數字比較，這是說鐵的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二；鋼減少百分之六，鋼片減少百分之十。

在一九三二年九個月中，鐵的生產為四·五百萬噸，鋼四·一百萬噸，鋼片三·五百萬噸。一方面，鐵的生產大量增加（新溶鐵爐！）而鋼與鋼片的生產在今年差不多留在去年的水準上。從工業化一般任務的觀點上說，重要的自然不是生鐵而是鋼片和鋼。

這些量的結果經濟生活報稱之為『可驚的降低』，但此外還有極其不利的，就後果說更為危險的質的降低與之平行。真理報跟在專門經濟刊物的後面公開承認在五金重工業中『關於質的指數的形勢是不允許的』。『鋼中不及格的生產品大大超過於及格的。』『使用裝置之技術的係數急劇地惡化。』『生產品的成本急劇的增加。』只舉出兩個數目字就夠了：在一九三一年鐵的每噸成本為三五盧

布；本年的上半年則增加到六十廬布。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銅的開採爲四萬七千噸；一九三一年四萬八千噸，只當計劃中規定的三分之一。本年計劃已減至九萬噸，但是頭八個月所開採的，還不足三萬噸，這對於機器的製造，尤其對於電氣機器的製造有何意義，用不着說了。

在電氣化領域內雖有很多成績，但還是落後好遠。在八月，電氣站台所供給的能力只當他們應供給的百分之七十一。『工業化』報說：『不合理的盲目的和不文化的剝蝕電氣站台。』在電力生產的領域內在今年冬季將有大困難威脅，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區域這些困難，已經開始了。

去年輕工業異常落在計劃後面，在本年上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但在第三季復減低至去年的數字之下。食品工業的成績最壞。重工業工廠所供給的羣衆消

費生產品之補足生產，在八個月中只構成計劃上所規定的每年數目的百分之三十五。我們現在還不能估計這些倉卒生產出的商品，那一部份真能合於市場的需

要。

工廠的煤和原料是用電報供給的，如經濟生活報所說的，工業『坐在電光之上』。但是縱使電報也不能得到實際中所沒有的東西。

急躁開採與分類不得當的煤妨害生產焦煤的企業的工作。焦煤中濕度和灰燼的增加，不僅減少了所製的鋼幾百萬噸，而且降低牠的質。由壞鋼鐵所製成的機器生產惡劣的商品，得到機器停頓的結果，勞動力被迫休息，而且很快的退化。

報上告訴我們，在烏拉爾，『鎔鐵爐發生了熱病』，因為燃料的供給不適當，讓牠們冷下來了三天到二十天。這是最富於意義的事實：烏拉爾鐵工廠運送燃料有其自己的車，今年二月拖車的馬數為二萬七千，七月減至一萬四千；九

月減至四千。其原因是缺乏飼料。

史大林格勒 (Stalingrad) 的耕種機製造廠每年生產量由二百五十噸減至一百四十噸，真理報解釋說：「因為缺乏初步的和常用的技術監督、裝置……已過度的損壞了。」『做壞了的生產品增高至百分之三十五。』『髒物充滿了各行間的機器。』『在鍊鋼廠中，大家從不想一想明天。』

在鉅大的投資之情形下，何以輕的五金工業的生產降低呢？真理報回答說：因為「一個大公司的各間的生產能力沒有聯結好」！然而使各間聯結好的任務已為資本主義的技術解決了的。試想獨立的諸企業之間，和整個工業的各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結，更如何的困難！

工業化報說，「波多爾斯基水門汀工廠是在危險的困難中。上半年的生產計劃完成了百分之六十，而在近幾月中則減低到百分之四十。……成本比計劃上所

定的要高兩倍。』這種估計可以在不同的程度內應用於現在的全部工業。

行政機關追求數量引起了質量之可怕的降低，質量的減色在第二階段破壞了為數量的爭鬥；經濟上不合理的『成績之最後的成本往往超過這些同一成績的價值許多倍』。每一先進的工人不是經過共產主義研究院的書籍（咳！更壞的貨物）而是在實際中，由於在他們自己的礦坑、工廠、鐵路、電氣站台等處獲得的經驗懂得這一辯證的。

瘋狂的追逐數量之後果也完全侵入教育事業中去了。真理報不得不承認『降低了準備的質量，忽略了科學的科目，或以跑馬的速度看過這些科目，於是按照這種步驟進行的高級技術學校，沒有幫助工業而只是損害了牠。』但是誰負這種最高教育機關『跑馬式的速度』的責任呢？

假使我們在官方的材料中加進一關於質量的修正係數，我們即可看出計劃實

踐的指數馬上會大大的降低。甚至庫貝什夫在一年多以前也不得不承認這點。他在最高經濟會議的會議席上很謹慎地宣告說：『如果我們顧及質量的變化，則關於工業巨大生長的數字即變成了相對的。』拉可夫斯基說得更為明顯，『假使人們不計及質量，則數量的指數所表示的只是總計的假話而已。』

資本的建設

兩年以前，拉可夫斯基警告說，計劃所規定的非現存資源所能勝任。他說：『無論就計劃中所規定的生產生長之程度，或是所擬的資本建設，都是沒有準備的。……在工業領域中一切從前的政策，實際只限於加緊使用舊日的固定資本，……一點也沒有顧慮到將來。』在資本建設的領域中，想用突進的方式來補償缺陷是最不實際的。為實踐計劃所必需之資源『在國內得不到，而且在最近的將來

也得不到。」所以他警告說：「資本建設的計劃將發生極大的崩裂。」

這一預見也是完全被證實了的。在建造的區域內，早在一九三一年即已表示出極端的落後。今年落後的程度更增加。九個月的運輸建造計劃，依照運輸機關自己的估計只實踐了百分之三十八。在其他的區域內關於建造的事情往往更壞些，最壞的是房屋建築。材料和貨幣的資源分散在過多的建設事業中，因之減低了投資的成效。

在巴爾哈的銅廠裏用了六千五百萬盧布。用費還在逐日增加，實際上等於用在空地方：爲了繼續工作，必須在一年內運輸三十萬噸的重載，可是現有的運輸總共只能供給兩萬噸。這種類似的例子，雖不如是之明顯，多得很呢。

材料和裝置之質的惡劣，對於資本建設影響最爲嚴重。「製屋頂的鐵，質量更劣——真理報說——竟致一觸即斷。」

資本建設區域內的驚人的落後，自動地損壞了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基礎。

內部不平衡與世界市場

生產的諸成分之均衡，和經濟的各部門之均衡問題，構成社會主義經濟的核
心。解決這個問題的迂緩的道路，是任何地圖上沒有指出的。發現，正確點說，
修築這些道路，乃是長久的、艱辛的將來的事業。

因為存儲機件的缺乏，而使全部工業停滯。因為缺乏皮帶的原故；紡織機不
能不停止工作。『批發出去的生產品之分類，
經濟生活報論廣泛消費的商品
說——是隨意的，不適合於……需求的。』

在一九三二年的前半期裏，重工業停頓壟滯起來的原料，未完成的生產品，
乃至工廠堆棧中之已完成之製造品等存貨，達十萬萬多盧布。（工業化雜誌一九三二

年九月十二日)。這即是據官式的統計用貨幣表示的一些不平衡和不調諧。

大小的不平衡，引起了對於世界市場的轉向之需要。十個盧布的輸入品能夠把幾千幾萬盧布的本國生產品從死態中挽救出來。一方面經濟一般的發展，另一方面，新的需要和新的失衡之發生，不變地增加與世界經濟聯繫起來的需要。『獨立』的綱領，即蘇聯經濟之自足性，愈暴露了她的反動的空想的性質。經濟自給 (Autarchy) 是希特勒的，而不是馬克思列寧的理想。

從五年計劃開始時，鑛砂的輸入，以量言，增加了五倍，以價格言，增加了四倍。如果今年這一項商品的輸入縮減了，那只是因為國外匯兌的原故，可是工廠機器的輸入，却又大大的增加了。

加干諾維齊在其十月八日講演裏肯定的說：左派和右派反對派向我們提議，須加強我們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依賴。似乎是某種人工的和任意的步驟，而不是

經濟發展的自動邏輯！

同時，蘇聯的出版物帶着稱讚的論調，引用梭可爾尼哥夫離開倫敦以前的談話：『在工業上和技術上蘇聯國家的進步地位，是不列顛工業生產品的廣大得多的市場，這件事實在英國已經有了更廣大的承認。』蘇聯經濟進步的特徵，梭可爾尼哥夫認為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牠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因此加強了牠對於世界經濟的依賴。過去左派反對派的梭可爾尼哥夫是不是私運『托洛茨基主義違禁品』呢？爲什麼在這個場合裏，官式的出版物把牠掩飾起來呢？

工人生活狀況

史大林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演講裏，帶着很好的『六個條件』，反對生產品質量的惡劣、成本的增高、勞動力的移動、浪費的比率過高等等，從那時起，沒

有一篇文章不援引這個「歷史的講演」的。但是六個條件所應治好的病症反而更沉重了，並帶了更惡的性質。

官式的出版物一天一天的證明了史大林救濟策之破產。真理報解釋生產的減低說，「工廠的勞動力減少，工人的移動增加，勞動紀律削弱。」（九月二十三日）紅色的烏拉爾工業組合之生產率異常低落的原因，工業化報除認為「組合各部份的驚人的失衡」外，並指出：（一）「勞動者大的移動性」；（二）「工資的削減政策」；（三）「工廠工人住屋之未能完備」；（四）「工廠工人食品之惡劣」；（五）「勞動紀律嚴重的墜落。」我們逐字逐句的引證下來。關於超過了一切限制的移動性的事實，工業化報說：「工人的生活狀況在一切五金企業中是可怕的。」

機車工廠之產量，在今年前三季中減少了二百五十具，「熟練工人表現出特

別的不足。只是在一個高里門工廠中，「夏季中就有二千多工人離開工廠。」原因是：『生活狀況的惡劣』。沙路摩夫工廠的『廚房是一種最壞的飲食舖』。（工業化報九月二十八日）史大林格勒優良的耕種機工廠裏，工廠廚房的工作急劇的惡化了（真理報九月二十一日）。工人的不滿達到如何緊張的程度，才會使這些事實在史大林的出版物上表現出來呵！

不消說，在紡織工業裏的情形，也不會比較好一些的。經濟生活報告告訴我們說『單在一個伊凡諾夫斯基區差不多有三萬五千的熟練工人離開工場』。根據這個報，在國內有工廠每月更調工人至百分之六十之多的。『工廠成了穿堂』。

關於『六個條件』之遭遇到嚴重的打擊之說明，許久以來只是限於誣蔑經理和工人而已，說是他們『無能』、『不願』、『滿於現狀』等等。但是最近幾月來，報紙也常常指出——雖然是很吝嗇的——壞處的真正根源——即工人生活條

件之不可忍受。

拉可夫斯基在二年之前指出了這個原因的原因，他說：『荒嬉增加的原因，勞動紀律墜落的原因，工人移動數量增加的原因，就是由於工人體力不能担負起過於吃力的重載。』

但是，爲什麼生活條件惡劣呢？乃是『對工人生活及必需品供給問題輕視（！）的態度所致』。（工業化報九月二十四日），報紙是這樣來說明這個問題。這一句短短的話，史大林的刊物說出了比其所要說的還多得多。在工人國家中對於工人的需要『輕視的態度』，只有妄自尊大的和無監督的官僚才會如此。

這種冒險的說明之所以需要，無疑的是用來掩蓋基本事實 即供給工人當前需要的資料的缺乏；國民收入之不正確的分配；經濟事業之規定，毫不顧及現實的財源；愈益增加的不人道的重担加在工人肩上。

食品供給的「中斷」的話，現在在蘇聯報紙上每一期都可看到。營養不良還要過度勞動！這兩個條件的結合，已足以損壞裝置和使生產者自身耗竭。真理報爲安慰起見，登出一女工喂「她自己的」私豬的照像。那實在是出路。該報（十月三日）教育人說，「家庭私經濟從前將工人束縛於資本主義，現在牠將工人附着於社會主義，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某一時候，我們知道家庭私經濟有賴於奴役婦人，爲一般社會奴役之最可厭者。但現在似乎「牠自己的私豬」便是將無產階級附着於社會主義。這樣虛偽的官僚們將殘酷的不得已變爲德性。」

因爲營養的惡劣和精神的疲憊，產生對於周圍環境的冷淡，結果不僅是舊的工廠，即以最新技術而建築的新工廠，很快的陷於死的狀態。「你試——真理報放出了這樣的呼聲——找！找有沒有一個冶鐵爐不在渣滓中打滾的！」

精神條件亦不比物質的條件好。「工廠的經理處是與羣衆隔絕的。」（真理報）

『赤裸裸的命令和叱責』，代替了對於工人的合理的指導。這裏說的是某一工廠的個別場合。但是，真理報却不知道，個別場合的總和便構成了史大林的統治。

整個的鐵工業中，『沒有一個工廠委員會的工作，是多少能令人滿意的』，（工業化報九月十三日）可是，爲什麼在工人國家中，工廠委員會——是全部工業，而不祇是鐵工業——的工作不令人滿意？不是黨的官僚將牠們絞殺了嗎？

在澤爾印斯基機車工廠中，祇是在一個鐵匠的支部委員會議上，就有：十八件開除黨籍的案子，輪工中，九件，鍋爐工人，十二件。這類的事情並不限於個別的工廠。各處都是命令主義統治着。對於下層所出的主意和批評，官僚主義的唯一回答就是壓制。

國際左派反對派的綱領草案說：『工人生活的水平以及他們在國家中的作

用，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最高標準。『如果史大林的官僚主義是從這個觀點上解決經濟計劃的任務及活潑地調節經濟——我們在二年之前說過——則他不會每次都得到失敗，不會被迫而進行浪費的曲綫政策，亦不會遇着政治的危險。』（反對派

公報第二十三期第五頁）。

農村經濟

真理報九月二十八日說：『蘇聯的農村經濟，已經在到社會主義的途程中得到了鞏固的基礎，』然而這只是以農戶和土地的集團化爲一般的引證而已，不過是對於農村經濟的真實狀況和城市與鄉村的相互關係開玩笑罷了。

僅僅追求集團化的新紀錄，毫不計算鄉村經濟之技術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潛伏可能，實際上，只產生了失敗的後果。集團化在沒有產生較高級的經濟刺激之

蘇聯經濟中的危機

前，她破壞了小商品生產者的刺激。在工業中，行政方面的壓制，很快消滅了自己，在農村經濟中，表現得又是完全無力。

據真理報的記載：高加索的農村，春天的播種運動中是得到了獎章的。耕作結果是如此可憐以致田中長滿了莠草。高加索鄉村是行政機關在農村經濟範圍中大聲追求量多的象徵。百分之百的集團化結果是田中百分之百的長滿莠草。

集團農場上分配了一萬架耕種機械。偉大的勝利！但是，如無數的地方報紙消息顯出來的，耕種機的效用與她的數量遠不相合。在一個新的波爾達瓦機器站，「在不久以前得到的二十七架耕種機中，十九架已經大大損壞了。」這個數目字並不是例外的情形。在窩瓦烏克蘭上的一機器站共有五十二架耕種機，其中兩架從春天就未能從事工作，十四架在修理之中，在餘下的三十六架中，祇有一小半在播種時用，「就是這幾架也是輪流的休息着」。十萬架耕種機中有用的工

作着的係數，是還沒有被決定呢！

在眩人眼目的百分之百的集團化時，拉可夫斯基曾提出嚴重的診斷：「從前全部政策所準備下的，和極左冒險時期使之更趨嚴重的結果之總和，主要是農村經濟的生產力之降低，在牧畜事業上既無可爭地明顯，在種植專門原料的農業之一部份也明顯，以及種植糧食的範圍也逐漸更顯著起來。」

拉可夫斯基錯了嗎？不幸，他沒有錯。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下了小的不重要的命令在蘇聯的出版物上毫末加以評論。但再沒有比牠所引起的印象為更可驚的。加里寧和莫洛脫夫簽字的命令，告訴農民爲了集團農場的需要和經農場的要求，有把自己的馬以約定的價格交出來的義務。集團農場必須把這些馬「原狀地」歸還牠們的所有者。

這就是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部份和小生產部份的相互關係！耕種百分之八十

至百分之九十土地的，而且理論上應以自己的成績吸收私人參加的集團農場，實際上原來不得不訴之於國家立法的助力，以強迫的手段從私人中取得牠所需要的馬匹供自己之用。這裏完全是顛倒了。九月十一日的這個命令，就是史大林、莫洛脫夫政策之死刑宣判。

城市與農村連環之建立問題

在這樣的物質生產基礎上，能否改善城市與鄉村的相互關係呢？

再申說一次：只有到了國家取得農村經濟生產品，不是對大多數的農民採取行政的高壓政策時，即爲交換機器工具和消費品，農民自願供給國家以必需的食糧和原料時，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才可說是有了完全的保證。只有站在這基礎上，集團化——與國內國際其他必備條件在一齊——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性。

工業品和農業品的價格關係之變動，無疑的是利於農民。不錯，在這問題施行某種近於實際的清算，乃是難以實現的任務。比方真理說：「一百磅牛奶的價格，各集團農場是在四十三至二百零六個盧布之間變動着。」國家價格和秘密的市場價格之間的差異更大。工業品的價格，因其達於農民之道路不同，也有莫大的差異。我們固然不能詡為精確，但可以說，「價格的剪刀」，就此名詞的狹義說，已為農民所關攔來了。因為鄉村已開始，為其自己的產品得到如此之多的貨幣，足以使牠（鄉村）能購買依照國家定價的工業品（假使能得到這些工業品的話）。

但是，最重要的不平衡之一，即在於實有的商品不符於實有的貨幣。用貨幣流通的話來說，這就是貨幣膨脹。用計劃經濟的話來說，這就是計劃誇大，特別是力量 and 財富在生活資料的生產和生產手段的生產間之不正確的分配。

當價格關係轉向不利於城市的時候，後者遂以『封鎖』商品來防守自己，即不把商品放入流通過程，而截留在自己的手中，施行其官僚的分配。這就是說只是剪刀的貨幣暗影已關攏自己的刀口。而物質的不平衡依然存在着。但農民對影子是無興趣的。商品缺乏，推動了和繼續推動着農民走上糧食罷工的道路：他不願單爲了貨幣而把自己的糧食讓出來。

交換對於兩方，既都不是簡單而有利，食料和農村原料的收買依然和從前一樣，要用一種政治的手段，每次都動員國家和黨的機關。真理報（九月二十六日）謹慎的說：『許多集團農場——抵抗糧食的收集，把牠收藏起來。』我們知道『許多』二字，在這個地方是什麼意思，若是農村同城市的交換是有利的，則農民藏起他們的糧食是毫無理由；若交換無益，就是說，交換只是強制移轉的方式，那麼，便是全部的集團農場（不只是『許多的』）以及個人的所有者都企圖藏匿。

農民之供給肉類的義務，現在是帶有實物稅性質，自然發生一些高壓的後果。百分之百的集團化的經濟結果，這些事實的說明是比赤裸裸的農戶集團化的統計還正確得多。

反對毀壞社會主義財產的嚴厲立法之頒佈，正是表現糟的程度。其在鄉村中糟的意義，便是說農民力求不經社會主義，而求經資本主義的道路把自己的食料交出來，投機市場上價格如此的高，使國家不得不用嚴刑去對付。那一部分的糧食是走向了投機的道路呢？

在窩瓦裏海漁業托拉斯裏，有人計算百分之二十之魚落在私人的市場。真理報懷疑的問：「實際上究竟是多少呢？」鄉村經濟中偷竊的比例應該還要高得多。然而，就是以百分之二十來說，實際就是千百萬蒲特的麵包。高壓誠爲不可避免的自保手段。不過，牠却不能代替連環的建立，牠不能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經

濟基礎，甚至不能保證糧食的供給。

因此政府不能停在高壓政策上面。在爲食料和原料的鬥爭中，牠感覺到不能不令城市啟封工業品。最近幾月來，羣衆消費的商品加倍的向農村中運送。然而城市中，尤其是各省城市中，國家的和合作社的商品則空空如也。

今年與農村建立『連環』的結果，現在還未清算。但城市中的商業孔道是涸竭的。『我們給農村的商品過多了——加干諾維奇十月八日在莫斯科說——我們得罪了都市，若是可以這樣的說。』完全可這樣的說：省市和工業區域被得罪了，即工人被得罪了。（註）

（註）一九一九年時，普列奧波拉爾斯基（過去的托洛茨基派——譯者）爲要是認自己的投降，預言說：經過蘇維埃農場和集團農場，黨在二年中將迫富農屈服。過去了四年。怎樣了呢？雖然不是富農——他『被消滅了』。——但也是殷實的中農使蘇維埃的商業屈廢了，即強迫牠得罪工

人。如我們所看見的，無論如何，普列奧波拉因斯基是太着忙地跪在史大林的官僚的面前了。

計劃經濟之條件和方法

製定和執行計劃的機關是那一種呢？牠的覆核和調節計劃的方法是什麼？牠的成功條件是什麼？

在這關係上，我們必須將三種系統加以簡單分析：一、特殊的國家機關，即中央和地方各層的設計委員會；二、貿易，為市場調節的系統；三、蘇維埃的民主主義機關，是羣衆對經濟結構之活的反應的組織。

。若果世界上真有拉波拉斯(Laplace)的科學幻想所想出的偉大的天才存在；牠(天才)能同時登記自然界和社會中之一切過程，衡量牠們運動的力學，預知牠們互相作用的結果——自然，這樣的天才能先天的製定無缺陷的完美的經濟計

劃，從小麥的地畝數量起以至於西服上身的鈕扣止。實在，官僚正是常常以爲自身具有這樣的天才：所以，他們很容易的脫離市場和蘇維埃民主主義的監督。其實，官僚估計他們的才力可怕的錯誤了。他們的創造力在實際工作中，不能不依賴於由資本主義俄國所承襲下來的平衡（同樣的可以說是不平衡）；依賴於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的資料；最後，依賴於蘇聯經濟建設的成效和錯誤的經驗。但就是最正確的聯結一切這些成分，只能允許製定一計劃之最不完全的輪廓，不能再多一點。

經濟的無數活的參加者，國家以及私人，集團以及個人，必須使人認識他們的需要以及他們的相對的力量，不僅僅經過設計委員會的統計材料，而且靠需求和供給的直接壓迫。計劃是經過市場覆核和大部份經過她而實現。而市場的調節應依據由她（市場）的中介所表現出來的傾向。公事房中的計算應該經過商業的

核算來證明其經濟的適當。過渡時期經濟制度不能沒有盧布的監督。這就先要盧布等於她自己。沒有穩定的貨幣，商業的清算，只是增加混亂而已。

經濟建設的過程，現在還不是發生在無階級社會中。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是計劃的中心。她與階級鬥爭及社會諸集團的鬥爭及無產階級中各階層之鬥爭的直接發展一齊變動着。重要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問題是：城市與農村的連結，即是工業從農村經濟中所取得的和他所供給於農村的之間的平衡，積累和消費間的相互關係，資本建設的基金和工資基金間的相互關係；各種勞働（熟練的與不熟練的工人、職員、專家、管理的官僚）之工資的調節，最後，落在農村中的國民收入那一部分在農民中各層間的分配。一切這些問題，就其本性言，不能容許官僚們作先天的決定，這些官僚們是脫離了有利害關係的若干萬人之干涉的。

成爲計劃的基本因素的生活利益之鬥爭，引我們到了政治的領域，所謂政治。

就是集中的經濟。蘇聯社會中之社會集團的工具是（應該是）：蘇維埃、工會、合作社、而最重要的是統治的黨。只有經過三種成分——國家的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主義——的互相作用才能實現過渡時期經濟的正確管理，和只有這樣能保證——不是在幾年之內完全克服矛盾和不平衡（這是空想！）——矛盾的減弱，並以此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直至新的勝利的革命，擴大社會主義計劃的戰場，並重新改造牠的制度。

新經濟政策的停止、貨幣膨脹與蘇維埃民主主義的取消

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必要，即市場關係的恢復，在那時候首先是由於二千五百萬獨立的農民經濟之存在所決定的。但這不僅是說，集團化在其最初階段引到市

場之取消。集團化能成爲活的因素，只是在集團中團員的個人利益仍存在，不過根據商業計算來製定她們的相互關係以及集團農場與外界的關係。這就是說，正確的與經濟上健全的集團化，在現階段上不是引到取消新經濟政策，而只是牠的方法的逐漸改組。

但是官僚們一意孤行：起初他自己以爲她所走的是抵抗最少的道路，無產階級之集中的努力所獲得的真正的無可爭辯的成功，他們認爲是他們先天計劃之成功。換句話說：官僚認他們即代表社會主義革命。她以行政的集團化來掩飾未曾解決的建立與農村經濟之連環的問題；因爲經過新經濟政策遇到了不平衡，他們就取消了新經濟政策。她以擴大強迫的方法來代替市場的方法。

貨幣單位之安定爲新經濟政策之重要的武器。可是官僚們在其眩暈的時候，認爲他已是雙足堅定地站在經濟諧調的基礎之上了；今天的成功自動保證以後的

成功之源源而來，貨幣對於經濟計劃的發展不是控制，反之，而是供給資金的獨立來源。官僚不去調節經濟行程中之物質成份而是借印刷機幫助以填窟窿。換句話說，採取了『樂觀』的貨幣膨脹政策。自行政的停止了新經濟政策後，著名的史大林的『六個條件』——經濟的計算、計件付工資制度等等，變成了空洞的綴字。無市場關係，則經濟的計算是不可思議的。貨幣單位是城市與鄉村連環的尺度，如果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不足，工人不得不以十倍高價到市場去買他所需要的東西，那末，對於他們，一個月多幾個盧布將有什麼用呢？

恢復公開市場便是承認取消新經濟政策之不適當。不過這個承認是經驗的、局部的、無思想的、和矛盾的。把公開市場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商業的形式以與私人商業和投機對立，這只是自欺。即就全部集團農場方面的公開市場商業來說，那也是對於附近城市關於食品需要的投機，其結果是引起社會的

分化，即是，少數比較富的集團農場更富起來。但是在公開市場中佔主要地位的，不是集團農場，而是集團中的個別團員和獨立經濟者。集團中的團員以投機的價格出賣其剩餘生產品，是使集團農場內部發生分化。這樣，在「社會主義的」農村中，公開市場是發展離心力。

取消市場，以恢復亞洲式的市集來代替，官僚造成了價格猛烈跳躍的條件，因此在計劃和在商業計算之下安置了炸彈。結果是加倍增加了經濟的混亂。

與此並行的，而且不是從昨天開始的，還有職工會、蘇維埃、和黨的僵化。官僚既遇到了城市和鄉村的衝突，遇到農民中各階層的和無產階級的要求，遂更堅決的禁止任何要求、反對、和批評；她在最後所留給工人們唯一的權利，只是提高生產力的權利而已。

下層民衆之影響經濟管理的每一企圖，馬上被宣佈爲右傾或左傾，即實際上

宣佈爲犯了刑事的罪。官僚的上層在說了和做了一切以後宣佈自己在社會主義計劃內是不可侵犯的（雖然牠的同黨者和牠的出主意的人往往變成了敵人陰謀家和怠工者）。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機構——靈活的和彈性的蘇維埃民主制度——便這樣被取消了。官僚在其面對着經濟的實際及其困難時，竟只有彎曲了的和搓縲了的計劃輪廓武裝着，連他們自己的政意志也大大被搓縲了。

蘇聯經濟危機

如果五年計劃所指示的一般經濟水平僅僅實現了百分之五十，那麼我們尙不致發生怎樣的驚訝。危險不在於生長速度的遲緩，而在於經濟各部門不調諧的增加。縱使計劃和各部分先天地定得完全符合，生長的係數減低百分之五十，因其後果亦將發生大困難：製造一百萬雙鞋以代替二百萬雙，這是一回事；製鞋工廠

建設，方成一年即行停工，則爲另一回事。但是現實比我們假設的例要複雜和矛盾得多。我們承襲了過去的不平衡。計劃中所定的契約自身包含了不可避免的過失和錯誤計算。計劃之未完成不是按比例地發生的，每一企業各有其特殊的原因。如果經濟的平均生長是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五十，這可以是A部門完成了百分之九十，B部門完成百分之十；如果A部門依賴於B，則在第二次生產中，A部門將減至百分之十以下。

由此不幸的事，不是在於顯現出冒險的速度之不可能。不幸的事在於因爲工業化之競爭的突進，使計劃中各成分彼此陷入莫大的矛盾。不幸的事在於經濟在缺乏材料的儲蓄和缺乏計算之下進行。不幸的事在於決定計劃效率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工具被破壞或損傷了。不幸的事是在於積聚的不平衡將威脅着爆發更可驚的事實。不幸的事是在於不管監督的官僚，把自己的威信和將來錯誤的積聚連爲一

起。不幸的事是在危機任迫近，隨之而來的後果是工廠關閉，失業工人增加。

工業發展之社會主義的速度和資本主義的速度的差異（縱令是同從前進步的資本主義速度比較）是驚人的。然而，如果把最近幾年中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認為是最後的，那也是錯誤。資本主義發展的平均係數，不只是由其擴張時期并由其危機時期二者之和所得出。蘇聯經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近八九年中，她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她的平均發展係數還未能定出來。

自然，人們可以反駁我們，謂我們把資本主義的法則移用於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經濟無須由危機乃至故意減低速度來調節。史大林派的官僚及其理論家的證據的武庫如此有限我們常能預見他們將訴之於那一原則。在這裏他們又是說的一自明之理。因為我們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所以我們應該依「社會主義」行動，就是說以日益增加的計劃的擴張來調節經濟。可是，關鍵恰在於我們尚未走進社

會主義。計劃的調節方法，我們完全未把握得住。我們只是正在完成第一次的粗略的假設，而且完成得不好。蘇聯經濟的危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將至的危機已爲官僚準備下了。

支配過渡社會的法則，和支配資本主義的法則大不相同。但是和將來社會主義社會——即諧和的在試過的，已證明過的和有了保障的動的平衡之基礎之上生長的經濟——的法則亦不相同。社會主義的生產優勢——集中、集合、領導意志的統一——是不可計算的。但是，因爲不正確的應用，尤其是由於官僚的濫用，結果也可以適得其反。部分地已經適得其反了，因爲危機現在逼近。企圖再鞭策經濟的猛進，只是企圖加重將來的不幸。

危機將要達到什麼地步，這是不能預言的。這個問題之解決，不只是由於危機的盲目力量。計劃經濟在危機時仍保存其力量，並且正是在危機時更特別明

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不消極的等待危機在民衆身上自起自滅，或者如巴本一樣的玩弄金融把戲。工人國家則以全部實力來應付危機。一切有力量的槓桿——預算、信用、工業、商業——都集中在自己之手。不是以命令而是以經濟調節的方法首先緩和，以後又克服危機。冒險的進攻之後，需要思索得周詳的有計劃的退却。無產階級專政十六週年的任務就是在於此。『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先後退以便跳得更遠』。

蘇聯經濟在危險之中

正式的出版物，差不多每期都有誣蔑工人、經理、技師、合作社的職員和職工會的份子之件發表：他們都是未能實踐計劃、訓令和『六個條件』的罪人。但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其中並沒有客觀的原因。全是怪執行者的惡意。真理報便這

樣的說：「工作這樣的退化，有什麼客觀的原因呢？什麼原因都沒有！」（十月二日）。只是人們不願如他們應當的那樣做工作，——只此而已。十月的中執委會說明「領導之不洽人意，在所有機關中都是如此的。」不消說，這是要除去那所謂中央委員會之一機關的。

但是，難道工作質量的惡劣真沒有客觀原因存在嗎？不但是小麥由萌芽以至於成熟，需要一定時間，即複雜技術過程之領悟，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固然，心理過程比植物過程靈活得多，但亦有其一定限度，誰也不能跳越過這限度。此外——這也並非不重要——我們不能要求人們在最低的营养之下，以最高的強度勞動。

十月全會的決議誣蔑工人和行政人員不能「保持住」他們的最高的成績，且日益退化，不能達到自己定的標準。其實失敗早已包含在所達的成功之性質中。

人用一額外的努力可以擊起遠過於他的「平均」力的重量。但他不能長久擊住這重量在頭上。在此，而責其不能「保持住」自己的努力，實在是愚蠢。

蘇聯經濟在危險之中了！絲毫不難診斷出她的病源，她源於成功自身的性質中。由於過度的和計算得不好的緊張，經濟進程中斷了。人必需進行痛苦的，但是堅毅的治療。一九三〇年拉可夫斯基便警告說：『我們是走進一個整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名稱將是完全清償過去的一切。』

第二次五年計劃

第二次五年計劃係在“Gigantizm”（註）之規模上製定的。我們很難，正確點說，不能，『由眼見』而判斷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最終的指數誇張到如何程度。但這裏不是論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平衡問題，而是論牠的出發點，牠同第一次五年

計劃之接觸線。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承襲了第一次五年計劃最後一年之重担。

(註)蘇聯各界對“Gigantism”之仇視或直接憤恨正日益增加，好像是反對近幾年冒險主義之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反動。然而我們無須說明，此種小資產階級之吝嗇精神所認為過急的反動，將來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會變成危險的。

第二次五年計劃，按其圖表來說，乃是第一次五年計劃之螺旋形的繼續。但第一次五年計劃沒有完成。第二次五年計劃從開始便是懸在空中的樓閣。如果人們讓事情如過去一樣的繼續，則第二次五年計劃將以在行政的鞭策之下，補苴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罅漏來開始。然而這是加重危機。這樣便會鬧出大禍。

目前的情勢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把第二次五年計劃之開始延期一年。一九三二年應該是第一次五年計劃和第二次五年計劃之間的緩衝期。在此時期，一方面

審查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績，補充其缺陷，減輕其不可勝任的不平衡，使已曲的經濟戰線伸直。另一方面重新建立第二次五年計劃，使其出發點和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實際結果，密切的接近。

這是否簡單地把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完成延期一年呢！不是的，不幸不是這種情形。四年來量的追逐之結果，焉能從生活中一筆勾消了去。必須細心地覆核、調節，決定實際達到的生長的係數。經濟現狀一般地排斥計劃工作的任何可能。一九三三年既不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補充年，也不是第二次五年計劃之第一年。牠在牠們中間佔有獨立的地位，使冒險主義的後果緩和，並在物質上精神上準備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前提。

左派反對派當年曾首先要求實行五年計劃。然而現在他却要說：第二次五年計劃必須延期。反對鼓噪的熱心！反對投機精神！計劃工作是不能同這些相調和

的。那麼，你贊成退步嗎？是的，暫時的退步。不墜的領導之威信將如何？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更重於鼓脹的威信。

整理資本年度

失去平衡的蘇聯經濟，現在需要嚴格的整理。在資本主義之下平衡是靠危機的盲目力量來恢復。社會主義國家則可以施用自覺的理性的治療。不消說，在整理期間不能將全國的生產都停頓了，如像一工廠或一企業在修理時的停頓一樣。而且也不需要這樣。減低速度就足够了。一九三三年的生產勞動不能沒有計劃的進行，不過牠應該是一年的計劃，建立在溫和的質的分配之基礎上。

質的改善應該放在第一位。取消不合時的建設；將一切力量和資源集中在第二等重要的建設上；根據已有的經驗，使工業各部門的相互關係均衡；使各個工

廠走入軌道；裝置必須恢復。

不要追逐，不要鞭策，不要製造紀錄，但讓每一企業之生產率適合於其技術的韻律。從實驗室中拿出來太早的，應當交回去。將尚未完成的建築完成起來。整理工廠各部門間的相互關係。曲者使之直；壞了的修理好。準備工廠過渡到更高的階段。質的分配應該是有伸縮餘地和有條件的，使其不致干涉量的成績。

一九三三年應該克服勞動力的移動，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應當從這裏開始，因為這是一切的關鍵。工人及其家庭應有食品、住處和衣服。無論付如何的代價！

必須解除工廠中的管理人員和無產階級的中堅份子之次要的担負，如種植馬鈴薯、養兔等等事業。關於工廠必需品的供給，要把牠看成爲獨立的，而非副屬的任務。

整頓爲羣衆消費用的物品的生產。商品應適宜於人們的需要，不是適應於重工業相製的附產品。

堅決停止貨幣膨脹的進程，恢復穩定的貨幣單位。此種艱難和痛苦的手術將不能實現，若不是勇敢的縮減投資，若不準備着犧牲那投在不適當和不合時宜的新建設的許多萬萬，以便阻止將來的數十萬萬的損失。

在工業中和在農業經濟中都必须暫時的退步。退步的最後界限，事前不能決定。他只有在資本整理的經驗中能夠顯示出來。

經理的機關須要監督、幫助，和提出一切能夠活着和能工作的，但不像現在似的把企業趕到死路上去。行政的壓制和冒險主義之後，經濟和人力，都要相當時期的休養。

在報紙上常可看到，許多經理們獨立地得出結論，認爲一九三三年應該與前

經濟危機中的危險

幾年完全不同。然而他們爲要不使自己冒危險，却把自己的意見不說徹底。

關於鐵路交通經濟生活報會說過：『一九三三年最重大的任務之一，必須是完全肅清運輸機體各構成部分工作時之缺點，不完全、壅塞、和不平衡。』說的是多麼中肯啊！這種說法應該全部接受，並將其擴大應用於所有經濟部門中。

關於史大林格勒耕種機製造廠，真理報會說過：『必須堅決的放棄不完備的工作方法，結束沿運物機(Conveyor)的熱病，以保證按計劃的製造生產品。』這種說法是十二分的對呀！整個的計劃經濟，其種類亦即國家規模的運物機。填塞漏洞的辦法，何能與計劃的生產同日而語？一九三三年應該結束『沿運物機旁的熱病』，或至少要大大的減低牠的熱度。

在農村經濟區域內，蘇聯政府自己宣布了由數量到質量的『轉變』。對的，但須在更廣的規模上研究問題。這裏問題不僅是所耕種的土地之質，而是全部集

團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之政策和實際。由數量轉變到質量問題應該擴大至行政機關本身的工作。

首先在集團化範圍內之退步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政府之爲自己錯誤的俘虜，比在什麼地方都明顯。官僚外表上繼續其專制的命令，以莫洛托夫、史大林的簽字指定糧食種植的土地的畝數，實際上他們正在隨波逐流。

同時，在農村中出現了所謂『出場者』（即從集體農場中退出的一部分農民——譯者）的新階層。他們的數量在增加着。盜取收成，在市集中出賣種子，以後在下種時又向政府要的這些農民，若仍以強力保留在集團農場中，乃是完全的失了頭腦。但是，如果放任分解過程不管，那也是**有罪的**。認集團化運動已無希望的傾向顯然在黨的隊伍中在抬頭。如果放在此傾向，無異將嬰兒連同肥皂水一齊從浴盆中倒出。

一九三三年應該使集團的農村經濟，適合於技術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水準。這就是說：選擇最活而有力的農場，按照農民羣衆，首先是貧農羣衆之經驗和意願加以改組。同時，定出一些退出集團農場的條件，使農村經濟受最少限度的破壞，更無須說減少國內戰爭的直接危險至最小限度。

機械的「取消富農」政策，在事實上已失敗了。應正式的拋棄牠。同時，必須恢復嚴格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爲了這目的，必須團結農村中最下層到貧農委員會來。

在一九三三年，農民種地，紡織工人生產布疋，溶鐵爐提鍊鋼鐵，鐵路運載人和勞動生產品。但這一年的最高標準，不在於使生產儘量的多和儘量的快，而在於使經濟走入軌道：檢閱所有的器具，將病的與健全的，適用的與不適用的分開，掃清垃圾和塵埃，建築缺乏的房屋和飯堂，實行衛生的設備。爲要使人們工

作得好，首先要使人們過人的生活，因此，須滿足他們的需要。

分出一年來作資本整理年度，這方法的本身尙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他能獲得重大意義，只有改變對經濟的態度，首先是改變對經濟擔負者的工農之態度才能。對經濟的態度屬於政治的範圍。黨則爲政治的工具。

現在的任務的任務就是復活黨。這裡也要把列寧以後時期承繼下來的艱難遺產加以標明，將病的與健全的，適用的和不適用的分開，掃清垃圾和塵埃，把官僚的辦公室換新鮮的空氣，洒上預防傳染病的藥水。蘇維埃和職工會也必須和黨一樣的如法炮製。一切蘇維埃組織之資本的整理，實爲一九三三年之最重的和不可緩的任務。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蒲林磯浦。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本文的作者常常爲各方面探詢一問題，有時是得意的譏笑，有時是真正的莫名其妙：何以蘇聯的統治者現時完全致力於歷史的研究呢？當日本正稱雄於滿洲，希特勒正準備稱雄於德國時，史大林則做長篇論文論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政策，和其他與此同樣時髦的問題。自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宣佈「托洛茨基主義」死亡和埋葬以後，已過了三年，現在又在蘇維埃報紙上有一新的宣傳——第五次或第六次的宣傳——反對這同一「托洛茨基主義」。這一宣傳之出乎意外——因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爲與死屍爭鬥有什麼意思呢？——和攻擊之異常惡毒在歐洲報紙上已引起了一點震驚。英國法國的報紙都發表了『托洛茨基派』在蘇聯境內的大陰謀之暴露。托洛茨基派從國外每月收受六萬盧布；他們在工業、行政、教育領域內取得了最重耍的地位。最妙的是國外補助的總數報告得精確。

雖然，這一報告是荒謬，但其背後亦有頗爲具體的權威——即是史大林的權威。史大林最近不久宣布說『托洛茨基主義』不是共產黨內的一種運動（如黨員們無論如何仍繼續這樣相信的），而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先鋒隊』。假使我們重視這句話，即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結論。反革命的目的是在蘇聯重建資本主義，達到這一目的只有靠推翻布爾雪維克政權。假使『托洛茨基派』是反革命派的先鋒隊，那就是說他們正準備着毀滅蘇維埃制度。由此立即可以得結論說，歐洲的有關的資本主義各界，一定要慷慨地解囊資助他們的活動。明白一點說，

史大林正要人們這樣解釋他的話。正如一九一七年米留可夫和倫斯基覺有說列甫與托洛茨基是德國軍國主義的偵探之必要，所以現在史大林正想記載下來，說托洛茨基與反對派是革命的經紀人。數月以前，行銷得很廣的一波蘭報紙登出了「一篇偽造的論文——這種偽造並非第一次——用我的名義做的，說五年計劃要完全崩潰和蘇維埃必然傾覆。雖然偽造之笨拙無經驗的人也看得出，而雅洛斯拉夫斯基、史大林派的官式歷史家，將這一論文鑄影出來，印在莫斯科的真理報上，視牠為真實的文件，對於『托洛茨基主義』作相當的結論。我的正式宣言說這是從頭到尾的偽造，真理報拒絕登載。說布爾雪維克中間最有力量的一派，即為列寧的最密切的伴侶所領導的一派認蘇維埃政權的傾覆是必然，且正在為這目的而努力，史大林派認為維持這樣的傳說，是更便利些。

這一把戲在從前也玩過。各國政界要人四年以前讀到拉可夫斯基實在是蘇維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翳呢？

埃政權的最壞的敵人的消息一定要吃驚，他不是在法國蘇聯協商中如此有力與漂亮地擁護過蘇維埃的利益嗎？他們那時一定對自己說：「蘇維埃共和國的事情一定鬧得不好，假使連拉可夫斯基也變成了反革命派。」假使法國政府近幾年遲遲於與蘇聯發展經濟關係，或者另一方面，斷絕外交關係，拉可夫斯基的充軍也是這一躊躇的原因之一。

現在反對反對派之宣傳，用那種比前幾次的還要粗暴的誇大武裝着，又是給世界各國內對蘇聯不可調和的敵人以武器。他們說：「國內情勢一定是惡化得多了，假使國內鬥爭又變得這樣激烈。」正由於反「托洛茨基主義」爭鬥所用的方法是深深妨害蘇聯利益，使我不得不起而討論這一題目，否則我甯願不理牠。

假使「托洛茨基派」真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先鋒」，路人們一定這樣的推論——那麼何以歐洲各國政府——連西班牙新共和牌子的政府也在內——却一個

個拒絕托洛茨基入境呢？這樣一種對於自己的『先鋒隊』之不友誼的態度，是難於解釋的。歐洲的資產階級已有很多經驗能在此時鑒別出誰是他們的朋友和誰是他們的敵人。

所謂『托洛茨基派』——至少其老幹部——參加過反對沙皇的革命鬥爭，參加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創造過紅軍，在三年的國內戰爭時保衛蘇維埃國家抵制無數的敵人，他們在國內的經濟復興中有過密切的常時是領導的參加。最近幾年，雖受種種壓迫與打擊，他們仍忠於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前好久所定的那些任務。不消說，在蘇維埃有危險時，托洛茨基派將立在防衛的第一道防線，這是在過去的年代中他們早已熟識的位置。

史大林派比任何人都知道和了解這點。假使牠宣傳那種顯然有害於蘇聯同時是丟自己的臉的誣蔑，我們可以從史大林派現時所處的政治形勢中求解釋，正是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別轉呢？

事變的行程及史大林派從前的政策將史大林派放在這形勢裏面的。

史大林主義——保守的官僚的政策

第一次反「托洛茨基主義」的宣傳開始於一九二三年，那時列寧在他的病榻，托洛茨基的病亦久延不愈。第二次和較激烈的進攻是在一九二四年發展，在列寧死後不久。這些日子可以說明自己，真正統治蘇維埃共和國的組織是政治局，其分子爲：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加門涅夫、史大林、賴可夫、托姆斯基（或布哈林）。現在的政治局老幹部中只有史大林。雖然除了列寧外，其餘的人都活着。一個偉大的歷史的領袖之選擇不是偶然的。在革命以前的艱難年代，在蘇維埃基礎正在安置的年代和用刀去保衛正在進行的建設的年代的領袖，何以當日常的蘇維埃工作在某種程度內，成爲官僚的安放踏常時，突然變成了牠

的『在內部的敵人』呢？

這些一望而知的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議中的變遷和調動在最近時期在黨的建築中之各層都發生，一直到鄉村的蘇維埃機關。現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幹部，各省黨部書記處的人員，工業、軍事、外交團體的人員，除極少數的例外以外，都是新人。其中的多數沒有參加過十月革命。其中很多人那時還在牠的公開敵人之陣營中。不錯，新統治層中有極小的少數在十月以前是屬於布爾雪維克黨的；但這些都是二三等重要的革命角色。這樣一種結合是完全與歷史的法則相符合的。『新的官僚層需要』『有權威的』掩護。那些在暴風雨和進攻時期被推在旁邊感覺得有點不適宜，和對於暴動的真正領袖只是不做聲的半反對的人，只是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中享有『老布爾雪維克』的權威，掩護即是由這些人去當的。

、幹成功了一革命，在最困難的環境中領導和保衛過革命的一層人，當革命的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手所做的工作已達於完成時，突然變成「反革命」層，而革命後數年，一新的真正革命層到來代替牠的統置，這樣的事在歷史上還未發生過。所發生的恰是相反的事實，在一切大革命的歷史中都看得到的：即當勝利已得到和勝利產生了一新的統治層有其自己的利益與要求，當這一較穩健層，反映對於「法律與秩序」的要求，將第一批的革命家推開時，她永久攻擊其先輩缺乏革命性。從革命中產生的最保守的官僚除了宣告牠的反對者是穩健的，半途的和甚至反革命的，除了這方法以外，不能用別的方法辯護其得到政權的權利。史大林的方法並沒有呈現出一點新的。然而我們不要以為史大林是自覺地剽竊別人。他沒有很多歷史知識以供剽竊。他僅僅是服從他自己的形勢之邏輯而已。

經濟的不同意見

爲了了解史大林的現有的政治困難，我們必須簡單回憶那些在我們與史大林派中間爭論之基本的不同意見之實質。反對派指出官僚將工業化與農業集團化的可能估量得太低；照一種隨時應付的經驗的方法進行經濟工作；必須採用較廣的規模與較快的速度。反對派要求放棄一年計劃採用五年計劃，說工業生產每年增百分之二十，如果有集中的領導不是辦不到的。史大林派的官僚那時攻擊反對派是超工業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在個人的農民之前叩頭，準備放棄土地國有，擁護工業之龜行的速度，譏笑計劃的原則，這是史大林派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主張。政治局的現在份子沒有一個例外地對於我們要求增加工業化的速度總是不變的問道：我們在什麼地方找經費呢？政府機關在被迫害的『托洛茨基派』之壓迫下在一九二七年所工作的五年計劃的第一次草案，是建立在下降的曲線之原則上。生產的增加被計劃得由百分之九降到百分之四。這一草案大受反對派的批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前呢？

評。第二次公布的五年計劃，即是由黨的第十五次大會所批准的，攻擊反對派爲工業的『浪漫主義』，主張百分之九的平均生長。

史大林在現在的五年計劃未批准的一年以前如何表現其比牠（五年計劃）落後，可以從一件事實中看出：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當他回答托洛茨基時——後者那時是得尼泊河水電站（Dneproputskoy）的委員會主席——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席上宣告說：『我們之建立「得尼泊」河上的偉大水電站，等於替農夫不買一匹牛而買一個留聲機。』在中央委員會的記錄中這些話記下來爲史大林的最純正的意見。他以後企圖解釋他反對工業化的爭鬥是因爲反對派的提議爲『早熟』，這是無意義的，因爲那不是某時候的一特殊任務的問題，而是工業和五年計劃的一般前途。約在一年以前公開舉行的工程師陰謀之審訊，指出真正的領導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的手中。在爲他的『龜步速度』辯護時，

史大林對於反對派用壓迫的方法。

史大林派官僚本其素日的近視的經驗主義，受了成功的影響，於一九二八年開始不謹慎的增加工業化與農業集團化的速度。此地角色是變換了。左派反對派出來警告說：假使用未為從前經驗所證實的太快速度，則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平衡，各部門工業之間的不平衡，將發生造成危險的危機。而且——這是反對派的主要論據——投於工業的資本太快將太過火的減少分配於日常消費的部份，和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程度的必要的提高。雖然與全世界隔離，處在他的充軍地巴那爾（Barnaul），拉可夫斯基發出警告的信號：他說，必須改善工人羣衆的物質狀況，縱然是付降低速度的代價。此地也是史大林的官僚最後不得不聽反對派的意見。最近不久在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中單獨成立了一製造工業的人民委員會。牠的任務是應付人口的日常需要。現在這一階段這一改革是純粹官僚的性質，但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爾呢？

牠的目的很明瞭：在政府的機構中創造某些保障，使民衆的日常需要不要太爲重工業的利益所犧牲。在此，沒有前途與沒有創造力的史大林派不得不在今日祝禱那在昨日爲牠所咒詛的。

「撒胡椒的菜」

早在一九二八年已實行了對反對派之大羣的搜捕（開除、逮捕、充軍）。同年新五年計劃實行，在一切主要問題上都跟着左派反對派的主張走。這一轉變如此之急劇，官僚與他們在列寧死後頭四年所辯護的件件事都直接矛盾。攻擊超工業主義的話失去一切意義，對反對派之積極壓迫更是如此。

但在此，新統治層要自保的利益跑上了前面。假使反對派的判斷與建設是正確，那麼反對派更倒霉。假使昨日反對反對派的論據無價值，我們必須找新論

據，爲了證明壓迫之正當，我們必須異常激烈的壓迫。這一領域正是史大林所特別擅長的。一九二一年史大林第一次當選爲黨的總書記，列寧對很少的幾人警告說：「這一廚子將只會給我們以撒胡椒的菜」。列寧在他的病榻上所寫的信即普通所稱爲『遺囑』的上面，堅持解除史大林的總書記職務，指出他的方法之粗野，他的不忠實和傾向於濫用權力。史大林的這一切個人特點，以後發展到高度，在他對反對派鬥爭時特別表現出。

然而提出怪誕的誣蔑是不夠的，必須要有人相信牠或至少是害怕反對牠。在爲自保而鬥爭中，史大林的官僚所以需要從撲滅一切批評開始。反對派立刻在這一路線上開始其最熱烈的鬥爭，即爲黨的、工會的和蘇維埃的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我們所擁護的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根本傳統之一。

在過去最艱辛的年代——在反沙皇的地底鬥爭時期，在國家經過了兩次革命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前呢？

的一九一七年，在以後二十枝軍隊在七千英里長的前線上作戰的三年，黨的內部生活是沸騰的。一切問題都是從黨的最上層到底下自由地討論；黨內的判斷自由是無限的。史大林派的官僚機關以其主要的努力用於摧毀這一麻煩的黨內民主主義。數萬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被開除出黨。一萬以上是受各種形式的刑事迫害。有幾個被槍斃。好多萬頭等的戰鬥的革命家之得以留在黨內，只因爲他們脫離了反對派和不做聲。這樣，在這幾年的過程中，不僅統治層的人物已完全改變，布爾雪維克黨內的黨制亦然。

列寧，姑不論他的最親近的戰友，都會受過幾百次黨內批評的最兇猛的打擊，現在所有共產主義者敢於懷疑史大林在任何問題上之絕對正確時，或者，有誰不表示堅信他們從不錯誤時，即被開除出黨和吃從此發生的一切後果的苦頭。反對派之遭摧殘，同時是列寧的黨被摧殘。

這一摧殘，爲深刻的雖是過渡的原因所促進。幾年來革命的和國內戰爭的震動，使羣衆們急切的需要休息。爲貧乏及飢餓所壓迫的工人們要付任何代價以使經濟生活復興。在有了很多的失業工人之時，工廠中工人誰要抱反對派的意見即被開除，這是史大林派手中的一可怕的武器，政治的興趣減少了。工人們準備給官僚以最廣大的權力，只要牠能恢復秩序，能恢復工廠和從鄉村中取得糧食與原料。在這一疲倦的反動（這是每一大革命的緊張後所必不可免的）中，即伏着官僚制度之鞏固和史大林的個人權力之增長的主要原因，新的官僚機關以史大林的其「人的體現」。

托洛茨基主義的違禁品

當活的聲音最後被壓抑住時，發現了在圖書館、俱樂部、蘇維埃的書店、學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生與工的書人架上，有些舊書繼續說當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名子不可分離的那些日子所說的語言。史大林派官僚現在起來反對的正是這一可仇視的書籍的壁壘。

在九年來繼續不斷的對反對派的鬥爭中，領袖們突然發現了基本的科學著作和教科書——關於經濟學、社會學、歷史的問題的——尤其是十月革命史與共產國際史是充滿了「托洛茨基主義的違禁物」，許多學院的社會科學的最重要的教椅爲「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半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佔據。更壞的是：那些直到現在爲止都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檢舉人，也被發現爲犯托洛茨基主義的罪。

爲了指出事情走得如何遠，我們舉一關於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歷史爲例。列寧死後不久，季諾維埃夫倉卒寫成的黨史銷行很廣，牠的唯一目的是描畫整個的過去爲兩種原則——善與惡——的爭鬥，其代表者爲列寧與托洛茨基。但因爲這歷史給季諾維埃夫在善的陣營之內以地位，而且更可怕的是，一點也沒有說到史大

林的神聖作用，季諾維埃夫的歷史早在一九二六年，即季諾維埃夫與史大林公開衝突的日起，即列爲禁書。

於是雅洛斯拉夫斯基被指定爲寫黨的純正的歷史的人。在黨的統治層中，現在責任落在雅洛斯拉夫斯基，即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之一員的身上，去領導反左派反對派的鬥爭。一切逮捕與開除的罪狀，以及多數在蘇維埃報紙上發揮對托洛茨基派取壓迫手段的理由的論文都是出自雅洛斯拉夫斯基的手筆。在真理報上重印波蘭報紙上的偽造論文的正是他。固然雅洛斯拉夫斯基的科學的、文學的程
度不甚相宜，但是，他以他的依照史大林所領導的官僚層的需要來重寫一切歷史（包含古代埃及史在內）的完全願意來彌補他的科學的文學的資格之不足。史大林派的官僚找不出一更比他可靠的歷史家。

然而其結果完全爲意料所不及。去年（一九三二年——譯者）十一月史大林不得不

暴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出來對於雅洛斯拉夫斯基所做的黨史的第四卷作了一篇嚴厲的論文。似乎這部書也充滿了『托洛茨基主義的違禁品』。『假使包爾溫 (E. A. Tamm) 在他的一演說中攻擊邱吉爾 (W. Churchill) (二人均爲英國保守黨領袖——譯者) 同情於布爾雲維克主義，這在英國所引起的震驚，不會比史大林攻擊雅洛斯拉夫斯基在蘇聯幫助『托洛茨基主義』爲更大。史大林的那一控告式論文成爲最近一次反對反對派宣傳的導言。幾千幾萬的積極份子、教授、新聞記者，都是些除熱心外別無他長的人都服從信號，出來在一切蘇維埃的出版物上搜索。怪事！每步都有『托洛茨基主義』！無法逃避這『違禁物』！

但是終結說來，這樣的事怎會發生的呢？每一新社會層，當其興起當權時，總傾向於粉飾其自己的過去。因爲史大林官僚不像別的統治階級，不能在宗教的高位中找得援助，牠不得不創造其自己的歷史的神話。牠將那些抵抗牠的人的過

去用黑色描寫，而用刷子將自己的過去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許多革命的領導角色的傳記，年年都有改變，依於其統治層的份子的變化及其野心的發生而決定。但是歷史的材料給予一些抵抗。無論官式歷史家如何熱心，他們爲過去年代的檔案，定期刊物，舊日的論文，其中也有史大林自己的論文所遏阻。這是根本的壞的地方。

在雅洛斯拉夫斯基的領導下，許多青年的歷史家研究黨的歷史。他們做了他們力所能做的。但他們遇着些倔強的事實和文件，無論他們如何熱心，既不能將托洛茨基擠出十月革命之外，又不能給史大林在那裏面以一種很威嚴的作用。正是在這一方向雅洛斯拉夫斯基被人控告爲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的違禁物：他沒有將重做歷史的工作幹到底。那做事情只做一半的人合該倒霉！

在許多例證中，被指爲暗藏違禁物的人有另一來源。有數萬不大堅決的反對

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派在過去幾年形式上放棄了他們的意見，回到黨裏去工作。然而他們很快的明瞭了反對派爲科學思想的學派，實在是最可貴重的。舊日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經濟學的科學的、文學的和教育活動的領域內佔有重要地位。他們是馴服，如像害怕的積極份子知道應怎樣的馴服，但是他們也知道事實。在他們的腦汁中，也黏上了許多批評的習慣。史大林的偵探從各方面偵探他們，不難在他們的書籍與講演中發現『托洛茨基主義違禁物』的毒素。

這一毒素也有第三種來源，而是同樣危險的。青年的認真的研究家，過去完全未與反對派發生過關係，大都是非政治的，而且也沒有權位慾，常常做了他們自己所工作的科學材料與他們自己的良心話的犧牲品。在許多問題上，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落在左派反對派所安置下的窠臼中。史大林官僚所強加的意見系統不唯與黨的傳統，而且與任何稍爲認真的在歷史的和社會科學的範圍內的獨立研

究發生日漸嚴重的衝突，引起反對派的情緒。其結果是突然發現了蘇聯內社會工作的極重要的部份是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先鋒隊」的手中！

蘇維埃經濟之鞏固是削弱史大林

現在一次的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激烈性質已感染了俄國亡命者的報紙上作新的預言，說蘇維埃政權將覆滅。這些聲音，不願過去十四年令他們沮喪的經驗，甚至在歐洲和美國的大報上找到了回聲。這究竟也不奇怪；不懂史大林官僚把自己與蘇維埃政制看成一個東西，而且牠的敵人爲了尋找舒服的幻想，變成了同一政治錯覺的犧牲品。

實際說來，這種說等了好久的「完結」將走近了的話，沒有一點點的根據。蘇聯的生產力的發展是現代歷史中最偉大的現象。計畫的領導之鉅大利益已用了

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

任何人所不能駁斥的力量證明。史大林官僚之近視與盤旋，只是更明瞭地着重方法自身之力量。只有有復辟狂的人才想像俄國的勞動羣衆願意回到落後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狀況。

但如想像鞏固新工業制度的經濟成功也自動地強固了史大林及其黨羽的政治地位，這也是錯誤。某種程度內這是如此。但是現在正發展着一種真正相反的程序。一個完成了一偉大革命的人民或者暫時在困難的環境中將他們的命運的指導托之於官僚。但是他們不能長久地放棄政治。國內經濟形勢之真正強固，使勞動羣衆對於官僚的萬能，愈益仇視的反對，假使我們不見這點即是盲目。工人們將所獲得的成績歸功於他們自己，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以愈益批評的眼光注視官僚。因為羣衆從下面不僅看見了成績與由牠們所生的可能，而且也看見了領導者的粗野的錯誤和他們將這些錯誤之責任轉嫁於他們下面的人的不斷傾向。成績

提高了工人的自尊心，也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要求。

經濟的盤旋之教訓，特別是審問怠工者的可驚的披露在人民的意識中植根甚深，而且大大毀損甚至史大林的信仰。推論不而出地說，「似乎反對派是正確的！」反對派的思想雖然在表面上看不見，早已經過隱藏的道路潛入於羣衆。現在正開始一批評的時期。工人們不僅要服從而且要決定。他們想改變許多東西。然而人們常要求他們只復決那不經過他們而通過的決定。工人不滿意，不是不滿於蘇維埃制度而是不滿於官僚代替蘇維埃的事實。在有些工人會議中「托洛茨基主義者」舉出他們的頭來，有時是極勇敢。他們被開除。這在統治的黨的生活中揭開了一新章。批評的聲音已不能再壓制住了。

假使以前的黨的危機直接反映在官僚領導下的蘇維埃共和國發展的矛盾與困難，在現時期所顯露的是史大林派的地位的矛盾，尤其是史大林自己的地位。

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磨呢？

當這篇論文出版時，黨的第十七次會議在莫斯科將已完結，這一會議只是機關份子的會議——即是集中的史大林派的小組織。無疑，會議的經過，將對於現時的領導者爲很好。但無論史大林小組織如何強，牠不能決定。最後的分析起來，將由一方面是工業行程，另一方面是羣衆的意識中所發生的深刻的政治行程來做決定。

現在發展的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爲史大林官僚萬能的夕照。但牠所預告的不是布爾雪維克政權的崩倒，而是恰恰相反，蘇維埃制度新的興起，不僅牠的工業，而且牠的政治與文化。著者所屬的那一運動堅信在將來的鉅大工作中找到牠的位置。

特米多的危險

史大林的最近演說的意義之分析

蘇維埃的制度寄托在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上面。無產階級占人口中之少數；農民占壓倒的大多數。然而最集中的生產工具是在無產階級的手中。農民的力量恰相反，由於他們的經濟關係而是分裂的。鄉村的技術與經濟一日沒有完全的變化——即在最順利的情形下，這一工作也須要一代代的努力——農民將從其自己中分化出一富農層，必然趨向於資本主義。機械地消滅現在的富農，一點也

特米多的危險

決定不了問題。在聲稱『消滅了富農一階級』以後，蘇聯報紙不斷抱怨（由唯物主義過渡到了唯心主義，因為官僚主義者永久是唯心主義者）富農『意識』的力量、富農心理的殘餘等等。實在，在這些事實之後藏着以下的事實，即是關在集團農場的中等階級農民，在現在的技術與經濟的水平之前，除了提高自己到富農的水平之外，沒有別的出路。

十月的革命為兩個革命交織起來；民主革命之完結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開始。民主革命廢去了佃租以後，省去了農民的幾乎五萬萬金盧布。貧農估計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之價值，是看他一定數量的糧食能換得多少工業品。農民不是空想家；他並不要求一國實現社會主義，甚至只要五年。但他確實要求社會主義的工業發貨給他的條件不比資本主義工業給他的條件還壞。在這些條件之下，農民是準備對無產階級及他的政黨給以無限的政治信任的。蘇維埃國家這樣即有可能依

照國內情狀和世界形勢去相機付和吸收農民到社會主義經濟中。

大羣集團化的基礎只能是工業的與農業的生產品之等值的交換。我們不用加入那理論經濟的細微爭論，在我們看來，凡是那種足以刺激無論個人的以及集團化的農民盡可能的多耕田和收獲多的糧食，對城市出賣較大的部份以便得到盡可能的工業品的交換，我們即謂之爲『等值』的。只有這種城市與鄉村間的相互經濟關係（列寧稱之爲『聯盟』）能使工人國家不用暴力手段去強迫鄉村實行交換。只有從志願的交換實行之時起，無產階級專政才是不可動搖的。這樣得到的『聯盟』是貧農與城市工人最密切的政治聯盟，中農的多數羣衆之堅決擁護，因此是國內的富農和一切資本主義分子政治上都孤立起來。這樣得到的『聯盟』即是說，紅軍將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表示不可動搖的忠誠，又因爲工業化成功和有無數的人，多半是農民做後備，蘇維埃國家即能擊退任何帝國主義的干涉。

特米多的危險

如左派反對派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所宣言，工業化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前提。沒有工業化的生長，無論麻布、或釘子，更不用說曳引機，都不能供給農民。但是工業化必須有如此的速度和依照如此的計劃使城市與鄉村間，貨物的量的關係將堅定的進步，即使是緩慢的進步，工人與農民的生活標準提高。這一整個制度的安定之最先決條件，使工業化與集團化可以允許的速度受限制。

「五年計劃已廢止了階級和實現了社會主義嗎？」這閒話是無意思的。但我們必須要問：「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盟已穩當了嗎？」我們的回答是：「沒有，牠（五年計劃）已動搖了和削弱了這聯盟。」史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最近一次演說吹牛說有計劃的集團化已超過了三倍以上。但是除官僚的吹牛家們以外，誰需要這些數字呢？集團化的統計代替不了麵包。農業集團是衆多，但是沒有肉類與菜蔬。城市沒有東西吃。因為工人挨餓而工業敗壞。城市與農民的關係已從

半志願的經過糧食稅的交換轉變到強制徵發，換言之，轉變到戰時共產主義的方
法。

飢餓的工人不滿於黨的政策。黨不滿於其領導。農民不滿於工業化、集團化
和不滿於城市。一部份農民不滿於政治制度。那一部份，我們不能知道，但在現
在狀況之下，很明瞭這種不滿只有在生長。

「有計劃的集團化超過了三倍以上」！但這正是不幸的所在。被強迫組成的
農業集團不僅不走上社會主義，而且恰相反，因其成爲農民對城市罷工之組織的
形式而動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農民對國家隱藏糧食，或有意限制播種，走
上了富農的道路。農民說：「讓我自由的買賣罷」。從誰買和賣給誰呢？即是和
那些出正確的價格的人，無論他是國家、私商或外國資本案，做買賣。農民爲國
內貿易自由之爭鬥，立即引到要求國外貿易獨占之廢除。這是五年計劃的錯誤之

邏輯。

史大林在其演說中給了總數目。關於這，我們在另一論文中討論。但是在計劃經濟中，統計的損益結算書與經濟的損益結算書之相符合，只是在計劃正確時才可以。一個充滿錯誤的計劃，恰恰相反，能損害或甚至取消最大的成功。五年計劃在技術與生產中已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他的經濟結果異常的矛盾。就政治的損益結算說，牠表示出極大的和公開的虧損。但是政治是凝結的和集中的經濟。政治是決定的。使工人與農民的聯盟分裂和在無產階級中散播不滿種子的社會主義建設是誑騙的建設。任何數字都不能改變這一客觀的估計。真正的結算不在新聞紙的篇幅上，而是在農民的田中，在農業集團的穀倉中，在工廠的堆棧中，在工人的餐室中，和最後，在工農的頭腦中。

官僚的中派經過其一切的盤旋、遲延、跳躍，沒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是

恰相反，增加了特米多的危險。只有懦夫才怕大聲地說出這結果。事實勝於雄辯。若要與不願意的事實爭鬥，我們須就其正當的名詞稱呼牠們。我們也必須喊出那些負責的人的名字：史大林與其黨羽。

爲什麼我們特別說特米多呢？因爲他是最有名的和最完全的歷史的列。戴假面具的反革命其外表的形式與儀節仍是革命的，但國家的階級內容則改變。在此，聰明的人將插言以表示他們的聰明說：「十八世紀的法國那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二十世紀的俄國是無產階級革命，社會條件有巨大的改變，世界形勢已大有改變等等。」用這種老生常談，任何庸俗的人可以裝出異常淵博的面孔。對於我們，十月革命與雅各賓革命的分別也不是什麼神秘。但這不是我們不回顧歷史的理由。列甯在一九〇三年，說布爾雪維克是與工人階級不可分離的連繫着的雅各賓。那時我回答列甯，詳細解釋馬克思主義者與雅各賓的分別。我的批評就本身

特米多的危險

說固是正確，完全不中用。不是每一反革命能與特米多相比；科尼洛夫、高爾札克、台里金、蘭格爾都與特米多無共同點。一切這些例子，都是資本家與地主爲恢復他們的統治之爭鬥。這一危險爲無產階級的國家擊退了。這一危險能再起麼？成爲獨立的因素怕難成功。俄國的大資產階級已連根地被剷除了。其餘餘只能在舞台上當作國外武裝干涉或者特米多的尾巴才能實現。

在蘇聯的一切反革命運動中，以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克朗斯他特的暴動 (Kronstadt)，在典型上最近似特米多。克朗斯他特衛軍中的一切無產階級成份爲了蘇維埃的建設與國內的戰爭被調走了；他們中間最優秀份子已經喪亡。在兵船中與在軍營中剩下的只是未成熟的、半飢餓的農民成份。這些水兵中許多認他們自己爲布爾雪維克，但他們不要公社，他們贊成蘇維埃，但不要共產黨員。這是受損害的，不滿的失去耐性的農民的暴動，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假使小資產階級勝利

了，牠在第二天將表示出其破產，牠的位置只有由大資產階級起來代替。在現在的，即是說，二十世紀而非十八世紀的狀況之下，這樣的代替不用幾年，只消幾個月，幾個禮拜即够了。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還誠實地認自己爲革命。不要資本主義的統治，但必然又準備着牠的統治——這即是特米多。

在蘇聯內只有農民能成爲特米多的政權。必須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裂痕很深了，牠才在這樣做。鄉村與城市間的經常關係之破壞，命令式的集團化，強迫沒收農產品，這些使農民對蘇維埃國家發生惡感，不下於一九二〇——二一年的冬季。固然無產階級現在數量上是強些；這是工業化的成績。但是無產階級完全沒有了。有了一種極的、能行動的和時時警備着的黨。表面存在的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另一方面農業集團將農民組織起來，以抵抗蘇維埃國家。剛開始形式的「聯盟」之廢止，威脅着要破壞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政治聯盟。正在這裏藏着特米

多危險的來源。

我們不要這樣想像事情，以為這破裂可以精確地用一種社會界限來分開，一面是農民，一面是工人。農民羣衆從各方面包圍工人和與工人交錯起來。在無產階級自身，有數百萬初從鄉村中出來的。最後，領導者政策的公開錯誤，官僚冒險主義的觸礁，缺乏明瞭的方面，絕對窒殺工人民民主義，這一切甚至使純正的工人接受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壓迫。這是特米多危險的第二來源。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將在一面是黨，另一面是農民和一部分工人二者之間在某處劃分界線。否——特米多的線將必然通過黨自身。列寧在他的遺囑中寫道：「我們的黨是由兩個階級支持着。正因為此，牠（黨）的穩定之被動搖是可能的，假使這兩階級間協定不能存在時，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形下，沒有手段能阻止住這一分裂（即黨的——托），但是我深信這一可能還太遠，這樣事變的或

然性太小，可無需於此時加以討論。列寧在那些日子確定表示說十年至二十年對農民的政策正確，將使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上獲得勝利。正因為此理由他以為——我們也是一樣——特米多的前途不僅很遠，而且也是或然性十分小。

列寧所說的十年到二十年，已過了十年。在世界革命的範圍內，共產國際所收穫的是失敗。無論今天的客觀環境異常的順利，共產主義，因此世界革命比列寧寫他的遺囑將還弱些。再則蘇聯的專政所寄托的兩階級中間分裂的危險異常地尖銳化了。

無論困難如何之大，國家的經濟形勢中沒有什麼不能挽救的。但是需要一件東西做挽救的工作——需要一個黨。但是真正的黨是不存在的。有一個在形式上包含數百萬的黨員與候補黨員的組織。無論黨員與候補黨員，都沒有權利。在黨的緊狹範圍之內事實上只有受恐怖的兩黨——無產階級的 and 特米多的——的份

子。官僚騎在他們之上。牠負經濟政策錯誤，破壞工農聯盟的責任。同時，由於牠的政策，牠使農民與國家互相仇視，牠在政治上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和分裂了牠。不僅僅人們的身體由一工廠漂流到另一工廠，但是在政治上，他們也沒有安身之所。

假使我們假定特米多的分裂將在史大林的機關與黨的右翼之間發生，這是錯誤的。不是的，牠將在官僚機關中間發生。官僚機關中間有多少別塞多夫斯基 (Bessyrdovskiy) 和亞格貝可夫 (Agabekov) 呢？(別塞多夫斯基曾任駐法使館代辦，曾幫助從黨的小組中肅清左派反對派的工作，以後他投降到反革命方面去爲全世界報紙所喧傳一時。亞格貝可夫被任爲格別烏的職員，就職未久，即公開地攻擊布爾雪維克主義，加入白黨方面去了——譯者) 這個連明天叛變的，也不曉得。這一切都依於在官僚機關以外的力量關係。只需小資產階級作一有力的打擊，官僚的特米多主義者即馬上認識出自己，跳過將他們與階

級敵人隔着的牆去。這裏即是特米多危險的第三來源。

但是史大林主義者或其崇拜者中有人會說：『你沒有看見中央委員會正準備清黨，清去右派分子嗎？這就證明史大林正採取手段反對特米多。』『不是的，』我們將回答說，『官僚的清黨只是幫助特米多的工作。』新的清黨和過去十年的一切清黨一樣，將首先是打擊左派反對派和一般說來，打擊有思想與最批評的無產階級分子。無論官式的口號，『主要的危險是從右邊來』——賴可夫（右派領袖——譯者）現在也喊這一口號——監獄與充軍地首先爲左派反對派的分子所充滿。還有，雖然打擊落在右派身上，這些打擊並不鞏固黨而是削弱牠。在右派中除了真正特米多主義的分子外，有數十萬，或者有數百萬人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刻的敵人，而是從城市與鄉村的勞動羣衆的觀點上要求修正全部的政策。這些右派的分子的政綱是混亂的。他們能一時贊助特米多；但是他們也能贊成用革命方法復活

特米多的危險

黨。史大林派的官僚阻止他們了解形勢。史大林派官僚用「清黨」的方法首先是努力於窒塞批評的思想。這樣他們只能鞏固右派。

而且是誰在清黨呢？在巴黎的，別塞多夫斯基領導一委員會以「清除」拉可夫斯基。讓我們總不要忘記這點。在那以後，官僚機關的腐敗還要厲害。我們從蘇聯所得的一切信都有這種悲觀的聲調：「沒有人相信別人，個個人都怕有黨員證的階級敵人就在他的旁邊。」權位活動者、冒險家、別塞多夫斯基們和亞格貝可夫們關於清黨的需要比任何別人都叫得響亮。但是誰來清除黨內的這些清黨者呢？不是官僚機關，只是官僚專制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來清除他們。

情形是無望了嗎？這種字不屬於我們的字典中。爭鬥將決定。在無產階級革命一方面，有許多歷史的可能，消極的可能為：資本主義的可怕的衰落，帝國主義者如狂的爭吵，改良主義的破產和積極的可能：布爾雪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百折

不回的幹部了解發展的前程，明瞭的前途。爭鬥將解決。危險已在生長與在走近——這是絕無可疑的。但是特米多的毒中也伏有解毒的因素。危險愈走近與愈直接，抵抗的需要也愈強。史大林的官僚們愈喪失頭腦，他們的萬能愈證明只是表面的，先進工人的要求，布爾雪維克的領導的聲音愈高昂。

史大林的演說——我們回到這點——是向右轉的意義。他的官僚的誇大的每一辭句都是暗中承認全部『總路線』的錯誤，將專政領導得更走近特米多。史大林將在官僚的加倍的恐怖中用新的官僚漩旋來對待病症與危險。加倍的進行反史大林主義的鬥爭，乃是我們的回答。

蒲林稿浦，一月十一日，一九三三。

用一雙手』

蘇聯的國內形勢，正使新的政治轉變爲不可避免和日漸迫切，這一轉變一定比以前的一切轉變還要急劇。個個人都感覺到牠。許多人看得清楚。立在困難與不滿的焦點上的官僚的領導保守一種倔強的沈默。或者因爲他們（官僚）還不知走那條路嗎？或者他們甯願對於已走的路，在其還未成爲不可取消的事實之前，不做聲嗎？

『驅使』被欺騙的、被催眠的、和半被窒息的黨不留心地走上牠不願走的路

這是史大林的策略方法。在酒的飲料中，由「乾」的制度，轉變到濕，從未爲黨所決定；官僚們爲了國家收入的利益，靜悄悄地繼續提高輕飲料的酒精成分，百分之四到了百分之四十。史大林用同樣的方法於各個領域。現在我們更需要尖銳注意於官僚使權謀，暗中正爲工人羣衆準備新的「驚訝」。次等重要的徵兆必須注意地和不信任地加以考查：假使我們顧及全盤形勢，這些徵兆可以使官僚領袖們在他們實現新的轉變到百分之四十之前潛藏於其中很久，以後即不能再補救了。

美國著名的製造農業機器的專家干貝爾 (Thomas Campbell) 當了一時期的蘇聯的技術顧問。他回到美國以後出版了一本書：『俄國，是市場還是危險？』這本書的重要點，至少就政治上說，是關於著者與史大林作長時間的談話的報告。這一談話轉錄之真實是無可疑的，如我們將指出，不僅值得印出，而且值得人作

注意的研究。

「我們坐下以後，我經過翻譯對史大林君說，在我們作關於公事的談話之前，我想對他坦白的不傷感情的說我在俄國旅行及旁的問題的心中的話。他立刻同意了，他的手動了一下，向門口一指，他的書記三步即出了屋子。我即向史大林君說：「史大林君，我很願意你知道我在這裏沒有意思給你以錯誤的印象。我不是共產黨員，我不是海烏得(Bill Haywood)或愛瑪·戈爾得曼(Emma Goldman) (二人一為世界產業工人的領袖，一為無政府黨首領——譯者)的信徒。我聽見了關於你們的政府的有許多事情我是很生氣的。然而我很關心於你們的農業發展，因為我是一機器農業工程師，我的大半生的努力即在於在美國發展機械農業。我們今年在 Montana 的收成不好，而你們的政府所派我的工作是有興趣的。然而這種工作，假如不是絕對不管我的獨立的政治信仰，和純粹在商業基礎上時，我是不能

能與貴政府成立何種工作協定的。」於是史大林君從椅子上小心地立起來，走過來，到我的椅子的這邊，將我的手握在他的雙手中，對我望着說：「感謝你，干貝爾君。現在我知道我能相信你。現在我知道我們能彼此相敬，或者我們能做朋友。」

「他於是以手招呼我坐下，要我繼續。我繼續說，我們在美國聽見了關於蘇維埃政府的許多話很生氣，如像沒收財產、消滅個人權利、婦女兒童國有、不承認債務與宗教，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所認爲的，干涉我們自己的政府之間題。我告訴們說，無論他或他的政府，假使企圖干涉我們的事情，休想得我們的政府之友誼、合作和承認。」

「史大林君立即回答說他了解這點，他也願意同樣坦白和不傷感情的一談。他說他知道在我們的國內有這樣不利的報告，和須要很多時間來解釋俄國的真實

狀況。他不躊躇地和以使人毫不懷疑地坦白承認在托洛茨基當權時會有過普及共產主義到全世界的企圖。他說這是他與托洛茨基決裂的最初原因。托洛茨基相信普遍的共產主義而他只想將他的努力限於他自己的國內。他解釋說，他們沒有時間和金錢去企圖將世界共產主義化，縱使他們願意這樣做，而他的主要興趣是在增進俄國人民的狀況，一點也不干涉別國的政府。

「我們討論了第三國際和討論了蘇維埃宣傳的其他報告，我必須承認史大林君說服了我。現在在他或蘇維埃政府官吏方面沒有企圖干與美國政府。我們討論政治、經濟、銀行、商業，與美國的貿易、運輸、農業和教育。我驚異史大林君之了解一切情形，他提醒我，我們的許多工業領袖，須要知道實際上的一切事情纔能維持他們的地位。如我們聽到翻譯所傳達的，他的字都經過很好的選擇，我特別驚奇他關於美國憲法的知識。實在我之缺乏關於美國憲法的知識使我大感不

安，我到了倫敦以後的第一件事，即是找一書舖去買一本。

「談話繼續到天黑了好久，因為在北方的國家，太陽落得很早。在分別時，他告訴我，翻譯的人將準備一份打字機上打了的我們的談話，二星期以後我在倫敦即接到了，署名，*DeLiff*，附註說：「保存這一記錄，某日牠將成爲一歷史文件。」」

這一談話的無誤是無可疑的，由其所敘述的環境即可明瞭。干貝爾不是那種輕浮的獵逐新奇消息的新聞記者，而是一結實的美國商人，美國的一個重要的有錢人和做機器的人。他與史大林的關係是十分親熱的。在報告談話時，干貝爾不僅依賴他的記憶，也依賴所供給他的官式報告。最後，干貝爾的報告沒有在任何地方被否認過。這些事實足以從形式方面證明談話之正確。但重要的是談話在政治上能使人相信的力量牠之與談話者的精神與他們的環境之符合。而且沒有

「新聞記者能想出那種雙手的握手，那種最佳的描寫史大林與托洛茨基的不同意見之真正實質。」

這一美國人在談話中自始至終都是忠於他自己。這一結實的有產者，因為今年的收成壞，所以越發傾向於和不敬上帝的婦女國有者做一筆好生意，將他的「一隻腳踏在蘇維埃的桌上，半恩寵與半警告的拍布爾雪維克領袖的肩膀。」

沒有人要責備史大林想利用與干貝爾之會晤促進與美國政府及與美國市場之協定。然而爲什麼這樣「突然地」立起身來，用他的兩手握住干貝爾的手和提議不僅「互相尊敬」而且也「做朋友」呢？這像一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進行生意協商工人國家的代表的行動嗎？一點也沒有相似的。但是他却與一小有產者在大有產者之前的卑屈的行動相似。這一讀着——坦白些說——使人作嘔的小事件是極有意義的：牠讓我們能鑒別史大林的真正政治意識，他對待反對派的共產黨

員和不滿意的工人們如此的堅決和無情。

十月革命十五年以後，史大林與美國的資本家談話，儼然和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在其不甚光榮的無力的聯合內閣的日子與布卡南 (Bu. canan 英國一九一七年時駐俄大使——譯者) 談話的聲調是一樣的。不僅聲調而且內容也相似。布卡南極中肯的責備二月革命後當權的人說：『你們當中有人在報上和在公共會議上公開宣傳應當結束戰爭。』米留可夫、特雷清科和克倫斯基辯護自己說，『不是我們，是布爾雪維克們，但我們馬上會結果他們。』克倫斯基安慰布卡南，用他的兩手握住布卡南的手，因為他沒有生第三隻手，說：『請看，列甯被驅逐得又秘密藏起來了，托洛茨基正坐在克勒斯特的監獄中。』

史大林的地位天然不同些，因為十月革命是一歷史的事實，官僚們是依據十月革命的社會後果為基礎。但是官僚的政治任務，不在於將十月革命普及於全世界。

界，正是因爲這一政綱托洛茨基才被放逐出蘇聯，史大林恭恭敬敬地報告給美國的有產者聽。他的，史大林的，任務是在於用與美國資本做朋友的手段，『改進人民的狀況』，他愈『改進』而結果則愈糟。

或者有一位哲學家出來爭論說，史大林所說的關於世界革命一類的話只是在於欺騙美國人，使其不知道他的真正意見。這又有什麼錯呢？值得在這點上糾纏嗎？然而只有全無希望的白痴才能相信這樣的解釋。

首先，是否許可用這樣一定會使朋友們敗壞，與混亂的宣言去欺騙敵人呢？因爲史大林只是在全世界之前宣告，他的一派與左派反對派不同，已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理論與實際。人們爲了外交的利益，應當玩這類的把戲嗎？甚至在外交的範圍內這樣的把戲一定歸於可憐的失敗的。一個私人的談話，縱使牠延長到日出，是不夠在美國的統治階級身上起什麼影響的。美國人是認真的做生意的人；他們

不會讓你魚目混珠。說的話必須立在事實之上和引導到事實。史大林的宣言不是權變，也不是把戲，就其根本說，這是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之後果。這是爲近幾年的全部政策所準備的。在近的將來，牠或者成爲新路線的學說，官僚們正在日益直接地走上這一新路線，因爲他們的盲目和他們的失敗。

我們能真正忘記，蘇維埃政府出乎大家意料的贊助凱洛格的非戰公約的事實嗎？史大林的理由，而且只是爲供給國內宣傳的理由，是說：縱使凱洛格公約不怎樣澈底，然而牠總算是前進的一步。蘇聯的外交自然不是一定要將牠所想的件事都高聲的說出來。然而牠不能做任何種的宣言幫助敵人欺騙工人和減弱他們的戒備，否則這是自掘其立腳的基礎。凱洛格公約不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而是一切帝國主義土匪中最強大和最危險的土匪的外交的假面具。事情還不止於公約。

李維諾夫（蘇聯外交總長——譯者）最近贊助美國的『部份解除軍備』的提議。蘇聯的

報紙在這關係上不揭破胡佛的要求，而是揭破那些不贊同牠的帝國主義者。然而胡佛的提議，正和凱洛格公約一樣，目的既非在解除軍備，也不在避免戰爭，而在將操縱戰爭與和平之權集中於美國的手中。爲將來的戰爭在精神和物質上準備順利的出發點，這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唯一任務。假使蘇聯的外交不能公開表示其意見——我們則認爲不然——那麼報紙上應當說出來，但是當受史大林暗示的外交『用一雙手』抓住胡佛與凱洛格的提議時，蘇聯外交正在欺騙世界無產階級和削弱蘇聯國家。在阿姆斯特丹的中派的行動完全以大部份是誠實的和無論如何還植根於羣衆中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爲基礎，在日內瓦他們在『左邊』與帝國主義的和植根在銀行與托拉斯中的僞和平主義相攜手。在關於戰爭的問題，不肖門徒們公開地和示威地與列寧主義的革命傳統決裂。他們的直接目的是在贏得美國資本之信任。克勒姆林宮的夜中談話，是日內瓦蘇聯代表的演說的不可少

的評註。

然而外交不能竭盡此問題，而且外交不能算是第一等的重要。共產國際放在什麼地方去呢？共產國際有四年半沒有開過大會，誰也不知甚麼時候，或是否還要召集大會。史大林竟騰不出一點時間來出席於共產國際執委的全體會議，將領導交給那些他們自身即需要領導的人們。這不是有意表示其對共產國際之不尊敬嗎？這不是表示不僅在與美國有產者的談話中，而且在實際上史大林已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政策嗎？他並沒有欺騙于貝爾。他只是以希有的坦白敘述實際存在的情形。還有另一問題，即最主要的問題，在史大林與于貝爾的對話中明亮地被發揮了，即是一國社會主義的問題。不顧一切半生不熟的預言，五年計劃並沒有增加蘇聯的經濟『獨立』。恰恰相反，工業化的進展擴大了與加深了蘇聯經濟對世界經濟之依賴，也就是他們中間的相互依賴。

史大林的雙手握乎和他對美國資本之尊重指出左派反對派，最後分析起來也不過是蘇聯對世界市場之經濟依賴的政治表現。這一「表現」之屈辱性質是爲一處在極高位置的，但終究是一小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心理來決定。偉大事變永久是發覺他沒有準備。

史大林一派愈背向世界革命時，牠將愈感覺對世界資本之依賴，牠將『用一雙手』更戰慄地抓緊世界資本。史大林的握手，不僅是一象徵的行動——牠幾乎是一政綱。當他無思想地和堅決地誣蔑反對派努力於將蘇聯工業移交於外國資本時，史大林是明顯地準備着國際的以及國內的政治路線之改變。

官僚被夾在鉗子中時，他能從事於任何的冒險，連叛變的冒險也在內。盲目地信賴牠，即是做叛變的附屬品。今日比任何一天都要緊，我們有注視史大林在國外政治關係的範圍中行動的義務，不僅不倦的注意，而且要尖銳的不信賴。

防備着！準備着！

譯者按：千貝爾的書出版後數月，未見史大林出來否認此論語。直到托氏此文發表後，史大林始在蘇聯黨報上加以否認。托氏於本年一月十四日又發表一文，爲「史大林之否認」，歷舉從前的幾件事實，以證明史大林實於在事後被攻擊得不能脫身時，即毫不致力地否認自己過去的話。此文因與本書無關，故略。

國際形勢之鑰在德國

本文的目的是在指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勢之最一般的情形。這是由於衰敗的資本主義之基本矛盾爲嚴重的商工業及金融危機所擾，趨於尖銳化所造成的。倉卒寫下的以下意見，遠未包括一切國家和一切的問題。

一 西班牙的革命，爲無產階級直接奪取政權的鬥爭，創造了一般的政治前提。西班牙無產階級之工團主義的傳統，爲革命發展途徑上的主要障礙，至此便立刻顯露出來。共產國際爲事變所突然襲擊。革命初期全然無力的西班牙共產

黨，在一切基本問題上通採取了錯誤的立場。西班牙的經驗，證明共產國際現時
 的領導爲破壞先進工人的革命覺悟之如何可怕的工具呵！無產階級先鋒隊之極端
 的落在事變發展後面，工人羣衆英勇鬥爭之政治上的易爆發性，無政府——工團
 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之實際的相互扶助——這些便是主要的政治條件使共和派的資
 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聯合，能夠恢復壓迫機關，能夠給暴動的羣衆以接連不斷的
 打擊，能夠集中大部分政權於政府的手中。

從這一例，我們看見資產階級同革命羣衆鬥爭，絕非特法西斯蒂主義爲唯一
 武器。現時西班牙的統治，最和克倫斯基政府的觀念相合，這種政府即是資產階
 級在反對革命鬥爭中所僅能產生的最後的（或『將近最後的』）『左派』政府。但
 是這類政府，一般說來，並非一定是軟弱的和屈伏的。在缺乏有力的革命的無產
 階級政黨之下，一半的改良，左的辭句，更左的姿勢與壓迫的手段聯合起來，服

從於資產階級，較法西斯蒂還要適宜。

我們不用說，西班牙革命還未完結。即最初步的任務（土地問題、教會問題和民族問題），她都沒有解決，而民衆的革命源泉，亦決未涸竭。資產階級的革命，除其所已給予的以外，不能再給更多的了。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則西班牙的現時國內狀況，可以稱之爲革命前期的狀況，但亦僅此而已。很可信的，西班牙革命之進攻的發展，多多少少帶一種遷延的性質。即是，歷史的過程似乎又給西班牙的共產主義以準備的機會。

二 英國的形勢也可以相當稱爲革命的前期，倘若嚴格的約定，革命前期與直接革命的狀況中間，可以經過部分的時漲時落的幾年的時期。英國的經濟狀況，已極端的尖銳。但是在這種保守的國家中之政治的上層建築，還趕不上其經濟基礎的變動。英國的各階級在要運用新的政治形式與新的方法之前，總是一再

企圖尋找舊庫藏，補綴若祖若父的舊衣服，等等。事實是這樣：在英國縱然有嚴重的國家衰敗，可是仍然沒有大的革命政黨，也沒有與革命政黨極端相反的政黨——法西斯蒂黨。正因如此，資產階級才有可能在「民族」的旗幟之下，即在最空洞的口號之下，動員人民的大多數。在革命前期的狀況中，無上愚鈍的保守主義竟佔大的政治優勢。求政治建築適合於國家的實際經濟狀況與國際狀況，在這種國家中，大概不是一個月的事，也許還不是一年的事。

沒有絲毫根據可以設想「國民」政府的倒台——這種倒台在比較不遠的將來中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直接的進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其他的革命在英國自然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到「法西斯蒂」的勝利。恰恰相反，多半可信地，可以假定：到英國革命開始以前，還得經過魯易喬治派和勞働黨之急進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的——和平主義的首領政治的長時期。這樣看來，英國的歷史發展，無疑的

還有一長時期給不列顛的共產主義，使之能變為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然而決不能因此就可以在危險的試驗上和中派的盤旋上荒廢時間。時間在現時世界狀況下，乃是最可寶貴的原料。

三、法國是共產國際的那些聖人們在一年半兩年以前所稱為在『革命高潮的前例』的國家，實際不唯是歐洲的，甚至於也是全世界的最保守的國家。法國資本主義統治的相對的鞏固，大部分由於牠的落後，危機在法國比較在其他國家要薄弱些。在金融方面，巴黎幾乎躋於紐約。法國資產階級現時的金融『景氣』，其直接的來源，乃由於凡爾賽的掠奪。但凡爾賽和約也隱藏着對於法蘭西共和國全部政制最主要的威脅。在法國的人口、生產力、國民收入和法國現時的國際地位中間，存在着可怕的矛盾，不可避免將引起爆炸。為維持其不長久的霸權，法國無論是『國民聯合』，或是急進社會黨，均一致要憑藉最反動的力量、最舊的剝

削形式、卑鄙的羅馬尼亞的政團，憑藉畢爾蘇賓基的腐敗統治，憑藉南斯拉夫的軍閥專政，維持德意志民族（德國與奧國）的分裂，堅持東普魯士的波蘭迴廊，幫助日本武力侵佔滿洲，慫恿日本軍閥反對蘇聯，做殖民地民族解放之主要敵人，以及其他。法國在世界經濟中只有次等的作用，而在國際政治中，却有離奇的特權與奢望，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將每月地顯露得更明瞭，將厚積危險，將撼動內部的穩定，將產生民衆的不安和不满，將召起更深刻的政治變化。這些行程，無疑的將呈露於最近的國會總選舉中。

然而另一方面，一切使我們假定：倘若法國國外不發生巨大的事變（德國革命的勝利，或者相反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則法國國內關係的發展，在最近時期中，將是個比較『按部就班』的發展，於是共產主義可以利用大部份準備的時期，即革命前期和革命形勢未到來以前的時期，以鞏固自身。

四 美國是資本極雄厚的國家，現在的危機，用驚人的力量，將美國可怕的社會矛盾，暴露出來了。由全世界震眩於百萬和萬萬財富增加的罕見的繁榮時期，美國竟一蹶而到數百萬的失業和勞働者貧窮得最可怕的時期。這種巨大的社會突變，對於國家之政治發展，不能無踪跡地過去。美國工人羣衆之激烈化到什麼程度，在今天還很難肯定，至少是旁面的人不能斷定。但是我們可以斷言，受行情的大災難的突變意外打擊到如此程度的羣衆本身，他們爲失業或怕失業所壓迫住，還沒有從他們所身受的貧窮做出最初步的政治結論來。本來，做這結論是要相當時間的。然而結論終歸是會做出來的。偉大的經濟危機如帶有社會危機性，將不可避免的變爲美國工人階級之政治覺醒的危機。廣大的工人羣衆之革命的激烈化，也許不在經濟的最低落時期，而在經濟向上或恢復的轉變的時間。無論怎樣，現時的危機，總是在美國無產階級和民衆的生活中，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可以期待美國權力階級的政黨之嚴重的變化和組織第三黨的新企圖。職工運動，在經濟行情向上轉變之第一次信號下，將尖銳感覺有脫離卑賤的美國勞動同盟的官僚主義壓迫之必要。同時在共產主義之前，亦將開闢無限的可能。

我們知道過去美國有過不止一次的革命的或半革命的羣衆運動的怒潮。但這種怒潮，每次均很迅速地消滅，其原因由於每次美國都走上經濟的洶湧高漲的新地位，同時亦由於運動本身的特性，帶有粗暴的經驗主義性，無理論的幫助。這兩種條件，現在已拋到後面去了。經濟的新高漲（我們不能預先斷其爲不可能）不能寄托在國內的『平衡』上面，而須寄托在現時世界經濟的混亂狀況上。美國的資本主義，將走上驚人的帝國主義時代，軍備不斷的增加，干預全世界的事務，軍事的衝突和震動。另一方面，美國無產階級中激烈化了的羣衆，在共產主義身上有——或者正確些說，在正確的政策之下，一定有——已經不是經驗主義

的、神秘主義的謬妄混合物，而是與事變水平相應的科學的學說了。這一基本變化，可以使人相信在美國無產階級中，不可免的和較近的革命的轉變，決不再會是易於撲滅的『麥稈的火焰』，而是真正的革命的燃燒之開始了。美國的共產主義，可以自信地去迎接牠自己的偉大的將來。

五 沙皇在滿洲的冒險，引起了日俄戰爭；戰爭引起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現在日本在滿洲的冒險，亦可以引起日本的革命。

在本世紀之初，日本封建軍閥的統治，尙能爲幼稚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利益效命。但是最近二十五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舊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形式中，引起了異常的分解。從那時起，日本已經不只一次的走向革命，可是國內却缺少執行那爲發展所提出的任務之有力的革命階級。滿洲的冒險，可以加速日本統治之革命的崩潰。

現在的中國，無論其如何爲各派軍閥所削弱，然而和過去日本跟在歐洲列強之後，以武力壓迫過的中國，已經迥不相同了，中國固然沒有力量馬上驅逐出日本軍隊，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活動，異常之增長了，受過了軍事訓練的有幾十萬幾百萬的中國人。中國人必將不斷的湊成新軍隊。日本人必將感覺到受包圍。鐵道大半將供軍事的用途。日本只有增派更多的、更多的軍隊。佔領滿洲，將損壞日本的經濟機體。日本國內的不滿增大，矛盾尖銳化，因而加速革命的危機。

六 在中國，因爲反帝國主義侵入的堅決自衛的必要，也會引起內部的嚴重的政治後果。目前的統治，是從民族革命的羣衆運動中產生來的；但是這運動本身，却被資產階級軍閥（在史大林的官僚主義幫助之下）所利用和撲滅。正因如此，現在之矛盾的和動搖的統治，不能有軍事——革命的發動。反對日本侵略者

之自衛的必要，將愈變爲反對目前的統治，培植民衆的革命情緒。在這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先鋒隊，假如有正確的策略時，必能將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所悲慘失掉的收回。

七 現在的滿洲事變，也證明了主張蘇聯政府單純的將中東路交還中國的那些先生的頭腦如何簡單。假如單純的交還中東路，則不啻自願的將牠送給日本，使日本得以握着中東路，爲反對中國反對蘇聯之重要武器。假如直到現在日本軍閥之沒有侵犯滿洲，假如現在日本軍閥尙稍事慎重，則不能不說是中東路屬於蘇聯財產之一事實有以使之然。

八 然而日本的滿洲冒險，是否會引起日本與蘇聯的戰爭呢？不消說，蘇聯的政策，縱是最合理的和慎重的，這一可能，也仍是存在。封建資本主義的日本，其內部的矛盾，顯然使其政府失掉了平衡，假如有人（法國）挑撥時，則將

更無忌憚。而我們從沙皇在遠東的歷史經驗，可以知道失去了平衡的軍閥官僚的帝制，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在遠東開始的鬥爭，自然不是爲的鐵路，而是爲的全中國的命運問題。在這偉大的歷史鬥爭中，蘇聯政府不能守中立，不能對中日取同樣態度。蘇聯政府必須完全站在中國民衆方面。只有蘇聯對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之堅定不移的忠誠，才可在東方真正保護蘇聯，以抗日英法美。

蘇聯政府最近時期，將以何種形式幫助中國民衆之鬥爭，須得依具體的歷史的環境而決定。然而設若從前自願將中東路交給日本是愚蠢，那麼，將遠東的一切政策，均以中東路問題爲歸依，也是同樣的愚蠢。許多事實證明日本軍閥在這問題上的行動，具有故意挑釁的性質。站在這一挑釁背後的，是法國政府。挑釁的目的，在使蘇聯有事於東方。因此蘇聯政府方面，更需更堅毅與遠見。

東方的種種基本條件——地廣、人稠、經濟落後——使一切行程帶着慢性的拖延的蠕行性質。從遠東方面所加於蘇聯存在之危險，直接的或尖銳的威脅，無論如何是沒有的。最近的時候，主要的事變，將在歐洲發展。在歐洲，可以顯出大的可能，因此亦有大的危險威脅着。現在只有日本將自己的手足在遠東束縛住了。蘇聯現時應該讓自己的手足自由。

九 世界的（決不是和平的）政治舞台上，最可注意的是德國的狀況。德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已達到罕見罕聞的尖度。解決的時候快到了。將近到了由革命前期的狀況轉變到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狀況時期。此後若干年之德國命運如何，甚至於歐洲與全世界的命運如何，全要看這次德國危機的解決，向那一方面走。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西班牙革命的進行，英國革命前期形勢的發展，法帝

國主義此後之命運，中國和印度革命運動的命運——這一切，莫不繫乎最近幾月間德國的勝利誰屬的問題：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

一〇 去年九月總選舉以後，德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斷定法西斯蒂達到了頂點，說牠以後將迅速的崩潰，牠不過是爲無產階級革命清道。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布爾雪維克——列寧派）那時就排斥過這輕薄的樂觀主義。法西斯蒂主義是兩種條件之產品：一方面是尖銳的社會危機，另一方面是德國無產階級之革命力量的軟弱。而無產階級的軟弱，本身又是由兩因素結合成的：一即社會民主黨之特殊的歷史作用，社會民主黨仍然是無產階級隊伍中強有力的資本主義代理人；一即共產黨的中派領導不能在革命旗幟之下團結工人。

在我們看來，共產黨是主觀的因子，因爲社會民主黨乃是應該消除的客觀障礙。假若共產黨會團結工階級，將其變爲對於一切被壓迫羣衆之有力的革命戰

石，則法西斯主義真正會潰散。然而去年九月選舉以來，共產黨的政策只變得更不中用，空喊『社會法西斯蒂』，對狹義愛國主義的態度曖昧，模倣真正法西斯主義去與他作市場的競爭，『紅色國民投票』的有罪的冒險——凡此種種，均不允許共產黨成爲無產階級與人民的領袖。數月以來，共產黨在自己的旗幟之下所吸收的新成份，只是最大的危機暴力地推進牠的隊伍的成份。社會民主黨，不顧那些似牠滅亡的政治條件，由於共產黨的幫助，竟保存了牠的主要羣衆，牠的損失固大，但都是些次要的。至於法西斯蒂，則違反特爾曼、列墨爾以及其他人們的自己稱贊，並完全符合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之預言，從去年九月起，有新的廣大的突飛猛晉。而共產國際的領導，既不會事先見到，更不會事前預防。牠只會登記失敗。牠的議案及其他文件只是表現其爲歷史過程的後部的照片。

一一 決定的時間逼近了。而共產國際對於現時世界的真實狀況還不想，正

確點說是害怕，加以估計。共產國際主席團以空話的煽動的紙片來裝飾。共產國際的領導黨，聯共，沒有任何立場。『世界無產階級的首領』真正是絨口結舌。他們想沉默，他們準備坐在旁邊。他們希望再等一等。他們以駝鳥的政策來代替列寧政策。現在有一歷史的緊要關頭走近，共產國際在做了許多大的、但終是『局部的』錯誤，毀壞了其存在的最初五年所積聚的力量以後，有做一基本的致命的錯誤之危險。這一錯誤可以將成爲革命因素的共產國際在一個的歷史時代，從政治舞台上掃去。

且讓盲人與懦夫不注意這點。讓造謠者與僱傭的新聞記者來誣我們同反革命聯合罷。可是人人皆知，這一反革命，不是指鞏固世界帝國主義的那些人們，而指的是干涉共產主義的官僚之難言症的人們。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是不怕造謠中傷，並且不會因此放棄其革命職責的。一點也不應沉默與緩和。應當明白的太

聲的在先進的工人面前說，冒險主義的和吹牛主義的『第三時期』以後，又已經走到『第四時期』——張皇失措和投降時期了。

一一 假使我們追求蘇聯共產黨現時首領的沉默是什麼意義時，這沉默不會表示：『讓我們過平靜的日子』。蘇聯內部的困難，還極端的大。沒有調節的經濟的社會的矛盾繼續尖銳化。機關的腐化，為複決制度（按此指蘇聯黨內黨員無權決定大問題，只是在官僚議決後加以覆決的意義——譯者）之必然結果，實際上到了危險的程度。

政治的關係，首先是黨內的關係，即腐化了的機關和易於燃燒的羣衆之間的關係，緊張得有如將斷之絃一樣。一切官僚們的聰明，只在於等待，拖延。德國的狀況，顯然要發生大震動。可是史大林派的機關，却最怕震動。『讓我們過平靜日子，讓我們脫離內部最尖銳的矛盾罷！到了那裏……我們再看。』史大林派上層的情緒，就是如此。正是這一情緒隱藏在『領袖們』的可恥的緘默之後，而這正

是在「領袖們」最低限度的革命義務，需要他們明白的，和清楚的發表意見的時候。

一三 莫斯科領導者的背信的沉默，成了柏林首領們張皇的信號，這是毫不奇怪的。現在，正應當準備着去引導羣衆加入決定的鬥爭的時候，德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却表現失望、動搖、玩弄辭句。這些人是不習於負獨立的責任的。他們現在最夢想的，是怎樣設法證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也贊成避開鬥爭呢？

關於這點之成熟的理論，似乎還不會創造出來。然而牠却已成爲空氣了。牠已從口頭的傳播透入論文和演說中了。這理論的意義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之生長，是不可抑止的；法西斯主義之勝利總是不可避免的；與其「盲目的」去鬥爭， and 自討失敗，不如慎重的退却，讓法西斯主義去取得政權，使其自毀信仰罷！那

時候，——呵，那時候！再看我們的力量！

照政治心理的規律，冒險與輕浮之後，總是由屈伏和投降來代替。法西斯蒂的勝利，在一年以前是不可思議的，現在則認為不成問題了。古西倫（共產國際機關內現在的值日領袖，譯者）大約受拉迪克的暗示，為史大林準備了天才的戰略公式：及時退却，將革命軍隊從火線上帶出來，給法西斯蒂安個圈套，……這圈套即國家的政權。

倘若這個理論在德國共產黨中通過了，並且決定了往下幾月的政治路線，則共產國際方面的變節，其歷史範圍之大，當不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社會民主黨的變節，而且還要得到更悲慘的結果。

左派反對派的責任，是要告警：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引導德國無產階級到瀾大無比的浩劫中去，其實質即是引導到法西斯主義面前倉皇失措的投降。

一四 『國家社會黨』得到政權，首先就是殲滅德國無產階級的精華，破壞其組織，和毀滅他們對於自己和對於自己的將來的信仰。與德國社會矛盾之尖銳和成熟得多相應，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地獄工作，比起德國國家社會黨的工作來，多半要黯然無色，幾乎還要算是人道的。

你們昨天預言『第三時期』的人現在說退却嗎？領袖和機關可以退卻，個別的人們可以隱藏，但是工人階級在法西斯蒂政權面前則無地可退，無處可藏。假如真有這奇怪的和令人不可信的事情，即是黨真正地避開了鬥爭，這樣把無產階級的腦袋，交給牠的死敵，則這只是表明一點：劇烈鬥爭不在法西斯蒂得到政權以前。而在其得到政權以後展開，即是鬥爭條件比現在幾十倍地利於法西斯蒂的時候。被自己的領導者出賣的，受出其不意之襲擊的、無主意的、失望拚命的無產階級反法西斯蒂統治之鬥爭，將變成許多可怕的流血的和無出路的大搖蕩。十

個無產階級的暴動，十個連續的失敗，其流工人階級之血，和使他們無力，決不如現時在法西斯蒂面前退却將工人階級變得無力的那樣厲害；因為現時正是解決一問題：誰將做德國的主人的時候。

一五 法西斯主義還沒有取得政權。到政權的道路對於法西斯蒂也還沒有開闢。法西斯蒂的領袖們還害怕一拚：他們懂得孤注是很大的，是關於頭顱的問題。在這些條件之下，只有共產黨上層份子的投降情緒，才能使法西斯的取得政權的任務意外的簡單和容易。

假如資產階級中間有些勢力的人因為不願意有震動，長期的和痛苦的內戰而害怕法西斯蒂的試驗，則為法西斯蒂開闢到政權的道路之官式的共產主義的投降政策，將完全推動中間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尚在猶豫的份子、以及無產階級本階級之重要部份，使之完全站到法西斯蒂方面。

不用說，勝利的法西斯蒂某一日終會成爲客觀矛盾和自身的不用之犧牲品而傾覆，但是在可見到的將來，在此後十年或二十年間，法西斯蒂在德國的勝利，將表明革命的一脈相傳的發展之中斷，共產國際滅亡，世界帝國主義在其最可憎厭與其殘忍嗜殺的形式中凱旋。

一六 德國法西斯蒂勝利以後，反蘇聯戰爭將是必然的。

如果有人以爲德國國家社會黨得到政權後，會開始反法國的戰爭，或者反波蘭的戰爭，則簡直是政治的大蠢才。法西斯蒂統治的第一時期，因爲反對德國無產階級之不可避免的內戰，將其對外政策的手足縛住。希特勒之需要畢爾蘇瓦基，正如畢爾蘇瓦基之需要希特勒。這兩個人將同樣爲法國的工具。假如法國的資產階級現在害怕德國法西斯蒂得到政權，認爲前途在不可知之數，則到了希特勒勝利之日，法國的反動派，不論是「國民聯合」或急進社會黨，均將要盡力維

持德國法西斯主義。

現在無論那一個『循常軌的』議會制的資產階級政府，均不敢冒險進行反蘇聯戰爭；因為這將引起無限的內部糾紛。但是，若希特勒得到政權，假若他以後又摧殘了德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全體無產階級長年地潰散沮喪，法西斯蒂政府將為唯一能與蘇聯戰爭的政府。至於這政府屆時將同波蘭、羅馬尼亞、和蘇聯其他的鄰國，在遠東則同日本結成共同的戰線，自不待言。希特勒政府在這一計劃中所表現的，不過是世界資本的一個執行機關而已。克里孟梭、米勒蘭、魯易喬治、威爾遜不能同蘇聯共和國直接戰爭，但是他們能夠維持哥爾薩克、台尼金、蘭格爾等人的軍隊至三年之久。希特勒假如勝利的時候，將是世界資產階級的超蘭格爾。

這種偉大的決鬥如何完結自用不着去猜測，而且也不可能。但是世界資產階

殺反蘇聯的戰爭如果在德國法西斯蒂得到政權以後開火了，則蘇聯將變得可怕的孤立，鬥爭是在最艱難和最危險條件中之下，不是爲爭生，而是爲決死，這是很明白的。當德國無產階級被法西斯蒂擊敗時，蘇聯共和國滅亡的成份已決定了一半。

一七 可是問題在沒有出來到歐洲戰場解決之前，必須先在德國解決。因此我們說歐洲形勢之鑰在德國。這鑰現在誰的手中呢？暫時還是在共產黨手中。共產黨還沒有弄壞牠，但是共產黨可能將牠弄壞。黨的領袖推動黨向弄壞這鑰匙的路上走。

凡是主張「戰略上的退卻」，即投降的人，凡是接受此種宣傳的人，都是叛徒。宣傳在法西斯蒂面前退卻的宣傳者，應當視爲無產階級隊伍中不自覺的敵人的代理人。

德國共產黨爲盡其初步的革命義務，一定要說：法西斯蒂之能得到政權，只有經過無情的、殘酷的、不求生只爲決死的國內戰爭。這一點，共產黨中的工人黨員首牛應知道。這一點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應該知道，無黨派的，整個無產階級都應該知道。世界無產階級應知道這一點。紅軍應該事先知道這點。

一八 然則事實上鬥爭果毫無希望嗎？勃蘭德勒爾在一九二三年離奇地誇大法西斯蒂的力量，以此掩蓋了投降。這一戰略的結果，世界工人運動一直負担到今日。一九二三年德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之歷史的投降，成爲法西斯蒂主義以後生長的基礎。現在德國的法西斯蒂，較之八年以前，有不可輕視的大政治力量。我們時常警告輕視法西斯蒂的危險，而現在不是我們否認這危險。正因如此，我們現在能告訴並且應該告訴德國革命的工人：你們的領袖們，從一極端搖擺到另一極端去了。

國際形勢之倫在德國

現在法西斯蒂的主要力量，還是數量上的力量。不錯，他們得到了許多的選舉票。但是投票決定不了社會的鬥爭。法西斯蒂之主要軍隊，都是些小資產階級和新的中等的層次：小手工業者和商業城市的民衆、官吏、職員、技術人員、知識份子、破產的農民。在選舉統計的天秤上，法西斯蒂一千票的重量等於共產黨一千票的重量。但是在革命鬥爭的天秤上，大企業一千工人的力量，較之於一千官吏的、公事房辦公人的、他們老婆和姑太太的力量，要大過百倍以上。法西斯蒂的主要羣衆，乃由人的塵埃組織而成。

在俄國革命之中，社會革命黨，也曾是數量大的黨。在最初時候，凡不是自覺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自覺的無產階級份子的人，都投社會革命黨的票。甚至於在立憲會議中，即是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黨還占大多數。因此他們自命是偉大的民族的政黨。而他們不過是偉大的民族的零而已。

我們不是說俄國社會革命黨和德國國家社會黨中間可以放一等號，然他們中間之相似點，不可爭地是有的。社會革命黨是代表民衆混沌的希望的政策，而國家社會黨則代表國民的絕望。只有小資產階級（後面甚至有一部份無產階級）最會從希望過渡到絕望。國家社會黨的主要羣衆，一如社會革命黨，乃是人的灰塵。

一九 陷入驚惶失措中之可嘆的戰略家，忘記了最主要的：關於無產階級之偉大的社會的戰鬥的優點問題。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耗竭。牠不惟能夠鬥爭，而且能夠勝利。關於企業中有頹喪情緒的議論，多半反映着觀察者本身的頹喪情緒，即失望的黨內官僚的情緒。可是應該注意一點：即工人不能不被環境的複雜和上層的糊塗所激怒。工人明白：偉大的鬥爭，須要堅強的領導。工人所懼的非法西斯蒂的力量，亦非激烈鬥爭之必要；他們担心領導在最緊要的時候不可靠、不振作、動搖。只要黨能表明其堅決的、鮮明的態度，自信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則工廠中之頹喪情緒，決不會留下半點痕跡。

二〇 法西斯蒂有很好戰鬥的幹部，有有經驗的衝鋒隊伍，這是無可爭辯的。「軍官」即在國內戰爭的軍隊中起大作用，這也是不可輕視的。但是決定的不是軍官，而是兵士。而無產階級軍隊的兵士較之於希特勒軍隊的兵士，則要高明可靠、和堅毅得無限。

法西斯蒂在奪得政權以後，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兵士。在國家機關幫助之下，可以從資產階級的子弟、知識份子、職員、沮喪的工人以及流氓等之中組成軍隊。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即其一例。自然，此地還得要說明：意大利法西斯蒂民軍之戰鬥的能力，直到現在，還不會經過嚴重的歷史的試驗。可是現在德國的法西斯蒂還沒有政權。政權還在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去奪取。難道共產黨對於這個鬥爭將推出比法西斯蒂更壞的幹部嗎？退一步說，難道手握著生產工具和運輸的

德國工人，難道由勞動條件團結成的鐵的、煤的、鐵軌的、電線的軍隊之德國工人，在最後的鬥爭中，不會比希特勒的人類之塵埃顯示出其無量的優勝麼？

黨或階級，關於國內力量的相互關係之認識，也是黨或階級的力量之重要因素。在一切戰爭中，敵人總是圖誇大自己力量以嚇敵人。這是拿破崙戰略的秘密之一。希特勒的吹牛，無論如何不會比拿破崙壞。但是他的自誇之能成爲軍事因素，只是在共產黨相信他的時候。現在最需要的便是計算實際的力量。國家社會黨在工廠中、鐵路上、軍隊中有什麼，他們有多少有組織的和武裝的軍官？兩個營壘的成份之明白的社會的分析；不斷的和警覺的計算力量——這便是革命的樂觀主義之正確來源。

現在國家社會黨的力量，並不在他們自己的軍隊，而在他們的死敵的軍隊的分裂。然而正因法西斯蒂危險的現實性，其增長與其逼近，和無論怎樣都要避免

牠的覺悟，應該推動工人在自衛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無產階級的力量將集中得愈快和愈有成績，假使這一過程的中堅，即共產黨愈靠得住。形勢的鑰匙現在仍在共產黨的手中。假如共產黨將牠弄壞，那才可悲！

近年以來，共產國際的官僚，利用種種問題，有時是完全不合的，總是大呼直接威脅蘇聯的戰爭危險。現在這個危險卻有了現實的性質和具體的輪廓。法西斯蒂在德國奪取政權之努力，不能不引起紅軍的動員，這點對於一切革命的工人應該成爲一個不待證的自理。對於無產階級的國家，這裏也就是最直接和最迫近的革命自衛的問題。德國不僅僅是德國，牠是歐洲之心臟。希特勒不僅僅是希特勒，他是超爾格爾之候補者。然而紅軍也不僅僅是紅軍，牠乃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武器。

我看俄德將有戰爭

假使希特勒派在德國得勢

世界政治現在有兩個彼此離得異常之遠的焦點：一個在北平——遼寧鐵路
上，一個在柏林——Munich（巴羅利亞Bavaria那之首府——譯者）鐵路線上，這兩傳
染點之每一個都能破壞我們地球上幾十年的事變之『平常的』進程。然而官式的
政治家與外交家們日常地工作着，好像沒有什麼非常的事情發生似的。這與一九
二二年巴爾幹戰爭時情形一樣，牠是一九二四年的前奏曲。

我看俄德將有戰爭

依某種理由，人們稱這是一駝鳥——大大地誣蔑了一聰明的鳥——政策（相傳駝鳥在被追逐時藏其頭於沙中，以爲這樣即爲人所不見，駝鳥政策即自欺政策之意——譯者）。國際聯盟對於滿洲問題所做的、裝璜式的決議，是在歐洲外交史中一空前的無力的充件，沒有一自尊的駝鳥會在這決議上簽字的。對於遠東正在準備着的是什麼之盲目——有些地方自然是有意的——至少有其可原諒的情形：在那裏的事變，發展得比較的慢。東方雖正向新的生命蘇醒，還遠不是『美國的』，甚至也不是歐洲的速度。

德國是另一回事。在凡爾賽被巴爾幹化了的歐洲，現在已跑進了一死巷，其集中的表現是德國，其政治形式是『國家社會主義』。用社會心理學的話說，這一政治傾向可以稱爲中間諸階級——破產的小商人工匠和農民；一部分失業的無產者；大戰中的軍官和下級軍官，還戴着特殊的勳章，但是已沒有了年給金；關

門的公司中的書記；破產的銀行中之簿記員；無職業的工程師；沒有薪水或前途的新聞記者；那些受正害病而無錢付診費的人照顧的醫生——這些中等階級之失望的流行精神病（hysteria）。

希特勒拒絕回答關於他的國內政綱之問題，其理由是認為軍事秘密。他說他不必將他救國的秘密方針送給他的政敵。這不算是很愛國，但却是聰明的。實在希特勒沒有什麼秘密。然而我們此地不管國內政策。關於國際政治方面，第一眼看來，他的態度似乎比較確定些。希特勒在他的演說與論文中對凡爾賽條約言戰（他自己也就是凡爾賽條約的產物）。他擅長於製造罵法國的話。但是事實上講來，假如他取得了政權，他將變成支持凡爾賽條約的主要台柱子之一，結果變成法國帝國主義之一支柱。

這些話似乎是難解。然而我們假使正確分析——即是說，從分析政治的基本

因素，而非從人們的表示、姿勢、和種種的唱高調出發——歐洲的與國際的形勢，這些話是牠的必然邏輯。

希特勒將需要同盟者

德國的法西斯黨宣告他有兩個敵人：凡爾賽和馬克思主義。他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係指德國的兩黨——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一個國家——蘇聯。他們所說的凡爾賽，係指法國與波蘭。爲了要了解國家社會黨之德國之真實的國際作用，我們必須略一衡量這一問題中之這些因素。

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關係，從意大利的經驗看來，是十分清楚的。莫索里尼的政綱，在其做小歌劇式的向羅馬進發之前一日，他和希特勒的政綱一樣的急進與神祕。其實際因素是反對革命勢力及反對反對黨勢力之爭鬥。德國的國

家社會主義，像他的意大利的原胎一樣，只能在毀滅工人組織之後，取得政權。然而這不是一簡單的工作。在國家社會黨與他們所求的政權之間橫有國內戰爭的道路。縱然希特勒用和平的方法得到一議會的多數（這一可能我們可以安全地排斥），爲了建立一法西斯的政制，他仍一樣地需要打折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與工會的脊梁。而這是一極痛苦的與延長的外科手術。希特勒自己自然懂得這一點。這即是他不願將他的政治計劃去供應德國國會的不定的命運之原因。希特勒一方面用合法的話掩飾自己，一方面等待適當時機作短小而尖銳的一擊。他能成功嗎？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認他的勝利爲不可能，則是一不可恕的輕率。無論希特勒走那一條路取得政權——或走開着的門，或打進去——無論怎樣，德國之法西斯化，將是一嚴重的國內衝突，將必然地在很長時間陷國內各種力量於停頓，逼迫希特勒在周圍的歐洲不去復仇而去找同盟者和保護人。我們的分析必須

從這一基本的考慮開始。

德國的工人們在其反對法西斯主義之鬥爭中將天然地在蘇聯找援助，他們是找得到這援助的。你能片刻的想像，在這些情形下希特勒政府將冒險去與法國或波蘭作武裝的衝突嗎？在法西斯德國的無產階級與蘇聯之間站着畢爾蘇資基。畢爾蘇資基的幫助，或他的善意的中立對於竭力從事於使德國法西斯化的希特勒，比消滅波蘭迴廊（即波蘭所佔領的德國語言之區名稱——譯者）更重要些，這一問題——以及德國的全部國界問題——在希特勒之求得到政權與求保全他的艱苦鬥爭中，對於他是如何之不算什麼！

畢爾蘇資基對於希特勒將是對法國親善的一橋梁，假使希特勒沒有別的更近的橋梁。即在現在，我們已在法國報紙——現在只是在其二等報紙中——聽到聲音：『現在是將我們的路線與希特勒的路綫接近的時候了！』不錯，爲巴黎時報

所領導的官場的報紙對國家社會黨取敵視的態度。但這不是因爲現代法國之命運的主宰者重視希特勒維糾的姿勢。不是的，他們所害怕的是希特勒所走的能取得政權之唯一道路——國內戰爭之路——是一其後果爲任何人所不能預言的東西。未必他的從右邊來一政變之政策不會引起一從左邊來的革命嗎？這是法國統治階級所擔憂的，而且是十分應該的。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假使希特勒克服了一切障礙，達到了政權，他爲了在他的本國能自由行動，必被迫而對凡爾賽宣誓表示其忠誠。在 Quai d'Orléans（法國外交部所在的街道——譯者）的人們，對此是沒有一點懷疑的。再者，希特勒的軍事專政只要一在德國堅固地建立起來，將比現在德國的政制爲法國在歐洲霸權中的一可靠得多的因素，因爲德國的現政制之數學公式幾乎完全包含着未知數，這也是他們懂得很清楚的。

戰爭將是必然的

假如想像法國的統治階級會感覺得做法西斯黨的德國之後台老板，是『不好意思』，這是十分孩子氣氣的簡單。法國現在是倚賴波蘭、羅馬尼亞、與巨哥斯拉夫三個爲軍事專政所統治的國家。這是偶然的嗎？一點也不。現在法國之在歐洲的獨霸，是以下事實之結果，即是法國仍是美國、英國、意大利與牠自己的勝利之唯一繼承者（我在此不說俄國，因爲牠沒有參加這一勝利，雖然牠以最大數目的人的性命之代價付給了這次勝利）。從歷史所僅知的世界諸力量的最強有力的結合之手中，法國得到了一遺產，他是不放棄的，但是這遺產壓在他的狹窄的雙肩上無乃太重。法國的領土，牠的人口，牠的生產力，牠的國家收入——這一切顯然不能支持牠的支配地位。歐洲之巴爾幹化，種種對抗之挑起，反對解除軍備

的鬥爭，對於軍事專政的諸國家之維持——這些是延長法國霸權所必要的方法。

將德國國家之強制的分裂，在這一系統中之成爲一環，給與波蘭的離奇的疆界以及其有名的迴廊是同樣必要的。凡爾賽的話所說的『迴廊』是和別人所稱的從活人的機體取去一肋骨的意思是一樣的。當法國一面幫助日本在滿洲的行動，一面對上帝宣誓說牠尋求和平，這只是說牠擁護牠的霸權之不可侵犯性，即是牠分割歐洲與陷牠於混亂的權利之不可侵犯。過火的征服者，如歷史所證明的，永久傾向於『和平主義』，因爲他們害怕被征服者之復仇。

法西斯的政制——這是只有靠流血的震動與德國的新的耗竭之代價纔能實現的——正因此理由而對於法國獨霸成爲無值的因子。法國及牠的凡爾賽統系一點沒有害怕國家社會黨的地方。

希特勒之執政，含有和平的意義嗎？不是的，希特勒的執政，是法國獨霸之

鞏固的意義，但正因此理由，希特勒之執政將是戰爭——不是對波蘭，不是對法國而是對蘇聯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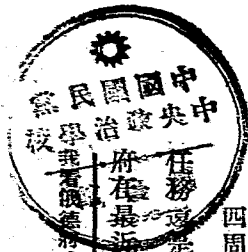
莫斯科的報紙在近幾年不止一次地說到對蘇聯之將要到來的軍事進攻。這篇文章的作者不止一次地反對這種輕率的預測，不是因他相信在歐洲或在地球上其餘的地方缺乏了反蘇聯的戰爭之惡意。不是的，這是不缺乏的。但是對於這一冒險事業，各種的不一致與抵抗是太大，不僅在歐洲各國間，而且更是在各國的內部。

現在沒有一值得說的政治家，想像着用在邊境臨時編制成的軍隊，或單純靠登陸的行動可以解決得了蘇維埃共和國。甚至於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也不再相信他，不管他的政治的聲音練習經過了一極廣的音階。這類的試驗在一九一八——二〇年做得極好，如邱吉爾的豪語所吹的，他動員了「十四國」，反對蘇

聯。英國的財政大臣現在如果能收回那用在干涉俄國的數萬萬金鎊，那他將是何快樂！

但是我們不必爲那已潑了的牛奶叫喊。而且花了那多的錢，也得到了一好教訓。假使在那時候，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初年，紅軍走路穿的是嬰兒的鞋子——咳！那幾年牠在脚上常常一點東西都沒有！——『十四國』的軍隊不能得勝利，現在紅軍是一偉大的力量，有其勝利的傳統，有青年而有經驗的軍官，有爲革命所教育起來的無盡的後備軍，而且有十分豐富的軍實，現在進攻蘇聯的希望是如何之少！

四周圍的國家之聯合的力量，即使牠們能被牽入這一冒險，爲了進攻蘇聯的任務還是太少。日本是離得太遠，不能盡反蘇聯的獨立的軍事作用，再者天皇政府在最近幾年，在近處還有很多的問題要應付。爲使進攻成爲可能，需要一高度



工業化的而且還是歐洲大陸的大國的國家，牠要，而且能，担負在自己身上反蘇維埃的神聖戰爭的主要重量。更精確些說，一個沒有東西可以失去的國家。試一望歐洲的政治地圖，將使我們相信，只有法西斯的德國能担負這一使命。更有甚者法西斯的德國將沒有別的路可走。在付了無數生命代價取得了政權之後，在對一切國內問題顯露出牠的破產之後，在對於法國，因此亦對於如半附屬國那樣的波蘭投降以後，法西斯的政府將必然被迫而找尋一種脫離破產，和脫離國際形勢中的諸矛盾的孤注一擲。反蘇聯的戰爭將從這些情勢中如命定的必然一般的生長出來。

或者有人引用意大利的榜樣來回答這一悲觀的預測，蘇聯與意大利已建立了一種暫時和平的關係。但是這一反對是皮相的。意大利距蘇聯中間隔着有幾個國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是由於純粹國內的危機發酵起來的——意大利的國家要

求，在凡爾賽會很寬大地被滿足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是在大戰之後不久執政的，那時候完全談不到一新的戰爭。最後，法西斯的意大利那時是孤立的，那時歐洲沒有人知道，一方面法西斯的政制和另一方面蘇聯的政制會證明是如何之堅固。

在這一切方面，希特勒的德國之地位是命定的不同。牠需要有一國外的勝利。蘇聯是一不可忍的鄰人。我們記得畢爾蘇賓基在與俄國簽訂不侵犯條約之前，躊躇了如何之久。希特勒與畢爾蘇賓基兩人並肩而立，這幾乎回答了我們的問題。在另一方面，法國不能不了解牠不能使德國永久的解除武裝。法國的政策將是指使法西斯的德國去反對東方。那將是供給一開放的活塞，以發洩德國反對凡爾賽制度之全國的憤怒，而且——誰知道？或者我們將在這條路上有幸運的找出新的可能來解決那一切世界問題中之最神聖的問題，賠償問題。

我看俄德將有戰爭

俄國必須準備着

假使你相信法西斯的預言家的話，他們說將在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取得政權——雖然我們是遠不相信這些人的片面的話的——我們預先可以編出一種政治的日曆。爲了使德國法西斯化——摧殘德國的工人階級，創造一法西斯的民團，恢復軍隊中的幹部——需要一兩年的工夫。在一九三三——三四年的時候，軍事進攻蘇聯的條件即相當的成熟。

這一『日曆』自然是假定蘇聯政府在此期間是耐性的等待。我與現在莫斯科政府的關係，不是那種我有權代表牠發言，或指出牠的意向之關係，我對牠的意向也像每一別的讀者和從事於政治的人一樣，只能在一切能得到的情報之基礎上來下判斷，但是我因此能更自由地說出我所認爲蘇維埃政府在德國發生法西斯的

國家政變時所應當採取的行動。在接到這一事變的電話以後，我處於他們的地位時就簽一道命令動員一切後備軍。當你有一不共戴天的敵人在你的前面，當戰爭從客觀的形勢之邏輯發展出來是必然的時，我們如果給敵人以時間建立與鞏固自己，訂立必要的聯盟，接到必要的幫助，規畫出集中的軍事行動——不僅從西方，而且從東方——的計畫，這樣長成功一巨大的危險，我們如讓牠有充足時間這樣做，將是不可恕的疏忽。

希特勒挺進隊已在全德國唱那一名叫漢斯·布哈納的博士所做的反蘇維埃的進行曲。假使他們吞吞吐吐地唱這軍曲，未免令人不快。假使他們命定地要唱牠，讓他們急促地唱牠罷。

希特勒的政府與蘇維埃政府之間的戰爭是必然的，在形式上無論是誰發動這一戰爭，而且這戰爭將在一極早的日子發生。這一戰爭的後果將不可計算。但無

論他們在巴黎抱有如何幻想，我們自信地可以說一件事：在布爾雪維克——法西
斯的戰爭之火燄中，最初燃燒起來的東西，將是凡爾賽條約。

蘇俄革命與國際形勢

一 答紐約泰晤士報編輯部的問題

問題：你對於今日史大林制度的態度怎樣？何故？

回答：爲了回答第一問題，我應當嚴格區分兩個概念：蘇維埃制度之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和史大林制度爲蘇維埃制度之官僚的扭曲。我是爲了鞏固和發展蘇維埃制度，而進行反對史大林的制度的鬥爭。

問題：你還認為布爾雪維克的革命現在在『特米多』(Thermidor)的階段，
你在你的自傳中所發揮的見解，已爲在你離開俄國以後的事變所證實了嗎？

回答：我從未說過，革命的現在階段是特米多的階段（譯者按：特米多且九日是法

國大革命時代羅伯斯庇爾被捕，小資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被推翻，大革命完結的日子。托氏曾用此字以

指出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將來有被反革命推翻的可能。）特米多的歷史的含義有很確定的內容，

他的意思是反革命勝利的第一階段的實現。蘇聯的特米多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握
得政權（雖然最初是一半戴假面具的形式），因此是十月革命的傾覆。我沒有在
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說過十月革命已傾覆。這是整個史大林派的報紙頑強地指爲
我說的，與真理的利益毫無共同之點。

實在我說過，而且現在仍說，在十月革命的基礎上，形成了強有力的官僚階
層，在牠中間，積極的和消極的特米多傾向很強有力。然而這些傾向的勝利還有

好遠。對抗這些傾向的行動爲：爭共產黨的、職工會的、蘇維埃的獨立，和爭他們對於官僚之嚴密的監督。

這一見解完全不是在我被放出蘇聯以後才形成的；恰恰相反，牠成爲我被放逐之原因：官僚們不能容忍人侵犯他的命令作用。

官僚的特米多傾向的危險，列甯完全明瞭。他在一九二二年黨的第十一次大會的最後一次演說中警戒這一危險。我與列甯最後一次的談話，也是爲了這一問題。列甯對我提議與他聯盟反對官僚主義，他和我一樣認爲官僚主義的中心是史大林所領導的黨的機關。列甯的第二次患病破壞了這一計劃的實踐。

問題：請你表示你對於五年計劃和對於俄國的經濟前途之估量。

回答：關於工業化的問題，具體的說，關於五年計劃的問題，是史大林和我所屬的左派反對派之間的一個主要爭鬥點。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史大林派認爲

必須依賴殷實的農民，拒絕爲了工業化的利益加他以負擔。『有計劃的開始』，爲官僚們所譏笑：『我們靠天降雨，不靠計劃』。在一九二五年我出版了一本書到資本主義還是到社會主義，在那裏證明在正確的領導之下工業可以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增長。史大林和莫洛托夫認爲這一數目是幻想的，攻擊左派反對派爲『超工業化主義』。這一簡略的歷史的回顧，已足以解釋我對五年計劃的態度：我認牠，不論領導者犯了如何粗野的錯誤（這是由於官僚的沒有預見所生出的），不論這些錯誤，牠是不僅在蘇聯的，而且是在人類的發展中前進的偉大的一步。

問題：你相信五年計劃的發展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蘇俄（沒有其餘的歐洲沿類似的方向之合作）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呢？

回答：你們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的問題嗎？社會主義的必然是從現在人類生產

力不僅與生產工具之私有，而且與現在的民族國界，特別是在歐洲，不能相容，從這裏歷史地生長出來。正如中世紀之各小邦獨立妨礙年幼的資本主義發展，同樣，達到最高發展之資本主義也在民族的國家之範圍內被絞殺。社會主義的經濟將在世界的分工之基礎上發展，這一分工的雄偉的前提已為資本主義所創造。

蘇維埃的經濟建設，在我的眼中是將來的歐洲的、亞細亞的，和世界的社會主義建築之一部份，而不是一獨立的民族的整體。

問題：蘇俄將被迫與西方資本主義成立某種妥協嗎？假使牠不能單獨進行社會主義的政策？此種妥協將採何種形式？

回答：蘇維埃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間的『妥協』不是將來的而是現在的問題。牠在今日已是事實，雖然不是很穩定的。在孤立的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相互關係將來怎樣發展呢？具體的預言是不容易的。但是整個說來，我可以作這樣

一個預斷：歐洲的資本主義離社會主義的革命，比蘇聯離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近得多。

問題：假使這種妥協證明是可以的，蘇俄與別國在政治方面的關係的前途將來是怎樣呢？

回答：蘇維埃政府利於維持和平的關係。蘇維埃政府已用和正用一切方法，凡為政府之力所能處分的方法以表示其傾向和平之意志。固然，巴黎認為蘇聯的普遍軍縮的提議是莫斯科好戰的意向之證據和法國之拒絕走軍縮的路恰恰相反，是牠的愛和平的意向之表示。與這一邏輯相應，官式的法國報紙認為日本之侵入中國是文明的行動，中國的抵抗為野蠻的行動。那些侵入到別家的人不稱為土匪，而是防衛自己的家的人則是土匪。但這是我們很難同意的。

問題：你對於現在世界經濟危機，及其對現時社會秩序的含義的意見怎樣？

你認為世界革命爲危機的或然的後果，還是你相信資本主義可以克服這危機走進一穩定時期呢？蘇俄在穩定時的形勢是怎樣呢？世界經濟危機不使蘇俄感覺有修正自己經濟政策之必要嗎？

回答：現在的經濟危機，無疑的表示世界資本主義之爲一制度已過了時候。牠之爲別一制度所代替的歷史的時間，不消說，各國是不一樣的，尤其是世界的各地方。現在的歐洲是沒有出路。假使市場的法則之自動的工作過一兩年可以引起歐洲的危機的緩和，那麼再過一比較短的時期，牠（危機）回來時更帶着加倍的力量。生產力在歐洲的國家的籠中已被窒息。白里安的走方郎中的統一歐洲的計畫，沒有走出，也不會走出衙門的和編輯部的試驗室之外。統治階級用更使歐洲經濟分割，加強保護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法醫治危機。在這些情形之下，我看不出歐洲資本主義真正穩定的任何前途。

問題：俄國共產黨的獨裁有變化的必要嗎？應當怎樣的變更呢？

回答：這一問題與頭兩個問題緊相連繫。不消說，經濟的進步異常地加強了蘇聯。同時牠異常地削弱了史大林派官僚的地位。這裏沒有任何矛盾。首先，蘇聯人口中一切有覺悟的份子卻完全明瞭工業化和集團化方面的進步之所以成爲可能，只是因爲史大林派的官僚遭逢着了爲他所保護的富農的抵抗，拒絕將糧食出售於國家，他不得不剝取和應用左派反對派的政綱。史大林之對付我們的政綱，正如，比方說，自由貿易派的麥克唐納之剝取約瑟夫·張伯倫的保護主義的政綱，後者在他的時候在選舉中曾受到很厲害的打擊。今天張伯倫（是父親不是兒子）無論如何比麥克唐納在英國得人信仰些。固然，張伯倫早已進了墳墓。但是俄國反對派的重要領袖都活着。拉可夫斯基（*Rakovsky*）曾任烏克蘭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和蘇聯駐法大使——譯者）從巴爾諾爾（拉氏之充軍地）密切地注視蘇維埃的經濟和

政治的一切行程。

史大林派官僚的地位之削弱其第二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的進步異常提高了，不僅俄國工人的數目，而且也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他們對自己力量之自信和不依賴的感覺。這一切特點都是與官僚的訓政難得調和的。然而史大林派的官僚在擁護自己的統治的爭鬥中，將官僚的制度引伸到了極度。

我特別指出這一情況：經濟的進步，如歷史上所常見的，不是鞏固而是動搖統治階層的地位。我認為蘇維埃制度的方法上嚴重變更完全是必然的，而且在多少近的將來。這些變更將打擊史大林派官僚的專政，無疑地為蘇維埃民主主義在為十月革命所安置的基礎上的繁榮開闢道路。

問題：你計算着你將回俄國嗎？在何種條件下是可能的和你的政綱是怎樣的？

回答：我以為這些變更，能夠和必然使左派反對派在蘇聯回到積極的工作。

問題：外面說你主張德國共產黨員應擁護白魯甯政府以爲避免希特勒勝利之手段，這是真的嗎？你認爲德國共產黨現時政策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

回答：說我號召德國的共產黨員擁護白魯甯政府的消息，不消說是造謠。這是史大林派的報紙歸之於我的計畫，以後又爲不善於理解的新聞記者所傳播。我向德國共產黨員提議，進行所謂聯合戰綫的政策。社會民主黨與國家社會黨處於對抗的地位。共產黨員應當向社會民主黨及其所領導的工會提議反法西斯蒂進攻的共同的實際的鬥爭綱領。社會民主黨的羣衆極誠實地願意進行這種鬥爭。假使領袖們拒絕，他們在其自己的羣衆中失掉信仰，假使領袖們同意，羣衆在實行中比領袖們走得這些和擁護共產黨員。應當會利用反對者和敵人中間的不一致。只有在這種彈性的政策之下，可以一級一級的向上升。戰略不僅知道有衝鋒，而且

也有縱橫的策略，我一點也不懷疑德國共產黨，不顧史大林派官僚之抵抗，能了解這一戰略，只是由這一戰略，布爾雪維克主義過去取得了政權。

問題：你看美國在現在世界形勢中的地位是怎樣呢？

回答：我以爲由於現在危機的結果，美國資本主義對歐洲資本主義之支配更要增強；正如每一危機之結果，大企業對於小企業，托拉斯對於孤立的企業之支配加強一樣。然而合衆國的世界霸權的必然增長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中更引起深刻的矛盾。

合衆國的統治階級在世界上建立金元的獨裁時，將全世界的矛盾都包括在自己的統治之基礎以內。合衆國的經濟與政治將一天天更直接地依賴於全世界各地的危機，戰爭和革命。牠不能長久保持「旁觀者」的地位，甚至於在形式上也不能。我想，美國將創造我們所能想像的最鉅大的陸海空的軍國主義。

美國之最後的脫離老的「孤立主義」；爲市場的爭鬥；軍備之增加；積極的世界政策。現時危機的經驗——這一切必然在美國內部生活中發生深刻的變化。工人政黨之出現是必然的。牠可以依「美國的」速度開始生長，使兩舊的政黨中之一消滅，如像英國自由黨之消滅一樣。

結束時可以說：蘇聯將在技術上美國化；歐洲將蘇維埃化或者野蠻主義化。美國在政治上將歐洲化。

薄林彌浦，二十五日，一九三二。

二 與美國聯合通信社的代表談話

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依照螺旋形發展：螺旋形的半徑一月一月地增加。這一方方法有其政治的和外交的優點：牠逐步地將本國人民和敵國人民牽入戰爭，將

既成的事實擺在其餘的世界之前。這一方法證明軍閥在現在開始的階段，必須克服不僅國外的而且國內的抵抗。從純軍事眼光看來，「小塊的」行動方法是不利益的。日本的統治者，似乎認為在中國的軍事軟弱和反對者及競爭者的陣營中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情形下，可使自己在最初的時期，依螺旋形而進展。

但是在第一階段以後——停頓一下或沒有停頓——顯然應該有第二階段，即真正的戰爭。牠的政治目的是怎樣的？巴黎的領導的報紙，極熱心地將日本參謀部的思想和口號譯成法文，時時告訴人說，事情不是什麼戰爭而是警察的手段。這一解釋，有屬於螺旋系統中之必要。當軍事行動達到必要的氣勢，和進攻者方面的力量將分配得與任務相適應時，此解釋將不攻自破。

日本的目的：將中國殖民地化。目的是鉅大的，但是應當立即地說，日本不勝此目的之任。日本來得太遲；當英國準備失去印度時，日本將中國變成新印度

是不成功的。然而東京的寡頭統治未必沒有進攻蘇聯之政治目的嗎？假使認為這樣的計畫可以排斥，未免輕率。但是牠不能成爲首先要做的計畫。只有獲得了滿洲和在那裏鞏固了以後，日本才能以向西北進攻爲任務。但因爲蘇聯政府不要而且不能要戰爭，日本一方面在牠保障和設備中國滿洲根據地未完成以前，很難決定對蘇聯的直接侵略的步驟。

更有一重要的考慮，也是趨向這方向的。日本的寡頭認爲——至於有多少根據，乃另一問題——牠可以零碎的、分期的進行對中國的戰爭：這種的行動方法對於日本的財政大臣（他與這事十分有關係）更爲可以接受。

反蘇聯的戰爭需要完全另一些規模。沒有強有力的同盟者，能豪奢地資助戰爭，很難說日本敢誇過滿洲的國境。東京今日或明日能計算借幾十萬萬的戰債，此計算之可靠到何種程度，關於這點在巴黎或紐約比在蒲林磯浦更容易判斷。

任何說蘇聯政府在遠東有侵略野心的企圖，由於其內部的不成立而要自己崩潰的。戰爭對於與國家之將來有密切關係的經濟計畫將是一殘酷的打擊。只有百分之二沒有完結的工廠不算是工廠。而在蘇聯有幾百和幾千的工廠在建築中。戰爭將長久地將牠們變爲呆滯的資本，這些是太明顯，用不着詳說。

即使我們假定，遠東的衝突總是不免的——這是許多日本的，而且不僅日本的國家要人的信念——那麼，即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政府亦沒有任何理由去加速衝突。日本已捲入對中國的大事業中，其後果是不可見的。牠（日本）可以有，亦將有，一些軍事的和外交的勝利，但是勝利是片刻即逝，而困難將是永久的和不斷增加。高麗是牠的愛爾蘭，在中國牠企圖創造自己的印度。具有完全頑固自用的封建軍閥才輕視中國的民族運動。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已覺醒的偉大民族，不能用飛機使其服從。在滿洲的肥沃的土地中，日本已陷至膝，假使不是陷

到腰。因爲在日本本國，經濟發展已與社會的封建的制度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則我們可以斷定內部的危機完全不可避免。在一開始，政友會將讓位於民政黨，後者將左傾；以後革命的黨又將舉起自己的頭來……法國在資助沙皇時，曾損失了不少。牠假使想在資助天皇時，可以保險地不會損失，牠是想錯了。很明顯地：蘇聯在遠東的關係上沒有任何理由着急與着忙。

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因此將發展於日本依照更強的同盟者的協定，有意地和自覺地喚起衝突之時。這一戰爭之目的自然比中東路和整個滿洲的問題無限地廣些。有幾家法國的報紙忙於預言說，「布爾雪維克將被埋葬於西比利亞的平原」。西比利亞的平原和森林是廣闊無限，在牠中間可以埋葬很多東西。但未必一定就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罷？

關於蘇聯與日本的戰爭的思想，以及日本與美國戰爭的相稱的思想，立刻提

出距離的問題：海洋與陸洋之爲軍事行動的可能的領域。在第一眼看來，戰略的問題完全溶解於距離的問題中。從這裏，許多人急於想做不利於蘇聯的結論：蘇聯之亞細亞部份的人口稀少，產業落後，鐵道交通之不足——這些都是蘇維埃方面的負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以內這是如此，但只在某種程度以內。即使將問題限於軍事技術範圍以內，我們不能不見同一的距離也是蘇聯的聯盟者。假使承認日本由東到西推進的軍事勝利，那麼很容易預見日本的困難與其自己所走的道程至少是乘方的增加。勝利將吞沒了自己。然而在背後，日本不得不維持自己的愛爾蘭和自己的印度。

然而問題不應提出得這樣的狹隘。戰爭將不僅是用軍事的方法進行。蘇聯不是孤獨的。中國還活着。他要而且能爲自己的生存爭鬥。誰忽視此因素，誰將在牠上面撞碎自己的頭。

在西比利亞的平原上運幾百萬的兵和供給他們一切爲進行戰爭所必需的東西——不是簡單的任務。然而在現在蘇聯的工業可能異常增加的情狀之下，鐵路運輸的手段，假使需要，可以很大的提高。不消說，這需要時間。但是大距離的戰爭，必然也是長時期的戰爭。多半要定出戰爭的「五年計畫」和與牠的需要相應，重新改造五年的經濟計畫。不消說，這對於戰爭的參加者的經濟與文化是最殘忍的打擊。但是我是從別的出路沒有假設出發。一旦戰爭不可免，應當認真地進行地，動員一切力量與一切手段。

蘇聯的參加戰爭在中國人民之前，將開闢新的前途和在牠中間誕生最大的民族興奮。凡懂得形勢之邏輯與人民羣衆的心理的人，他對於此點沒有一點懷疑。中國的「人的材料」不患不足。幾百萬中國人學習了使用槍械。所缺乏者不是鬥爭之意志，而是正確的軍事教育、組織、制度和聰明的指揮。紅軍可以在這裏給以

很高程度的真實幫助。北伐時期最好的軍隊，如大家知道的，在創造的時候，是在蘇聯的指導員之下訓練的。黃埔軍官學校的經驗在別的政治基礎之上（此問題我在這裏不涉及）可以發展為極大規模。西比利亞鐵路，除了必需的軍事給養以外，將不僅運輸軍隊而且也運輸軍隊的精華。從被喚醒的和興奮的人類原料中，如何組成臨時軍隊，這個布爾雪維克學習得很會而且他們還不會忘記。我不懷疑在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間可以動員第一批一百萬的戰士，給以服裝，武裝起，教練和帶到前方火線，他們在軍事訓練上不會比日本人落後，而在戰鬥的精神上將超過他們。第二批的一百萬不需要六個月。我說的是中國。然而除了中國以外，還有蘇聯，紅軍，牠的廣大的後備。……不是的，領導的法國報紙（全世界最反動的）太急於埋葬蘇維埃在西比利亞的平原了：赤裸的仇恨，一般說來是壞顧問，特別當問題是關於歷史的預斷的時候。

但是前途假使如此順利，你們說，何以蘇維埃政府盡一切力量避免戰爭呢？對這一問題我已回答過：在遠東，時間的因素是工作得不利於帝國主義的日本，日本帝國主義走過了牠的最高點，現在將向下沒落。而除此以外，這也是同等重要的，在世界上存在的不僅遠東。世界形勢之鎗現在不在瀋陽而在柏林。希特勒的取得政權，對於蘇聯，比起東京的軍事寡頭之心思來，爲無比地更直接的危險。

但是我們從一開始即限於關於遠東的問題。因此讓我在此完結。

柏林覆油，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二。

三 答「芝加哥日報」的代表的問題

(1) 危機之基本原因可以用一字來下定義：資本主義。危機之異常的性質可以

用另一字解釋：帝國主義，換言之，獨占的資本主義，陷於牠自己的無出路的矛盾中。克魯格 (Krug) 的興起和完結 對於現在整個的資本主義是象徵的。官式的道德家對於這一火柴大王用已遲了的雷來打他。他可以回答他們說：『爲什麼你們允許我，隨我的任意，處分那些應當服務於社會和應受社會支配的無涯的創造力量？』

資本主義世界能渡過現在的危機嗎？對這問題的回答依於怎樣了解危機來決定。行情的動搖，跟隨着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在以前的一時代，資本主義的曲線經過行情的動搖而向上發展。現在資本主義的曲線則向下傾斜。這不排除將來的行情的動搖。恰恰相反，牠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的尖銳的危機可以緩和一下，只是在下一十分近的阶段帶着更尖銳的痛苦暴發。這一極端的病的行程之完結，只有靠變更整個的社會制度。

(2) 我希望着軍縮會議的成績嗎？一點也不。順帶地說，我在這點上不致是一例外。法國提案的特點是，牠是泰狄歐政府所提出。當法國擁護日本在遠東之流血工作時，感激的日本則在日內瓦擁護法國提倡和平主義。這對於全世界人民是一難得的教訓！法國提案的內容是，在國際聯盟的掩蔽之下，創造新的協約，其唯一目的是藉助於『國際的』軍隊保障法國財政資本的霸權。

但即美國的提案也沒有開關甚麼前途，現代的戰爭不是用那些交戰國家在戰爭之前夕的武器進行，而是用他們能在戰爭過程中所創造的武器進行。正是美國在這點上給了全世界，特別是德國，以不可忘的教訓。新的戰爭之結果將爲交戰國的一般技術實力之對比所決定。某一國的工業愈高，他愈有利於預先的『限制』軍備，因爲他在戰爭過程中比他的敵人更容易保障他的軍隊以一切必需品。軍縮會議最好的結果將以毫無內容的公式完結。日內瓦會議的失敗將給軍備

競爭以新的推動，更使戰爭的危險密集。

「法日之戰爭的以及『和平的』政策一天天地明顯和公開地不僅反對中國，而且亦反對蘇聯。關於李維諾夫之在日內瓦會議代表蘇聯政府不想將事情弄到戰爭之誠實的努力，這對於每一能思想的觀察者，甚至是仇視蘇聯的觀察者，不能不是明瞭的。然而我願意希望蘇聯的代表團從和平主義的技術的提議（甚至在教育的意義上說，這也是很少有效的），過渡到更積極的政策，即是說，對會議公開地說出實在的情形，因此警告人民以將至的危險。因為，在我們地球上假使有力量能『限制』海軍和陸軍的，重砲隊和輕砲隊的軍備，這就是人民羣衆的意志。

(3) 報上的謠言，說我很快將回到蘇聯，恐怕不是根據於某些確實消息。這甯可說是揣測，爲一般的不安局勢所引起。用不着說，假使有戰爭危險，那我所屬的派別願將自己完全交給蘇聯政府支配。我可以舉一個先例，就是在一九一八

——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時候，史大林和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 現時蘇聯的陸軍空軍人民委員長——譯者）及其他的人是我和列甯手攜手所進行軍事制度之激烈的反對派，然而這不妨礙那時的反對派積極地參加軍事鬥爭。

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二，蒲林礦浦。

四 答柏林 Montag Morgen 週刊的二問題

(1) 問題：你相信國家社會黨之取得政權是逼近了嗎？

回答：是的，我相信假使德國工人階級的最重要的組織，繼續他們現在的政策，法西斯主義幾乎將自動地獲得勝利，而且在比較近的時間。中央黨是否將服役於希特勒爲一蹬子，這在柏林比在這裏更容易看見。這不是決定的。這兩黨的聯盟在中央黨瓦解的路上（由天主教的工會的瓦解開始）終成爲簡短的插話。希

特拉答應留在議會台基上的諾言（順帶的問，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其重要如，比方說，日本帝國主義答應在戰爭中不使用毒氣的諾言一樣。要求這樣的諾言是可笑，希望牠的實踐是極端愚蠢。實在地說，那些將希特勒的議會的票據貼現的政客們，正是自覺地爲德國的法西斯化開路，法西斯化對於德國人民和尤其對全無產階級預示着什麼，我們用不着再在此地重複。

(2) 問題：你認爲時機的緊迫需要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原則上的衝突不減弱，必須創造一共同的鬥爭組織麼？

回答：是的，我相信共產黨應對社會民主黨及自由工會的領導提議一鬥爭協定，從上層直到下層。工人階級之反法西斯主義的聯合戰線，與那裝璜無力的「鐵的戰綫」相對照，必須有一完全具體，實際和戰鬥的性質。牠的出發點應是：保護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一切機關（按即工會、工人合作社、工人政黨等組織——譯者）和勝

科（按即指社會立法——譯者），更廣義的說，這是在野蠻主義之前保護文化。

共產黨在這方向的勇敢而坦白的動議，不僅大增牠的威權，而且從底層到上層改變了德國的政治形勢。獨佔的資產階級將立刻開始感覺，在希特勒之獨裁週圍遊戲，即是在國內戰爭的火燄週圍遊戲，在這火燄中不僅紙的價值有化爲灰燼的危險。在那爲失望所驅逐到希特勒陣營的無數的和無形式的羣衆中必然起一種分化和解體。實力的關係將在鬥爭的門口突變得對於法西斯主義不利益。在工人階級與德國人民之前將開闢有偉大前途。

(3) 問題：你準備用你的名義和親自爲這樣一組織工作嗎？

回答：自然，我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完全立在許多我的^{（按英文已有譯本 What Noxi, 美國 Pioneer Publishers 出版）}小冊子中，特別最後的一本以後怎樣辦（按英文已有譯本 What Noxi, 美國 Pioneer Publishers 出版）所發揮的策略之基礎上。每天都重新證實，德國的工人階級沒有別的道路。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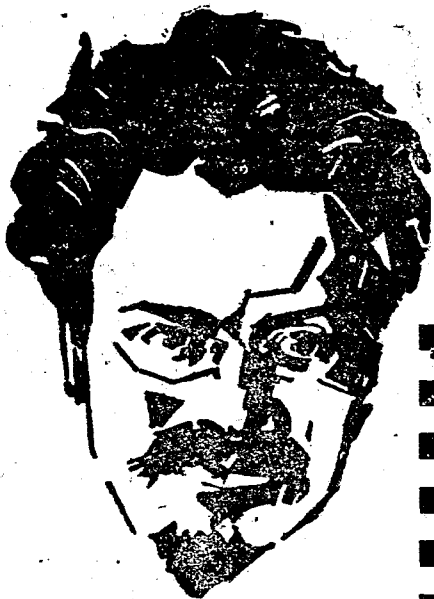
的命運的問題是歐洲的、蘇聯的命運的問題，而且一大半也是全體人類在一長的歷史時期的命運問題。每一革命家不能不將他的力量與他的命運隸屬於這問題。

五月十二日 一九三二。

· 冊大 ·

· 元一各價實 ·

俄國革命兩個怪傑，列寧與托洛斯基，列寧功成名遂，托氏則被放於土耳其。本書係其自傳，為當今最有名的傳記讀物，世界各國文字，都有譯述。全書計四十五萬言，從其出生，以至最近世界各國都不許入境止，中間如學生時代的從事社會運動，其後的被捕脫逃，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回國，十月革命，就任為紅軍總司令，及斯大林專權，托氏被逐等。事勢變化萬狀，文筆亦繪影繪聲，令人為之悲，為之喜。為之洒同情之淚。趣味濃厚，是一部極好的傳記小說，也是一部最可信的俄國革命史，固不僅欲知俄國幹部派與反對派之爭者，應讀此書已也。譯者石越先生，精通俄文，而中文亦流麗暢達，能曲盡托氏文筆之妙，實為不可多得之譯品。



上海新生命書局版

托洛茨基自傳

石越翻譯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

——實價大洋六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著者 托洛茨基

翻譯者 劉鏡園

出版者 陳寶曄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7

520134

